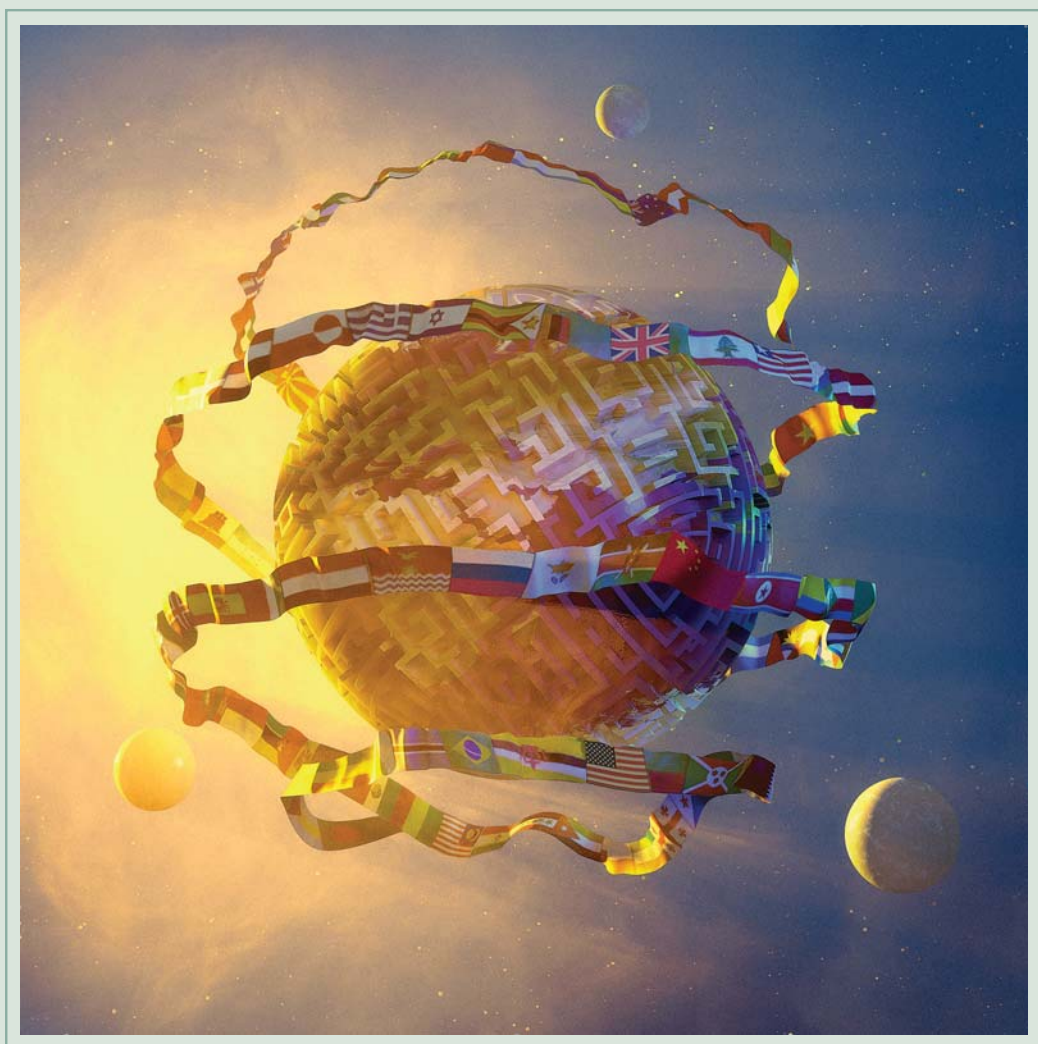




国际生活

俄罗斯对外政策、外交和国家安全



项目领导人

“国际生活”杂志总编—阿尔曼·奥加涅祥

项目责任编辑

“国际生活”杂志责任秘书，历史学博士—叶夫根尼娅·彼亚德舍娃

摄影图片

伊丽娜·兹纳特诺娃

玛丽娜·丘林娜

维克托莉雅·波兹德尼娅科娃

中文翻译

© ООО «Прогресс ИД»

总经理 - 萨尔基斯·奥加尼扬

编辑部副主任 - 玛加丽塔·塔尔韦尔多娃

翻译 - 伊丽娜·科斯特罗米季诺娃、李裕泰

电脑排字 - 阿列克谢·乌瓦洛夫

排版 - 安东·佳特洛夫

编辑部地址: 邮政编码105064, 莫斯科, 高罗霍夫斯基小巷14号

电话: +7(499)265-37-81; 传真: +7(499)265-37-71

E-mail: info@interaffairs.ru

©«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2012

目录

- 5 谢尔盖·拉夫罗夫，俄罗斯外交部长
俄罗斯外交与 21 世纪的挑战
- 政治
- 23 安德烈·杰尼索夫，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不断变化世界中的俄罗斯：优先方向的继承性和新的机遇
- 29 格里戈里·卡拉辛，国务秘书、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不存在能替代独联体一体化的合理方案
- 39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对拉丁美洲要抱有特殊态度
- 45 伊戈尔·伊万诺夫，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俄美“关系重启”：策略步骤还是战略选择？
- 55 谢尔盖·拉佐夫，俄罗斯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俄罗斯和中国相互需要
- 多边外交
- 65 谢尔盖·纳雷什金，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
俄罗斯与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历史和前景
- 73 根纳季·加季洛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对付危机的经验或者国际社会应该保护谁？
- 83 弗拉基米尔·奇若夫，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
俄罗斯-欧盟战略伙伴关系：欧洲危机——非为喘息的理由
- 95 基里尔·巴尔斯基，俄罗斯联邦总统驻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民族协调者，特任全权大使
中亚·在上合组织“不湿伞”之下

趋向

谢尔盖·库里茨，管理问题系统解决方法专家，教授、技术科学博士
瓦列里·沃罗比耶夫，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家对外关系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法律学博士
新国家管理和宪法权利模式中的公民社会 109

叶甫根尼·沃罗宁，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主导研究员，特命全权大使
谈武装干涉的合法性：对利比亚的开战理由（CASUS BELLI） 123

尤里·别洛布罗夫，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迫切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科学工作者，政治学副博士
中国和反导弹防御系统 135

阿列克谢·博古斯拉夫斯基，非洲研究专家
中国-非洲：互利合作经验 147

亚历山大·福缅科，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国家杜马IV届议员
我们的前景：欧亚对外政策结构 159

总编一栏

阿尔曼·奥加涅祥，“国际生活”杂志主编
缺失的“大国主义” 167

周年日

鲍里斯·皮亚德舍夫，特命全权大使，俄罗斯功勋外交工作者，“国际生活”杂志主编（1987-2009年）历史学博士
90岁不算年高，“生活”前程远大..... 171

赞同和反对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新方程？ 193

杂志理事会

拉夫罗夫 С. В. — 俄罗斯外交部长

阿夫杰耶夫 А. А.
以个人名义

杰尼索夫 А. И.
俄罗斯第一副外长、经济学副博士

扎索霍夫 А. С.
政治学博士

伊万诺夫 И. С.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科萨乔夫 К. И.
俄罗斯联邦合作署署长

卢金 В. П.
俄罗斯人权全权代表，历史学博士，教授

马尔格洛夫 М. В.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副博士

马列耶夫 С. И.
俄罗斯外交部总经理

梅什科夫 А. Ю.
特命全权大使

帕诺夫 А. Н.
政治学博士

彼得罗夫 Г. Г.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副会长

普里马科夫 Е. М.
院士

普什科夫 А. К.
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历史学副博士

季托夫 В. Г.
俄罗斯副外长

托尔库诺夫 А. В.
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费多托夫 А. Л.
特派大使、俄罗斯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奇若夫 В. А.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

丘尔金 В. И.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历史学副博士

沙夫拉尼克 Ю. К.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家联盟理事会主席、“世界政治与资源”基金会主席

雅科文科 А. В.
特命全权大使政治学博士、法学博士、教授

奥加涅祥 А. Г. “国际生活”杂志总编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长



俄罗斯外交与21世纪的挑战

“国际生活”：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您视今天世界政策中有哪些肯定和负面趋势？这些趋势最终能引向何处？

谢·拉夫罗夫：衡量当代国际局势存在几种基本尺度，总体上，一些对世界发展的走向抱有加以严肃认识的人，也都同意这种尺度。第一指的是，今天，我们大家正在经历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实质上能意味是历史时代的例行替换。此论题是普京总统在7月份举行的俄罗斯联邦大使和常驻国外机构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国际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伴随了经济、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总体上的动荡。

第二，历史的进程在继续加速。这我们能从，像通常说的，地壳板块深层加速移动，全球威力和影响力格局的再分配，中东和北非，世界其它地区急速般的事件中看出。

第三，21世纪国际关系向多元中心结构的转化，是显而易见的。这意味，世界的命运不再是一个国家，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来决定，不再由冷战时期相互对峙的军政集团决定，就连“显贵”国家的狭义音乐会和享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心，也不由他们来决定。这里所谈的是构建公正、民主和稳固的，更最理想的——自我调节的国际关系体系。

至于如何对肯定和负面趋向定界，原则上，一概以“黑-白”范畴来评估世界发展趋势——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同时，我们也能以一定的把握指出，在日趋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只有在真正的伙伴关系道路上，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在顾及相互利益和忧虑情况下，才能找到大家对共同面临的挑战的答复。对此现实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采取的实际行动，看来，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更具有肯定性的趋向之一。所有负有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面临的确实是相似的任务——稳固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世界和平和安全、调解危机局势、推进广泛的国际合作。印证这种态度的例子也不少——“20国集团”、“8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活动，加强世界政策中网络架构的作用，当然，必须有联合国起中央协调作用，为顿挫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险、恐怖主义、海盗等众多威胁的进行的联合行动

反之，今天国际关系中存在的负面现象，显示于复发的单边行动，将自己的价值观刻度强加于他人，为自己——就算是在最崇高的口号下——争取地缘政治的优势。其同加强排外主义、不容

忍性、各种形式的歧视、法律虚无主义相连。所有这一切将能演变为下滑到混乱和对国际事务失去管理的地步。

至于俄罗斯，我国整个外交政策基于联合进行建设性工作的哲学思想。我们愿意和所有有迎合意向的人将发展深入、持续的、多层面的合作向前推进。自然，我们将继续对世界发生的进程，包括完成俄联邦总统就年底前制定新版对外政策的委托框架下的工作进行分析做出贡献。根据总统对俄罗斯外交提出的任务，我们将更积极地，对特别是直接牵涉到俄罗斯利益的局势起影响作用，做好应对各种事态发展的准备。

“国际生活”：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有一种感觉，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和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准则的外形在受到强力攻击。这是否证实在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国际关系？

谢·拉夫罗夫：如果以“雅尔塔和平”和业已形成的世界秩序来理解联合国，那我也看不出还有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形式能取代此架构。联合国宪章——战胜大国在二战胜利的冲浪下制定的独一无二的文件。其在诞生伊始就奠定了至今还保留的迫切原则。

这里谈及的是基于不干涉内政，尊重任何一国主权，其领土完整和由集体通过决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中法律至上的原则。

换言之，被“程序化”的联合国宪章，作为多极世界调节器，在当今条件下能确保稳定的现代世界秩序。

形成两极世界的冷战时期，国际平衡由两超级大国——美国 and 苏联及两个军政集团——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强硬对抗来确保，是联合国宪章奠定的原则的反常现象。

在两极体系崩溃后，大家确信不能有单极世界，因为任何大国，包括美国在内，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孤行。随着新经济中心

的增长、金融实力和随之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大家确信新世界秩序应当是多元中心的。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我们正处于其顶峰期。这种新机构，如“20国集团”的积极活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长、拉美、亚非国家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所有这一切组建了多元中心世界秩序。为此的法律基础已存在，没必要再去发明。这就是联合国宪章，其作为多边合作进程调节器构思的。

我们克服了冷战阶段。这是由历史支配的：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消失，出现了必须得顾及的新的和有影响力的大国。

西方批评我们立场的人士说，联合国安理会处于“瘫痪状态”，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在对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决议草案使用了否决权。这并非如此。我们是针对更迭政权动用了否决权，联合国宪章不允许以外界干涉来更迭现行政权，宪章要求尊重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因此，俄罗斯和中国就叙利亚决议草案投反对票是维护了联合国宪章。

此外，否决权——投票机制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签字赞同的。成员国不仅在宪章和否决权原则下签字，他们还都批准了此文件。否决权并非是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国常任理事国提供的优先权。其自然性是有本组织的父老奠定的，其扎根于对在不考虑有影响力国家意见通过涉及世界命运的决定将是无效的，不容置疑的深刻理解。

我提示一下，国家联盟所以解体就是因为其蔑视了大国利益。正是美国在建立联合国时坚持将否决权纳入联合国宪章，以便不再重复国家联盟的悲惨经验。

因此，为在现代条件下发展国际关系的法律基础是存在的。其完全具有适应性并证实了自己的普遍性。现在，我们拥有罕见的

发展国际关系的可能性和基于一致赞同和批准了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国际生活”：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阶段上，美国人提出了和俄罗斯“重启关系”的政策。依您的看法，俄-美关系此阶段的结果怎样？

谢·拉夫罗夫：当奥巴马总统及其一班人马在数年前表示，有意认真地开始更新双边关系和解决积累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对发出的此信号表示欢迎。与此同时，我们自一开始就表示，只在相互尊重，现实地顾及各方利益，抱有真诚态度和可预测的原则基础上，才能有效解决两国面对的任务。

当时同西方进行配合的方向是正确的。通过联合努力改善了对话气氛和扩大了囊括的范围。在经济、战略稳定保障、人文联系发展一系列领域中，取得了具有分量的实际性结果。我提一下近年来具有标志性里程碑的事件，如签有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俄-美总统委员会进行简化相互签证手续的工作。

等待我们的是极充实的议程——予以经贸和投资领域合作质新的发展。我们间的商务联系越深，质量越高，保障俄-美关系不受政治形势变化影响的“保险网”就越牢固。我们将为人文、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建立良好环境予以重大关注。

当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罗列的分歧清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任然是反导防御系统问题，不能低估此问题的严重性。显然，相应决定由美国做出，而后，又由北约在不顾及俄罗斯利益情况下做决定。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美国建立的反导手段不得破坏俄罗斯的遏制武库，不得破坏数十年来形成的力量均衡。

应当在反导防御系统的合作上确定明确的法律框架，包括美国建立的反对俄罗斯和我国核力量手段不针对俄罗斯的具有法律约束性的保证（对任何其它欧大西洋国家也如此）和协调允许对这种保证的执行进行监督的军事技术范畴。自然，这个问题和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美国大选马拉松结束后再予以解决。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愿意根据美国同事能接受的力度和美国发展政治对话。我们的对话原则是：其将是 在平等、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放弃对每一个国家内部发展问题的单边看法强加于人的企图和在世界舞台上进行合作。

“国际生活”：许多专家怀着极大的不安情绪指出，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生活中的作用在下降。一系列国家的实际政策无法纳入其框架范围。您是否同意这种评估？您对在当代条件下运用国际法准则实践，总体上如何评价的？是否能加强起作用？

谢·拉夫罗夫：要知道，我很难同意这种消极的评价。我完全能理解发表这种意见的专家。企图颠覆联合国宪章奠定的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绕道国际法和已确立的决定通过方式的行为，也就是我们近来看到的一种现象，最终导致严重的负面后果，使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加剧。

但也没有必要滑落到故意说些夸大的吓人话，要以真凭实据对发生的事件做现实的评价。只有这种态度才会让我们留在国际事务中发生变化的浪峰上。

有关国际法作用下降的看法，是在国际专家团队那里“落下户口”的，首先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北约在没有或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采取的行动。我们就其实质来分析一下。

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就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发后，轰炸的策划者开始为此行为寻找合法性。经协调后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将必须以尊重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主权来解决科索沃问题纳入了其中。看来，似乎形势又返回到法律园地，但此项决议，在西方承认由普里什蒂纳单方面宣布科索沃独立而被粗暴践踏。

如果回忆伊拉克战争，那么，当时北约领导人至少企图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尽管，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也是以臆造的借口要求。但在遭失败后，他们在没有必要的授权情况下开始了军事行动。尽管如此，不久后，美国开始积极地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协助在伊拉克召开民族和好大会。这是客观现实要求做出的一步，从而，北约也不得不返回国际法机制。

在利比亚问题上，北约就不敢未经安理会授权采取行动，他们清楚，国际社会将不会接受其成员国做出的单方面决定。他们还是获得了所要的授权。至于他们滥用予以的授权，这是另一个探讨的课题，就此问题，俄罗斯领导不止一次进行过表态。利比亚后冲突进程，首先也有企图将其引出联合国框架，但稍后，此问题又返回该组织。请大家注意——北约战略学说直接指出，北约成员国将在各地采取维持和平和稳定的措施，但这种措施必须以尊重国际法为条件。至于肆意解说决议的作法，我们今后为安理会的授权中不再出现模棱两可的解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联合国宪章仍然是国际法的支柱，尽管曾有企图按“法律是牵引杆，转向哪里就朝那里”原则来动摇此系统。

下面谈谈加强国际法作用的问题。和平事业上始终如一地确立法至上的原则，是我国外交关键的优先方向之一。平行进行的还有

发展一些法律准则和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进程。比如，启动了完善抵制海盗的合作工作，其中有建立追究海盗责任的国际机制工作。

但也不能忘记，像作为国际法基础的联合国安理会享有的章程特权，安理会决议通过的程序，或是，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都是经过对复杂的和交织的国家利益相比下形成的。因此必须维护其不受短见企图的破坏，要对相应挑战，从整体上进行最大限度地估量，充分认识到与此相连的重大责任。

“国际生活”：近来出现有关联合国似乎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言论。境外的一些政治活动家甚至暗示说联合国是“已过时时代的制度”，因此，在现代条件下，其不能对时代的挑战做出有效反应。您如何评价这些言论？又如何看待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谢·拉夫罗夫：有关联合国的改革并非属新题。世界组织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处于世界政策和政治学讨论的尖锐课题，由于拥有快速适应能力，其总体上，一直符合某具体时代的现实。

我将丘吉尔关于民主的一句话改装一下来说，联合国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我们回忆一下，联合国之所以能诞生，全靠苏联、美国和英国达成的妥协，他们相互间的信任和理解是在同纳粹进行的斗争中铸造的。

20世纪下半叶，地缘政治格局发生迅速变化——可以回忆一下非殖民地化高涨时期——但联合国凭成员国的政治意志，在每个阶段上都示范了其效率。今天，国际组织依然是被公认为合法的，通用的跨政府论坛，该组织成员国在所有国家涉及的尖锐问题上，联合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通过加强伙伴关系，扩大联合议程和确立法律至上的途径来维持和平。

实际上，联合国的改革已在进行——新制度的建立，议事日程在完善，维和行动日益有效。重要的是使改革不要脱离今天的现实，不要将改革视为是目的本身，更主要的是一一不要成为未加考虑地摧毁以联合国宪章为试金石的国际关系体系基础元素的空头借口。在彻底改革使全球管理系统倾向于更平衡和公正的多元中心模式条件下，对其关键条列的重审必然将影响到全球安全。

在现代阶段上，在联合国平台上对联合做出裁军、反恐、打击犯罪和贩毒的努力，为统一网络空间健康化采取集体步骤，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迫切性。要求刻不容缓地解决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克服不能允许的不平衡，加强能源、粮食、生态安全的问题。“有问题区域”的名单，很遗憾，在不断扩大，因此，联合国的任务——对新出现的威胁做出敏感的反应，不让动摇自己的队伍。特别重要是，以尊重章程有关安理会常驻理事国一致性原则为通过采取强制措施关键条件。

联合国预防和调解冲突，冲突后阶段的复兴问题上的作用，越来越具有迫切性。但联合国的有效率直接取决于其成员国是否认真负责地履行章程的原则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争端。我已谈论过这个问题。鉴于此，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发出将赌注下在单边使用武力的呼吁，何况，还是绕道联合国安理会进行。

当然，没有一个国际关系领域思想健全的政治家和专家会将国际组织作为“废料处理”。这种挑衅性和毫无根据的言论追求的只是一个目的——为那些想不顾国际关系中伙伴意见，按自己样板来操作世界政策的人松绑。正因为此，作为最大对话平台的，

心平气和的和顺利工作的联合国，才是国际关系上的“无政府状态病毒”的持续性“疫苗”。

“国际生活”：独联体国家海关联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前景日益被肯定。前不久乌克兰总统维克多·雅努科维奇做出乌克兰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决定。请问，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成员国在正在制定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新构思中的关系将怎样？

谢·拉夫罗夫：我已谈到过俄联邦新对外政策构思的制定工作问题。我们认为这将是容量大、内容充实的文件，其将反映在推进国家国际活动优先级方向广泛的关键任务。这些任务已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5月7日签署的“有关落实俄罗斯联邦对外方针措施”指令中确定。

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大使和常驻代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了必须加强核心方向——在对独联体国家，包括我们最亲近的一体化伙伴关系上——已形成海关联盟和开始在统一经济空间下运作的“三驾车”参与者（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工作。

增强独联体空间的多边合作和深化一体化进程——长期战略和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客观趋势，包括加强地区群体的方针。此方针今后任将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绝对优先方向。

近来，独联体空间的一体化出现惊人的增速，我们视其的推进为保障全球规模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欧元区危机，美国、中国和其它国家市场问题持续的风险条件下，我们在一体化方面做的努力具有了特殊意义。我们在取消相互贸易上的障碍，保障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力自由流通进行的工作，是抵抗世界危机的有效工具。

主要的是参与一体化进程联合体的国民能体会到其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这种实际效益不仅反映在国内总值和相互贸易数字的增长上，尽管此数字确实不小。比如，自海关联盟开始全面运作以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相互贸易额增长将近40%。海关联盟运作的直接结果增设了工作岗位，税收降低，经商条件的改善，包括中、小型企业，改善了我们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自今年2月1日起欧亚经济委员会——负责协调关税同盟和欧亚统一空间的超国家常设机构也开始运作，并将继续会有更多的职权逐步移交机构。

“三驾车”今后的工作目标写入 2011年11月8日欧亚经济最高理事会峰会通过的有关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中。根据此“路线图”，2015年1月1日将由三国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我们视其为我们在独联体空间工作的绝对优先方向和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任务。

自今年9月20日起，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来说，独联体框架内的自由贸易区条约开始生效。深信，条约的执行将推动共同体国家的经济联系。希望同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乌克兰也会有良好的经济发展。

我们欢迎独联体其它因各种原因还未加入的国家加入条约。据悉，阿塞拜疆、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就这样，在独联体空间开始落实不同深度和速度的一体化进程。每个国家有权根据本国的利益选择自己的道路。提供参与某种一体化联合体的潜在优越性将起关键作用。

我可以同意乌克兰专家和欧亚开发银行联合进行的调查得出适应于乌克兰的结果。也就是说，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空间，其国内的年生产总值能增加6-7%。

“国际生活”：叙利亚症结——今天世界政治最令人不安的现象。您就此问题不断和各国领导人进行交往。您就他们在调解危机问题上的态度有何种感觉？他们是否有做妥协的准备，还是他们持有不共戴天立场，使之叙利亚久久见不到和平？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土耳其做的声明不就完全能为联合国安理会进行的谈判进程画上十字架吗？您认为是否有摆脱此僵局的途径？

谢·拉夫罗夫：俄罗斯联邦自叙利亚危机一开始，就坚持主张国际社会以尽快停止叙利亚各方冲突和任何暴力，减轻叙利亚平民承受的痛苦和为启动有叙利亚人民自己掌握的政治进程，拟定联合的立场和行动。

为此，存在国际社会已有的政治-法律的调解基础。这里所说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应决议，联合国-阿盟叙利亚问题特派使者安南·科菲六项和平计划，这些建议实际上今天仍具有其迫切性和今年6月30日就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在日内瓦举行部长级会议结果发表的总结性公报。

但遗憾的是，近来，一些西方伙伴在自己的发言中经常暗示他们有意不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寻找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途径。我希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8月11日访问土耳其期间做的声明和发表的其它类似的言论出自激情或是国内复杂政治进程的反映。因为我深信，类似的步骤对叙利亚和中东地区，而最终也对整个现代世界法制将会带来具有最大破坏力和危险的后果。

早先，一些国家已曾企图对预见的叙利亚内部谈判结果和将针对更迭叙利亚制度的观点强加联合国安理会。这与安理会的特权、联合国宪章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相矛盾。本应当根据受到一致赞同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启动政治进程，但叙利

亚制度的境外反对派启用了推翻制度的方针。看来，他们不准备改变自己的立场。不共戴天的立场，鼓励极端反对派拒绝对话，是叙利亚持续性暴力和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我们并不为叙利亚政权辩解，不解除其承担的责任，但流血是能停止的，只需迫使所有作战方停止武装行动和在桌前坐下进行谈判。6月30日我们在日内瓦就这一切达成一致，但往后，美国拒绝在联合国安理会予以确认。

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些伙伴不接受以政治-外交方式来打破叙利亚的僵局。他们实质上将事态引向实施“利比亚模式”，帮助冲突双方的其中一方，以此，使反对派对和叙利亚现行政府进行任何和平对话的前景予以否认。我认为，这是步入了死胡同。我们的立场得到许多国家的赞同，他们认识到叙利亚事态如按利比亚模式发展的后果。我所以说这些话，因为，近来叙利亚问题在所有国际会晤上占居中心地位。

要摆脱此僵局只有一个办法——“一蜂窝”地袭向所有方，迫使他们坐下来进行确定自己国家未来政体的谈判。我们还有时间。俄罗斯为这项工作也做有准备。

“国际生活”：还有一个头疼问题——“人道干预”。您如何评价刚问世不久和一些国家以借此来解决一定的世界政治问题 的这个术语本身？

谢·拉夫罗夫：“人道干预”这个术语同联合国宪章相违背。存在国际人道法，其规定武装冲突期间的一定行为，制定对待俘虏，提供人道援助等规则。现在不再使用“人道干预”这一术语，因为其具有“自我暴露”性，现在更愿意在另一个术语——“保护责任”上进行投机。

2005年峰会期间组办了专门的辩论，在峰会的总结性文件中另载入了对“保护责任”做解释的部分，其意味有许多东西，包括提供人道援助，关心居民的私有财产，等等。与此同时，文件中一字不提此术语能为外界武装干预其他国家事务进行辩解。

我重复一下，只有基于联合国宪章通过的决定才具有合法性。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国际法不会被粗暴违反，就像以臆造的借口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轰炸和在伊拉克开战一样。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轰炸，是在1999年欧安组织使团的美国领导人宣布说在拉恰克村“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当地发现了30具阿尔巴尼亚公民的尸体。只在往后，经调查后才弄清死者并非是平民，而是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根据欧安组织发言人说，不是被直射子弹枪决的，而是战时死亡的。进行的所有弹道鉴定和病理解剖验证也都证实这一点。芬兰病理学家根据欧盟要求做的报告，立即被放到“地毯下”未让任何人看，并非偶然。

但正当美国公民兼欧安组织使团团团长宣布拉恰克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后，未有人进行任何调查，他们抓住此借口说再“忍无可忍，我们开始轰炸”。

在伊拉克也发生同样的事——作为借口的是美国断言掌握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再说，这项声明是在对此问题进行调查的联合国特派团和原子能机构即将做出伊拉克未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踪迹的结论时。

因此，未有人能保证，联合国安理会“模棱两可”的决议能被滥用于授权上，就像在利比亚发生的事。当时，就设立“禁飞区”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我们也“赞同”，“禁飞区”也就出现。但担负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北约国家，他们远远超越了

执行空中巡视和防范利比亚政权军机飞行任务的框架，开始轰炸地面目标和站到暴乱分子一边参加国内战争。

我们愿意接受就叙利亚问题通过的决议。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忘了联合国安理会已通过有关叙利亚的两个决议，协调了6月30日在日内瓦聚会上通过的“行动小组”公报。我们提议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日内瓦公报，但美国因其中未对叙利亚进行威胁，单方面的评价和制裁条款而拒绝。“行动小组”公报中采取的是经平衡考量的，能停止叙利亚流血的态度。

我们能保证在任何时候将不会违背国际义务。那些已多年在违背国际义务的人，现在懂得，这种行为愈来愈激怒国际社会。尽管这种情绪不是每次都公开暴露，但大部分国家不愿使类似趋向有继续。就因为此，一些想利用外界武装干涉叙利亚的人，一心向通过以联合国宪章第7章阐述的对“违反国”采取强制措施条款的决议。但就此具体问题上，我重复一下，其涉及的是内部冲突，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出自一方的利益进行干涉。应当迫使叙利亚的所有参战方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做下来进行谈判。

我们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此项工作，他们保证在同时进行的和有控制的停火条件下，愿意和其它冲突各方进行谈判。但反对派坚决拒绝谈判，要求西方和其它国家派军推翻大马士革政权。

这里不是说，现有的世界秩序和联合国宪章不能保护世界免遭冲突，但借用这种行为的做法也越来越“不时尚”。采用这种做法的人的信誉也遭破坏。

“国际生活”：许多人对金砖国家的发展问题很感兴趣。甚至有人会问——这是“谈判的平台”还是已是一个正式的“国际

组织”？您对金砖国家今天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中一些参与国——俄罗斯伙伴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如何评价？

谢·拉夫罗夫：严格意义上来说，此联合体——就今天来说，还不是一个国际组织。

与此同时，我们对加强金砖国家未来制度的组成部分表示欢迎，尽管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加速此进程。对目前的形式，俄罗斯和金砖五国其它伙伴一样，予以很大的重视，认为在其框架内的合作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方向之一。我们主张逐步赋予这种合作世界经济和政治广泛问题的多边战略伙伴关系性质。同时我们致力将金砖国家定位为全球关系的新模式。

今年3月29日，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通过了50条条文的和具体行动计划的总结宣言，这证实了“五方”继续联合行动的意向。至于我们的伙伴希望保留最初奠定的，在金砖国家框架内的交往为非正式性质的理由，我们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制度化进程应当随着符合参与国做有准备的自然成熟的程度才能推进。

此方面，我们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存在稳定的举行年度峰会的实践——明年3月计划在南非举行。以“G8”和“G20”为范例，创建了夏尔巴制度。外长定期会晤和一系列其它对口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在运作。开始进行联合科研合作，在媒体、政治学领域已有一些联合项目，在一些其它领域，如金融-银行领域，开展了对未来合作途径和优先方向具体内容的讨论。简言之，发展进程在增速。

促使金砖国家参与国之间靠拢的客观性，在于他们的长期共同利益。他们致力对过时的世界金融-经济架构进行改革，它们忠于国际法准则和原则，不接受武力和独裁政策。此外，我们这些国家面对着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经济相互

取长补短，金砖国家伙伴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平台上的国际-政治重大问题上积累了协调行动的宝贵经验。就这个实践，我们认为，要继续下去和加以发展。

总结一下来看，金砖国家在自己的“旗帜下”聚集30%的陆地，拥有全球45%的人口和占45%世界生产总值，其前程是伟大的。

“国际生活”：您认为，道德和政治，更确切地说，道德和对外政策是否原则上属于能共存的范畴？近年来，道德在国际生活中似乎已成古董现象。您的看法呢？

谢·拉夫罗夫：深信，道德和对外政策不仅相容，还手牵手呢。至少，我们自己进行的活动就出自于其。

今天，道德定向在国际关系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其迫切性。目前，全球面临的威胁着全人类生存的挑战，明显地居于首位。就近些年来事件显示，这些威胁具有尖锐化和交织性的，能从一个地区延伸至另一个地区的趋向。相应地，生活顽固地和客观地敦促组建用于和平目的的共同议程。要真正联合努力，加深信任，没有对国际舞台上联合行动价值基础的定义，估计是很难办到的。就广义而言，文明稳定发展的前景同是否能以国际社会团结行动的精神-道德基础为支柱相连。

在公正的基础上解决当代世界面对的问题，极其重要。一旦丧失道德，就会产生不公正，会出现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思想，并使问题严重化。我们视国际关系中加强道德基础是大政治的一部分。

在国际关系中进行推进通用的，为所有道德教育标准可接受的行为，对其不断民主化和清除意识形态上的陈规旧律与“双重标准”工作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道德的公分母一贯存在于世界的主要宗教中，包括像对和平与公正的渴望，诚实、慈善、

勤奋。传统价值观的关键元素——对尊严、自由和责任性的理解——载入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1950年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

正在形成的多元中心国际体系，势必将体现世界多元文化-文明财富的图景。如果欧洲忘却自己基督徒的根源，忘却自己根基的同一性，估计，其将会很难同其它文明找到共同的语言。

我们认为，在当今条件下，重点应是对公认的道德标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表示尊重。此问题的指南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人权决议——“靠对人类传统价值观更深的理解鼓励人权和基本自由”。应当强有力的和有目标地推进跨宗教和跨文明对话，俄罗斯在做的就是这项工作。事态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激化国际社会人文潜力，使其制定出能普遍确立基于人类生存、稳定发展和繁荣原则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相靠拢理念的行动计划。

因此，我们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道德在现代语境下的国际关系的演进具有极迫切的理念。不承认最高“道德法”，很难期待在为构架稳定、公正和民主国际关系做出的努力会取得成绩。

当然，武力因素，很遗憾，保存了自己的意义，我们也被迫顾及到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这里回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一句话“从真理中取得力量”很适宜（他可清楚如何为俄罗斯领土争取大胜战）。





安德烈·杰尼索夫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不断变化世界中的俄罗斯： 优先方向的继承性和新机遇

本文题目是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大使和常驻国外机构代表会议的座右铭。按业已形成的传统，类似的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这种会议是俄罗斯外交部和驻国外机构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国际形势进行综合分析，明确俄罗斯外交具体方向的任务。

第六次例行会议于7月9-11日举行。其中心事件，传统地是俄联邦总统的发言。根据宪法，由总统来确定国家外交政策。与国家首脑的会晤对外交部门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其能保障对我国外交优先政策有更深刻的理解，为俄罗斯外交能最大限度地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予以一股冲力。

应邀出席会议的有俄联邦总统办公室、俄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一系列联邦级的部、部门和组织领导人及负责人，以及杰出的社会和科学活动家，我国商界、专家团队、“索契-2014”筹委会代表。当然，参加会议的还有老干部——功勋外交工作者和年轻外交官。

本届俄罗斯驻外使节论坛鉴于一系列情况将不同于一般。这次论坛在新任国家元首就职初期举行，是由需要明确对外政策优先方向的必要性所决定。普京总统今年5月7日宣誓就职后，当即签署了第605号“关于落实俄罗斯联邦外交方针措施的命令”。其中，总统以重点归纳形式阐明了俄罗斯外交部和其它执行权机构在外交领域面临的任务。以此，实质上，为今后阶段的我国外交活动指出了主要方向。其使命是在新的多中心国际关系体系日益形成的条件下确保俄罗斯国家利益，促使加强全球安全和稳定。

普京签署的指令，重申了我国外交方针的继承性，明确了其将依然基于务实、开放、全方位的，始终如一的，在推进国家利益时不下滑到对峙地步的原则。其已全面证实了自己的有效性，实质上也具有普及性。正是这些原则，今后将继续决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的哲学思想。落实这些原则的使命，是加强俄罗斯作为负责任的和可预测的伙伴地位。国际事务中的威信不仅以军事、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影响的因素来确定，但也以一贯性、明确的立场和基本方针来确定。

本届俄罗斯使节会议的特殊性，还因为世界进入了发生澎湃变化的阶段，根据一些迹象来判断，其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眼前正在发生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型，并伴随了全球和地区上漩涡性的增长。国际脉搏空前地加速跳动，而国际关系中发生的进

程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在这种条件下，对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趋势进行无偏见分析，有越来越高的需求。因此，委托外交部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学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当然，此项工作将以集体为基础，并最大限度地吸引外交部中央机构和我国境外机构的智库潜力，紧密配合其它政府部门、专家团队来进行。

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这里指的是一些境外的玩家，鉴于一些国家发生内部冲突，企图以武力行为，绕道国际法和已定型的决定通过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俄罗斯将坚决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确立法律至上的路线，坚决捍卫联合国的中心作用。作为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试金石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我们深信，不仅一些单一国家内部，就是国际关系上，也应尊重法律至上和民主原则。否则就回避不了世界政策中危险的混乱因素的加强。

普京总统在三月大选前夕刊登的“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一文中强调，我国外交政策具有战略性目标，非出于权宜之计。因此，俄罗斯的外交方针将继续是平衡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基于致力和所有为发展全面对话与合作做有准备的人。我们并不为存在的分歧涂脂抹粉，但也不准备将这些分歧戏剧化。换言之，俄罗斯有意增强和自己伙伴的合作，将这种关系推上新的，更高一级水平——自然，这种关系将以平等，相互尊重为基础。

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方向，是深化多边合作和在独联体国家空间的一体化进程，与独联体成员国在各层面进一步发展多方面合作。俄罗斯外交也针对在其它方向——欧盟、美国、亚太地区国家，拉美和加勒比海域国家，非洲国家积极增强联系。

我国的整个外交政策将精力首先集中于为俄罗斯的持续发展，经济现代化改革，在世界市场上作为平等伙伴加强国家地位创建良好的外界条件。深信，这种态度——是广泛国际合作的必然基础，因为发展和现代化改革的迫切性无例外地对所有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际交往上负有责任的参与者的努力，是成功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复杂任务的保障。所有国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全球性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海盗、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自然灾害与技术灾害、粮食短缺、传染病的危险。可以无止境地罗列下去。为对挑战做出一致性应答，就有对以相符利益为基础，灵活的，具有共同焦点联合体的网络外交的需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肯定性议程，以国际法凝固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为基础来调解现存问题，就出自于此。我们深信，在现代条件下，此原则具有普遍性，并应当为欧大西洋和亚太地区及世界其它地区构建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基础。

2008年我们提倡签署欧洲安全条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为寻找解决欧大西洋空间安全问题相互能接受的办法，我们为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是开放的。

此外，我们自然也预见到能阻止合作发展，下调信任度的潜在问题。这里首先指的是有关美国建立全球反导防御系统的计划。我们的原则性条件——美方提供其不针对根据协调的军事技术和地理范畴进行核查的俄罗斯核遏制力量的保证。必须放弃梦想欧洲与世界安全和稳定能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并有损于我国利益予以解决。

俄罗斯国际地位加强的明证之一——我国在各种多边形式论坛上轮值为主席：今年为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明年将为“G20”轮值主席，2014年为“G8”轮值主席。2015年俄罗斯将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联合体轮值主席。我国在当代世界具有影响力的领先中心占有稳固的地位。

前面等待我们的是完善保护俄罗斯公民权益的机制，与海外同胞发展合作，扩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和加强俄语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有效地利用公共外交的资源，将外交活动的新闻报道提升到新一级水平的大量工作。

今年举行的驻外使节论坛不像往年举行两天，而是三天。为使论坛能最大限度地进行有效工作，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新颖措施。就几乎所有使节关心的迫切问题——对外经贸活动、多边外交、新挑战与威胁、新闻工作、领事处问题、与海外同胞的合作问题——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会议次数将增多。在小组会议上将讨论地区和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议程包括保障外交部活动的各方面问题——自人事和财政到物质技术及社会生活问题。

显而易见，落实提高外交工作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的任务，要求我们完善俄罗斯外交拥有的工具。俄罗斯总统普京委托俄联邦政府制定加强俄罗斯外交部体系，以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和在境外拥有广泛网络——商务代表处和文化中心的俄罗斯合作署的资源和人才潜力的构想。其使命是保障我国外交部门进行向其提出的符合其规模和复杂水平工作的有效性。

俄罗斯外交部尽努力和时代同步，尽量为广大社会公开自己的活动和为传媒扩大可能性。

在会议正式部分工作结束后，为了最大限度地促使确保此届俄罗斯大使“会议”的效益，举行按“兴趣”组织的附加活动，举行驻外机构领导人“联营社”会议。往后几天大使和常驻国外机构代表将分组前往俄罗斯各地区。

我们对具有忠于为祖国服务世纪传统的俄罗斯外交，将继续全力以赴地落实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保障俄罗斯在形成的新国际体系中争取应有的地位，巩固全球安全和稳定，毫无任何疑虑。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格里戈里·卡拉辛

国务秘书，俄罗斯外交部
副部长

不存在能替代独联体一体化的合理方案

“国际生活”：格里戈里·鲍里索维奇，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一成不变的优先方向。今天是否能说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在政治、经济或人文的合作方面有更高水平的突破？

格里戈里·卡拉辛：俄罗斯和周边邻国相互关系的原则性概念——首先，我指的是后苏联空间国家和由俄罗斯参与的一体化联合体，非于今天形成。同分布于独联体空间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此宗旨载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思中。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般言论。独联体国家——我们最亲近的战略伙伴。我们在发展社会，进行经济现

代化改革，抵制新的挑战 and 威胁，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具有共同任务

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以平等、互利和顾及各方利益为基础。无疑，一体化进程本身需要所有参与国的花费。但同时，这种支出的额度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程度。但最终，这是对未来，对建立质上一新的，具有重大经济红利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贡献。比如，仅一年来，海关联盟形式的贸易额增长将近40%。

就说您提出的关于我们合作上的“突破”问题，我想，只在涉及某事从零点起家或进行彻底改革、重组的范畴才较为适宜。联合体几乎已在各领域形成了发达的国家间合作机构网系统。现在，我们按既定计划进行高质量的工作。自然，其中也有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毋庸置疑的成就。人文合作机制不断得到完善，正在解决保障其各方面安全的任务。

“国际生活”：今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有后苏联空间一体化长期项目的问题。其任务是为有效融入世界市场在欧亚建立竞争能力的统一性。俄罗斯外交在这方面起有何种促使作用？独联体国家对此任务是否有共识？

格·卡拉辛：独联体空间在积极地“融入”现代政治和经济关系体系。在后苏联空间落实长期一体化进程——无疑是为大家迫切需求的。共同体国家合力行动能更容易解决自己许多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保障自己在新国际景观中应有的地位。就世界经验显示，成功的一体化，首先基于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我们的伙伴是很清楚。

因此，您对各国家领导人向我们提出的任务和俄罗斯外交正在为争取这些目标进行积极工作做出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可以根据具体结果来判断其有效性。

我们对近来欧亚空间经济一体化显著增速表示满意。自2011年7月1日启动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海关联盟已带来初步的可观结果。为启动三国统一经济空间必需的17个国际基础协定的一揽子协议自今年1月起生效。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伙伴——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也在分阶段地加入“三驾马车”的进程。自今年2月1日起，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常设的统一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也开始运作，其将逐步获得更多的国家级职能。目前提出自2015年1月1日启动欧亚经济联盟。这无疑是近年来在共同体平台实施的最野心勃勃的项目，其在决定“三驾马车”未来的同时，将决定后苏联空间整体的未来。

去年的重大事件，是10月份在独联体国家框架内签署的替代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协议的新自由贸易区协议。新协议顾及了世贸组织的准则和规则。今年4月1日俄罗斯结束了批准入世文件的手续。我们希望共同体伙伴也同样会在近期结束批准手续。

在独联体国家框架下还有一个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予以实际推动科技和创新领域的合作实际推动力，其直接将我们这些国家推向必要的经济现代化改革，为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能力创建前提。已通过和正在落实截止2020年创新合作的国家间计划。

“国际生活”：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关系上存在许多合作机制，如海关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在政治上——俄罗斯-独联体峰会、独联体跨议会大会，独联体国家作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战略前景上来说，它们负有那些解决地缘政治任务的使命？

格·卡拉辛：您很公正地提到在独联体空间存在许多一体化机制。落实于实践的是允许国家根据本国的特殊性、利益和外交走

向自由选择形式与合作方向的“流动几何”原则的合作。这种多层面的做法符合业已形成的实际和相应的国际经验。

当然，上述机构，就其参与方和他们求解决的问题存在区别。但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地区一体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在追求共同的地缘政治目标。

战略方向标，如您愿意的话，也就是超级任务——我们共同空间稳定和迅猛发展，保障其安全，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成功的要点在于：加强和进一步深化我们多层面的合作。综合自然、技术、智力和劳力资源，生产合作，联合利用运输线、统一市场。这一切——成为我们这些国家宝贵的竞争优势。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所有这一切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国际生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致力同和我们在经济上、共同命运上和姓氏上有着多年千丝万缕联系的乌克兰保持历史性的友好关系。尽管如此，这种关系近年来受到不小的考验。为了不仅不让俄-乌关系的纽带松懈，在不顾“天然气”和发生的其它冲突境况，为能长期加强这种关系俄罗斯外交在做些什么？

格·卡拉辛：是的，我们同乌克兰存在特殊关系。我们是兄弟民族，具有多世纪的共同历史，相近的语言文化。亲近的，千丝万缕编织起来的文化，统一的宗教信仰，血缘上的联系——所有这一切是今天多面合作基于的根基。

在此，必须附加以存在的经济联系，对发展贸易、投资存在的相互利益，共同的基础设施项目，科学领域的接触，新技术的研制。我们的国家同样面临了挑战和包括国际事务在内的现时代的问题

我们满意地指出，现今的乌克兰领导，我们在乌克兰的伙伴，其大部分主张和俄罗斯在各合作领域保持和发展最密切的联系。

至于同乌克兰存在的一些争端，第一，它们并非属于不可解决性质的问题；第二，双方都有意务实地，建设性地，哪怕是在最复杂的问题上寻求相互可接受和互利的解决办法。

在同我们的乌克兰伙伴进行接触时，我们始终出自战略伙伴精神保持紧密和全方位的合作的态度，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其使命是促使发展和繁荣昌盛。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执行这条路线并诚挚地希望其今后将继续在乌克兰会得到支持和谅解。

我想强调一下，俄罗斯希望在经济、政治、人文问题上、国际事务中，在各领域和乌克兰发展最大限度地紧密关系。我们深信，同俄罗斯搞好多边关系符合乌克兰人民的根本利益。显而易见，提出的在后苏联空间扩大一体化进程的思想，包括今后建立欧亚联盟的建议，也能使我们的乌克兰伙伴感兴趣。

俄罗斯并不隐瞒不仅希望见到乌克兰为双边关系中的战略伙伴，还希望其为我们共同空间进行的一体化进程的火车头之一。通过综合我们的努力、可能性和潜力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生活”：2008年退出独联体的格鲁吉亚同俄罗斯没有外交关系。该国对俄罗斯来说是否仍将是一个“黑洞”？

格·卡拉辛：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间的关系处于僵局状态。梯比利斯领导将一切归罪于俄罗斯，也是在白费劲。就是最巧妙的宣传也无法以谎言来加以美饰。萨阿卡什维利对2008年8月在南奥塞梯犯下的军事冒险罪行，杀害我们的维和队员和众多的钦茨瓦利平民于心有愧。格鲁吉亚领导有目的的在社会意识中造就敌人形

象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学校在排挤俄语，拆除为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竖立的纪念碑，宣传机器在铸造似乎格鲁吉亚多世纪被俄罗斯占领的议题。

尽管梯比利斯官方持有敌视态度和行动，我们曾经是，现在也是对向双边关系正常化方向跨出的任何建设性步骤是开放的。我们从没拒绝过进行谈判。我们继续和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就外高加索问题同第比利斯在日内瓦辩论会上进行直接对话。前不久我们又提出恢复与格鲁吉亚中断的外交关系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提出的确实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倡议遭格鲁吉亚一方的拒绝。

尽管如此，我们将在当今形势下，为保存我们两国居民之间的人文、人情、亲属联系尽一切努力。目前，双方间有直达汽车和航空线路的联系，宗教人士，文化活动家和科学家相互交往，双方间保持着人文接触。最主要的是不让两国兄弟人民传统的和历史性的亲近关系中断。

出自于此项任务，我们向格鲁吉亚一方提出为我们两国公民施行签证免签制度的建议。但此提倡也被官方梯比利斯拒绝。梯比利斯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是格鲁吉亚单方面为俄罗斯公民施行免签制度的宣传。真不愧为伪君子：同时，格鲁吉亚情报部门也不经宣布将曾去过阿布哈兹或南奥塞梯的入境格鲁吉亚的俄罗斯人投入监狱。

尽管如此，我还是深信，要克服由萨阿卡什维利政策造成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关系危机是现实的。我们两国人民在精神和历史上都很亲近，两国人民有多世纪的友好睦邻传统。数十万格鲁吉亚祖籍的人在俄罗斯享有和大家同等的权利，他们中的许多杰出

代表进入我国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特权阶层。关系正常化是由生活决定的。何时会发生——取决于梯比利斯出现一位神志清楚的，负有责任的，将以格鲁吉亚真正的民族利益和其中主要的又以同近邻和睦相处为指南的领导。

“国际生活”：摩尔多瓦在独联体具有特殊地位，其同俄罗斯现实的相互关系如何，是否会退出独联体？

格·卡拉辛：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其中立地位决定了摩尔多瓦人在有关参与集体形式保障共同体国家安全（形式）问题上的克制表现。

另一方面，不能忘记，奠定独联体及其成员国形成的基础达成的一致，保障了摩尔多瓦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如果从整体上，从今天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施政纲领中宣布的优先方向进行核对也是适宜的。其中说：为利用独联体在自由移动、贸易、社会领域的发展和进行文化-人文交流提供的优越性，在组织框架内进行政治对话与合作。

鉴于此，共同体保障了合作的广泛框架。不管怎样，在参与组织工作的情况下，摩尔多瓦共和国能为自己对各种形式的一体化靠拢的优越性做结论

摩尔多瓦领导致力加速和欧盟建立关系，就我们的看法，与在独联体空间综合落实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民族利益不相互矛盾。这种战略举措和国内的社会情绪完全相符。

“国际生活”：在和中亚关系的发展上有哪些优先方向？

格·卡拉辛：中亚地区在俄联邦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中占有特殊地位。我们致力同中亚国家发展多层面的战略伙伴关

系与合作。我们对加强此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经济的稳定抱有兴趣。我们共同在抵制恐怖主义的扩散、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贩毒及非法移民这些新挑战的能力，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努力的成功与否。当然，这里也涉及俄罗斯自身的顺遂和安全。

俄罗斯致力起现实的实际作用，使中亚国家能对独联体空间一体化进程具有效益和吸引力的感受，因为，正是他们是后苏联境内大部分一体化结构的骨干。

我们很重视和中亚国家发展双边形式的和在欧亚经济共同体、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这里也得将在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下进行的深化合作归于内。目前积极参与此一进程的只是哈萨克斯坦，但本地区的其它国家也表示有意加入。

作为和中亚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肯定范例，有为我们成功利用的，旨在协助中亚水利和能源资源以及创新领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平台和联合国援助地区国家经济计划。

至于贸易政策，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是中亚国家加入独联体空间一体化进程的意向和他们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前景“相对接”。

我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优先方向仍是为生活在当地的570多万我国同胞创建良好条件，保护他们的权益，保存同历史性祖国的精神和文化联系。

所有这一切确定了作为俄罗斯战略利益区的中亚优先性。

“国际生活”：您如何评价世界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的可能性？今天存在哪些趋向：抗拒承认的进程，惯性还是忠诚？

格·卡拉辛：除了我国以外，承认外高加索年轻共和国独立的有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瑙鲁、瓦努阿图、图瓦卢。我们认为，这些重要步骤决定了主权国家执行独立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权利，客观上有助于多极世界的建立，鼓励国际联系的发展。

加强苏呼米和钦茨瓦利外交地位的进程，包括同其它国家建立正式关系，遭到支持“再统一”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复仇计划的格鲁吉亚和西方国家的极力反对。对外高加索现实不抱偏见的国家，遭到放肆的外界压力。我们也掌握有事实。其中有采取强硬的外交措施（包括高层面），进行政治后果的警告，以停止人道和经济援助进行威胁的手段。

任何人阻挡不了两个新兴国家步入国际社会的客观进程。建立国家机构，巩固民主、社会和政治体制是这种进程的保障。现在，两国已同中东、拉美、大洋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议会、业务界建立了广泛联系和互利经济合作关系。苏呼米和钦茨瓦利外交部门在此方向的积极活动，值得予以高度评价。我们将一如既往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朋友在国际舞台上予以必要的支持。

“国际生活”：最后，在全球化条件下，保持独联体国家地区稳定和渐进性发展的前景如何？

格·卡拉辛：共同体在不断发展，对其演变进程和前景未有严格规定。我们共同空间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应有地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保持我们国家间的相互吸引力。这一点，可以说属国家领导的政治性创作。

依我们的看法，我们基于通过发展来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公式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在独联体对共同体和必须提高其对每个

成员国效益的重要性取得共识。独联体进一步发展的构想和为落实其的主要活动计划在运作。落实工作在各个方面进行。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独联体空间今天存在的一体化形式非为我们国家间相互配合的理想方案。但不存在别的合理的替代性方案，就像不存在别的能替代俄罗斯同其周边邻国发展互利关系的方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地区和次地区的一体化——现代世界的客观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例外。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对拉丁美洲要抱有特殊态度

“国际生活”：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从对历史的回顾和今天，就您的看法，关系发展如何？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如果回顾往事的话，估计世界上不会有几个地区，如果存在这种远离我国边境的地区的话，有如此多同情俄罗斯的人存在。这是一些曾在俄罗斯就学或同我国存在某种联系的人。对他们来说，我国过去捍卫的理想令他们感到亲近，视俄罗斯（苏联）为社会公正和迈向更美好未来的标志。

这实际上是罕见的一种事态综合，这种现象，依我看，至今在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国家关系上及今后关系发展上起正面作用。

当然，也有过困难阶段。此阶段上的某一刻，甚至出现似乎俄罗斯完全放弃了这个地区或即将放弃，离开当地将忙于其它地区。可喜的是，发生了这个阶段由今天务实的，尽管是不具有迅猛发展的关系阶段来取代。但俄罗斯返回拉美地区和在某些地方开始弥补1990年和2000年初出现的损失，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这首先，第一，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整体地位的加强，包括不仅是政治上，还在经济上的实力增长相连。这还同与所有国家对俄罗斯执行的加强伙伴关系有目标性的政策抱有兴趣相连。

我还想指出，不同于苏联时期，我们现在不存在明显的、公开的，更可取的意识形态，同哪一国或是哪一组国家相对比的现象。也就是说，拉美不是俄罗斯为影响力进行竞争的地区。不存在这种目的，再说，没有这种可能性。拉美不是我们想为任何人制造问题的地区。我们有一系列范例显示：我们与执行不同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国家和政府组织在各领域进行合作。

在我们和委内瑞拉建有的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我们和哥伦比亚关系的发展也不错。我们有和墨西哥从事旅游工作和在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领域各国际机制进行工作的可能，尽管墨西哥不属于持有左翼观点并和美国及加拿大抗衡的拉美一组国家。墨西哥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亲近伙伴。

我也说不上同该地区的哪一个国家未建有关系，尽管有的关系不够深，但也有在关系取得显著增强的国家——从贸易到签证免签往来。拉美地区——为近来进行了大量工作的地区，我们也确实立足于变此整个地区为我们公民的无签证地区。我们同巴西就建有特殊的关系。我们在金砖国家形式下，建有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不仅是金砖国家成立初期就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问

题上进行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合作，其也包括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与巴西人还建有太空领域的合作。

我们与阿根廷的贸易有极好的增长。与厄瓜多尔的关系发展上，出现了以往未有的独特局面——开辟了瓜亚基尔—圣彼得堡集装箱直达海运航线。正在研究投资项目。包括同样的一些银行生产方能借助俄罗斯的投资进行发展生产。俄罗斯“境外石油”公司在古巴进行钻探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不错的构思。

“国际生活”：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么，按您的看法，我国的私营公司是否和拉美商界在发展合作呢？截至目前为止，这种关系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再说，俄罗斯企业家对要跑那么远的地方，说实话也.....

谢·里亚博科夫：这倒是事实。但尽管如此，俄罗斯和拉美商界之间还是出了直接合作的芽苗。我不夸大它们的意义，但存在范例。在尼加拉瓜可以举以下一个例子，比如，靠“Yota”公司（“俄罗斯技术”国家公司项目下）的努力建立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网，其运作和提供的服务比其它竞争方优越。这是我们国家之间新型业务关系的体现。我们也有其它例子。在厄瓜多尔进行的投标中，我们中标，扩大了能源设备供应量。俄罗斯“动力设备”公司在阿根廷的状况也不错。我国在该地区的直升机销售量也很显著。总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里，我也不能不提到拉美国家至今对派往自己的学生前来俄罗斯就学抱有兴趣。当然其规模不像苏联年代，但就各行和不同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数百人。此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路费和支付应有的助学金的困难。但就是这样一些困难问题也能予以解决。我还没提到文化与人文方面的合作，近来，这些合作很活跃。我们开始经常交流音乐和芭蕾舞团体之间的巡演，并保持其频繁性。

要扩大这种实践，要继续完善，尽管完善方面不存在限度。在一次又一次地回顾我们以往的共同历史，予以了我们为争取未来新的成绩的潜力。我们也确实有可争取做的事。

“国际生活”：那么，是什么在阻挡我们更积极地扩大和拉美地区的联系呢？以今天的这种关系发展速度，不就会失去在一系列领域进行的合作潜力吗？尽管我们不与谁在竞争，但竞争方可不在睡觉。是不是我们的企业家团队还未有为开拓远地的拉美 做有准备？

谢·里亚博科夫：依我看，他们有准备，但只不过是个别的。我们也已就俄罗斯-拉美合作举了例子。我认为，有三个课题是值得我们今后坚持顽强的工作，以便不落后于其他在此平台上的玩家，保持合作发展速度，避免出现停滞现象。第一，我们必须寻找扩大俄罗斯存在于该地区的经济范围。我们的进出口都是单一型的。我们向拉美出口的主要是化肥和某种军事技术产品，轧钢和向一些地方提供电机设备。而从该地区进口的是一些取决于行情和需求的农产品。近来，俄罗斯人对拉美进行的旅游增多。这也是因为传统的旅游地——埃及、土耳其存在问题。除这一切，我们也就没其它物质基础。我们需要向拉美进行投资。我们在拉美的业务确实很微弱，为鼓励发展进程的行政资源也不够。我们的经营还是处于被动地位。我同意你说的，这是对拉美国家的一种惰性态度，而拉美存在着可能性，人家也在叫唤我们。

第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促进应有量的进出口活动和在投资方面提供国家担保？我们也不存在一个整体上能研究和从事促进合作发展的国家机构。许多国家有这种机构，包括中国在内。在此问题上我们也必须进行工作。

第三，为什么我们在和拉美的合作上就落后于其它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遥远的拉美只是作为异国风

情而感兴趣的陈旧框框的限制，我们在颇大程度上还是对欧洲，对独联体，对中国感兴趣。只在办完其它方向的事，才会回过来办拉美的事。我们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一些美术家集体中也存在这种思想。所有这一切很难构筑为一个整体体系，但没有统筹兼顾的态度，我们也不会取得大的增长。当然，在财政领域我们无法与中国比。就此问题上，也得现实点。我们应当靠自己的优越性——地位比较强，人情关系好，未有偏见进行工作，懂得我国是一股重要的国际力量，多元中心、多级世界秩序的源泉。对这方面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拉美确立作用。商界的惰性、资金的缺乏，视该地区不是自己活动主要方向，看来，就是这三点阻碍了我们更积极地发展我们关系的原因。

“国际生活”：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改善形象——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国家的对外政策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此领域的专家公正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信息-文化和其它方面对外联络取决于这个国家及其人给外国留下的印象。一个国家的正面和负面形象势必对其执行的国内外政策予以校正，影响安全。您是否认为我们在“形象”上的工作远非一切都顺利？是舍不得花钱呢，还是时间不够？

谢·里亚博科夫：我同意您的说法，我们对俄罗斯在拉美的形象不够满意。应当寻找现代形式——扩大广播可能性和互联网上的沟通。我们对西班牙语和西班牙语系国家听众方面进行的工作极其少。当然，我们有对拉美国家的广播。也有«Rusia Hoy»电视频道，俄新社和俄塔社都用西班牙语传播自己的新闻。但这些手段在今天实在太少了。用西班牙语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也不多。我们应当将一次性的、断续性的，发行量少的信息刊物变为为拉美国家出版的报纸、刊物的附刊的实践。这种实践已存在。但我们希望将其扩大。如果在对等基础上，以附刊形式在拉美重要刊物上刊登有关俄罗斯商业、文化、社会生活的材料，这个进

程就会运作起来。此外，也还得做电子版形式的工作。其传播面更广，对感兴趣的阶层，包括政府阶层有更大的作用。我们将为，比如说，有关金砖国家活动的报道进行联合编辑和专题节目做努力。对这项工作要抱有兴趣地进行。在拉美地区推进俄罗斯的形象不便宜。但主要的是这些资金被有效利用。

“国际生活”：根据您所說的，您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当然。从事拉丁美洲国家问题不抱乐观态度是不可能的，您说对吗？那您对我们发展关系的前景如何评价？

谢·里亚博科夫：前景？一切将取决于我们自己，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我们在古巴建饭店，如果有更多的巴西足球运动员代表俄罗斯俱乐部出场，尽管气候差异很大，如果智利的红酒和厄瓜多尔的香蕉在当地靠俄罗斯的投资生产，如果我们向该地区继续提供军事技术产品和建造能源设施，如果有更多的拉美大学生想前来俄罗斯就学，那等待我们的是良好的前景。

当然，拉美内部也存在不少自己的问题。但其中大部分问题在于经济增长上。总的来说，此地区的经济和人力潜力是巨大的。

“热带巨头”——巴西在此大陆顺利发展的范例，就是一个明证。

我们在拉美地区要有尊严。应当使那里视俄罗斯为引力中心。我们将为此做努力。主要的是，应当有经过周密考虑的政策，同地区的所有伙伴友好和进行合作。我们今天已有不错的基础，只需将其作为起跑点开始跑步。

“国际生活”：谢谢您，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次采访很有意思，希望往后再与您就俄罗斯-拉丁美洲的合作问题进行交谈。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伊戈尔·伊万诺夫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isivanov@alhouse.ru

俄美“关系重启”：策略步骤还是战略选择？

俄-美近年来的关系是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总统2009年初提倡的“重启关系”的标志下发展。

“重启关系”取代了尖锐的对抗阶段。在美国布什总统的共和党政府执政年代，两国间的关系就被定性为对抗阶段。尽管俄美联合发表了在2002年和2008年得到两国高层赞许的伙伴关系的高调声明，许多专家视这种关系下滑到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底线。2008年8月，所谓的“高加索危机”，在华盛顿公开地站到挑起和俄罗斯武装冲突的格鲁吉亚一边时，这种关系达到其极点。

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是华盛顿在世界上建立美国独家统治政策的反映。美国对联合国和其它多边机制，对奠基的国际法准则，注重武力和单边行动，执意将自己的观点和决定强加于其它国家和人民的傲慢的蔑视政策就出自此。美国单方面地退出1972年反导防御系统条约，绕道联合国安理会武装入侵伊拉克，对俄罗斯及其周边邻国进行露骨地干预，公开无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使俄-美关系起了负面影响。

“关系重启”：华盛顿的动因

2009年1月掌权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接下了沉重的外交遗产。当然，美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不只仅限于俄罗斯一个方面。美国深深陷入了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战争，其在阿富汗也未能取得决定性成就，美国在中东和在伊斯兰世界总体上的地位继续削弱。大多数欧洲、拉美和其它大陆国家的反美情绪日趋高涨。

华盛顿对外政策上的困境，因2008年中期世界领先国家经受的金融-经济危机后果而加深。在预算赤字和国内问题不断增长的条件下，执行巨额耗资的对外政策的可能性达到其极限，已显而易见。无论在美国，还是国外开始经常提出有关美国社会-经济模式是否有效，有的甚至谈论起美国自由主义陷入的深深危机和“美国世纪的没落”问题。

一揽子的内外政策问题，迫使奥巴马政府对共和党外交政策的许多基础进行重审。自然，重审不只涉及俄-美关系。华盛顿开始在和传统盟友关系上摸索新的态度，以加强对话和对做出的决定分担责任为重点。宣布加速美国自伊拉克的撤军，改变在阿富汗的战略。美国的言论也开始发生变化，其开始注重于有意采取多

边、集体行动，同反对方寻找妥协必要性，尊重非西方价值观的表现。华盛顿发出了愿意恢复核裁军进程的信号。

俄罗斯在美国的新战略中又占何地位呢？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最初的1-1年5半），俄美关系被白宫作为通过首先解决对华盛顿具有头等重要的外交问题的棱镜待之。与俄罗斯的“作用点”合作应当促使落实美国政策的任务。这首先牵涉到阿富汗问题。美国及其盟友的联合军战役成功与否，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立场。俄罗斯一直留为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关键玩家之一，没有俄罗斯一方参与，就很难认为在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上会有进展。同样，美国在和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上需要与俄罗斯合作。对美国来说，保障莫斯科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进行原则性投票时的忠诚极其重要。相对来说，重要性虽然次一步，俄罗斯在保障世界能源市场稳定和对美国其它一些重要的资源商品的稳定还是起了重要作用。

从地缘政治一面来说，俄罗斯转向亚洲引起华盛顿的忧虑。这首先涉及俄中合作深化的走向。就凭自己拥有的自由式演说术，奥巴马政府自一开始就视中国为美国主要的全球竞争对手，因此，反美的俄中联盟形成的可能性，不能不使美国担忧。在此语境下，美国外交开始对像上合组织、金砖四国这样的地区合作的多边机制予以重大关注。

应当指出，克林顿任总统期间，与俄罗斯和在俄罗斯工作有巨大经验的人返回政府，成了“重启关系”的主观因素。这些人在华盛顿的执政机构建立了独特的“俄罗斯走廊”，将自己的职业野心和“重启关系”政策的成就相连。一些观察家证实，奥巴马总统自己也渐渐地开始“深入”俄罗斯问题，开始对俄罗斯表现更大的兴趣。

在美国对外政策优先方向系统中，“重启关系”的作用和地位开始逐步增长，这又与民主派政府的“新方针”在其它方向未

能取得显著成就相关。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依然很复杂，中东的调和进程止步不前，阿富汗问题上也未能显示取得肯定的成绩，美国和欧盟在摆脱危机的战略问题上仍然有分歧，等等。“关系重启”几乎成了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上取得的唯一成就，因此，本作为应用手段的“重启”开始变为独立的外交目标。

莫斯科的动因

俄罗斯一方又怎样呢？看来，可以归纳为三个利于和美国“重启关系”政策的前提。

首先，2008年秋，莫斯科面对了外交上被孤立的威胁。俄罗斯南高加索的政策（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未能得到任何多少有分量国家的支持。俄罗斯在独联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四国的伙伴也未予以支持。俄-美关系的紧张水平达到临界线：双方不友好的言论令人想起冷战年代。俄罗斯和北约间的关系也被冻结。欧洲的反俄言论加强。俄罗斯领导不能不顾及到潜伏于这种趋势的风险。

其次，俄罗斯开始愈加感受到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果。如果2008年在莫斯科流行将俄罗斯说成是世界经济漩涡大洋中的“稳定岛屿”的话，那么，在年底显现的是俄罗斯不仅逃避不了危机后果的影响，其受到的影响甚至比其它发达国家还要大。世界危机使那些因各种原因企图贬低俄罗斯对全球发展趋势依赖性日益增长的俄罗斯政治家头脑清醒了过来。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峙的加强，能为俄罗斯经济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三，俄罗斯领导宣布的“现代化改革”，即，意味加速从资源型经济模式过渡到创新型经济模式的政策，在和此领域拥有实力的国家处于对峙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落实的。

鉴于此，可以说，2009年初出现的俄-美利益的投合，使双边关系过渡到新的，获名为“重启关系”的阶段。

谁胜？

像拥有全球利益国家的俄美间的关系，要发现能客观体现哪一方在合作上获更大优势的标准是很困难。与此同时，可以肯定地说，“重启”为双方解决符合他们利益的问题开辟了良好的可能性。

2009-2010年，客观地发生了俄-美重大利益相吻合现象，从而决定了“重启”上取得的初步成就，甚至产生有望对两国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寄托。但是，如果说在俄罗斯和美国就“重启”问题上存在稳固的妥协，那也是不对的。“重启”政策自伊始就伴随了两国国内的尖锐批评。

“重启关系”上取得的具体成就主要又能归纳为哪些方面呢？

毫无疑问，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依然是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3”条约。该条约在短促时间内起草并成了向削减两国战略武库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俄美两国国内有不少批评条约的人，但就总体而言，其符合两国的利益，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两国就重组战略核载体和复兴了几乎丧失的对削减进行核查机制的计划。条约的签署予以俄罗斯和美国加强进行反对核武器扩散斗争道义上的权力，同时呼吁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家加入监督核武器的进程。美国参议院批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3”条约显示，共和党反对派当时也未能对“重启”战略提出疑问。

奥巴马总统对莫斯科强烈反对的反导防御系统的发展问题上，宣布了更灵活的立场。美国此不变实质的立场的举措，是为示范美国新政府愿意就国际安全问题和俄罗斯进行对话。

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3”条约为扩大俄-美核能领域整体合作创建了前提。为俄罗斯核能公司打开了美国市场的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作协议（所谓的“1-2-3协议”）于2011年生效。

允许驻阿富汗的美军及其盟军利用俄罗境内“北方走廊”运送军用物资达成的所谓“阿富汗过境”协议，是“重启关系”政策取得的易见的成就，特别是对美国来说。达成的过境协议并非意味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依然是受莫斯科尖锐批评的课题。比如，俄罗斯政务家指出，联盟军实际上纵容阿富汗毒品生产空前地增长，其中大部分贩留在俄罗斯境内。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承认美国驻留阿富汗在总体上对整个中亚地区起稳定作用，因此，也就认为有可能向美国提供有限的，但并非次要的支持（甚至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建立北约运输-物流中心）

在抵制恐怖主义和贩毒的合作更具有系统化。

美国和俄罗斯就伊朗核问题的立场靠拢，是“重启关系”的重要结果。在继续坚决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今后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同时，莫斯科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在和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方面设定了一定的限制。正是俄美的合作，在颇大程度上就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采取附加的国际制裁措施达成一致，同时保留了对伊朗核计划起正面和负面的刺激制度。

谈及“重启”进程中落实的主要是俄罗斯的利益，除上述已提到的，还得再加几项。

首先，在“重启关系”政策的作用下，美国比以往对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的战略利益予以更多的考虑。当然，华盛顿没承认，也不可能承认莫斯科对此境地特殊“影响领域”的地位，但华盛顿开始更注意聆听俄罗斯的忧虑。美国政府在2008年8月战争后，开始

对格鲁吉亚的军事技术援助有更大的遏制，并减少了支持萨阿卡什维利制度的宣传演说。白宫，尽管心怀不满，被迫承认尤先科在乌克兰总统选举上的失败，视“亲莫斯科派”的总统候选人雅努科维奇胜选。有关北约继续东扩的问题被搁置一边，这在颇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不对俄美关系加以额外的刺激。美国改变自己对于前苏联地区政策的优先方向是如此的显见，以致于成了共和党反对派将奥巴马总统几乎说成是“背叛了”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理由。

对俄罗斯来说，“重启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美国缓和了对俄罗斯政治体系和人权问题上的尖锐批评。当然，民主派政府不能完全放弃维护人权的口号和支持作为自己对莫斯科的战略任务之一的民主。但在实践中，此任务退居后台：民主人士以吸引俄罗斯就发展公民社会制度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完善民主机制“交流经验”等的策略来取代强硬压力。

最后，应当另外指出俄-美在解决俄罗斯加入世界世贸组织问题上的合作。应当承认，没有华盛顿的积极支持，入世进程将变得更长，更复杂。美国对自己的一些伙伴施加了压力，为俄罗斯取消了入世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尽管如此，得承认，“重启关系”政策并没有使俄-美贸易有显著增长，或美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有显著增长。同中国、德国、意大利和许多其它国家相比，美国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地位是微弱的。

在对俄-美2009-2011年关系“重启”做总结，在整体上，可以说是其应对了一些易见的，阻碍了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俄美总统提倡建立的双边总统委员会，使两国就广泛的合作问题上进行的对话出现新的音调。如果将俄-美2011年秋的关系同2009年秋关系的“底线”相比，那么，取得的实质性的进步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往后怎样呢？

要承认，就取得的各方面成就的“重启关系”，还是未改变俄-美关系的基础，未能使继续生活在被冷战陈规俘虏的两国社会的情绪发生不可逆转的转折，未能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一级水平。在像制定如此重要的“削减进攻性武器-3”条约时，双方都以旧的战略稳定概念为鉴，如“战略遏制”、“核均等”、“确保互灭”、“回击的潜力”，等等。在围绕反导防御系统进行的辩论上，高度的互不信任尤为尖锐和显著。俄-美关系中还未达到相互理解水平。

2011年中期，最初启动“关系重启”的推力用尽：俄-美关系中，在保持传统关系模式框架下能取得的成就，几乎都已取得。只有从质上改变这种关系原则，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关系。为此，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未有准备，这种态度在两国进行大选的竞选运动中特别明显。最终，提上首位的是愈加明显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牵涉到俄美所有配合领域中的潜在冲突。

上述一切，自然，不意味俄-美返回到冷战时代的对峙。布什总统政府的经验显示，在现代条件下，存在对俄-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客观限度。例如，很难想象俄美之间将恢复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财政、经济和政治限制器势必会阻止此剧情的发展。俄美不见得为破坏相互方的地位，有意识地动摇地区稳定，或为此目的以扩散核武器进行威胁。莫斯科和华盛顿仍然相互需要，因此，相互竞争将具有限制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6月18日在洛斯卡沃斯举行的会谈结果，示范了两国为继续渐进性发展关系做出努力。

对今后短期内的俄-美关系进行预测的话，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都将会回避采取能导致双方关系陷入严重危机的举措。这种事态发展不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对存在的分歧和问题将会予以承认，但这将不会导致紧张关系无节制升级。存在的合作工具，看来是会被保留，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配合渠道将继续运作。

第二，俄-美关系将会受到外部因素日益增长的压力，如，世界各地的局势。持续的叙利亚国内战争，看来，将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关系复杂化的额外因素。围绕伊朗问题局势的尖锐化，同样会对双边关系起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以武力反对伊朗核项目的问题上。世界经济下滑为新一轮危机将加强两国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这又将会增添两国关系的复杂性。

第三，期待今后几年在双边关系上会有突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对坚决过渡到符合两国长期利益的新合作原则，顾及和尊重相互利益及协作解决现代世界尖锐问题的伙伴关系，还未形成稳固的意识。这是一条漫长和荆棘载途的道路。

打破绝境

任何从事国际事务的政治家或专家都会同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合作不仅对我们两国，但也对世界局势整体来说继续具有重要意义。是的，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不再是两极世界，但没有俄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要解决现代世界的许多问题是极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提高国际制度的效率，调解地区冲突，打击恐怖主义与核扩散，寻找对全球化提出的新挑战和对国际安全进行的威胁的答复——所有这些任务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取得解决。如不是俄罗斯和美国，那么，由谁为维持和平，领衔此进程承担特殊责任？

那么，要打破俄-美关系业已形成的这种不允许将合作提升到长期互利水平的“缓和一对峙”绝境该怎么办？

第一，不必将分歧戏剧化——分歧能存在于最亲近的盟友之间。但产生的分歧，无论其复杂性和痛苦性有多大，还是不能封锁在其它方向的关系发展。重要的是不要中断对话，就是立场有显著分歧的话，也不要中断。就算当前拟定共同立场的可能性渺茫，但拥有交往渠道，总比没有好。没有对话（比如，有关阿富汗中长期未来的问题），甚至能贬低对靠共同努力（“阿富汗的过境”）走上对话的策略上的成就。

第二，鉴于俄罗斯加入了世贸组织，双方能更积极地利用就此为双方合作开辟的新可能性——具有前景的远东发展计划，开拓北极，国际能源项目。近几年已落实了其中一些，但这太少。需要规模性的项目，需要私商、独立中心更积极地参与此进程。

第三，公民社会一面进行的合作必须提升到新的水平和建立新的原则关系。美国经常表现的，俄罗斯社会不接受的家长式主义，是可以解释的。应当让位于互尊的，顾及到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政治现实的对话。为此，需要双方做出针对克服官僚的惰性和惯于陈规思维的努力。

第四，现在已到过渡到在实践中推广现代合作机制的双边关系的时候，这种关系将不是由政治上的一时需要来决定，而由两国的长期利益来决定。为此已具备有所有的可能性。问题取决于政治意志。





谢尔盖·拉佐夫

俄罗斯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使

俄罗斯与中国相互需要

从暂短的历史角度来说，中国，出乎众多人的预料实现了“大跃进”，并成为领先国家之一。几十年来，似乎是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又突然跃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呢？

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是中国政府经周密考虑的系统化政策和千万中国公民改革30年中勤奋劳动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尽管国家在发展上存在沉重的包袱，中国继续沿着发展和现代化道路挺进。

对中国，就像对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无需进行理想化，或是戏剧化。肯定也会后人中国的经济成就感到恐惧。但就像普京在自己二月份撰写的题为“俄

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一文中写道，“中国经济的增长绝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拥有巨大务实合作潜力的挑战。”依我的看法，坚持寻找两国利益的契合点，在互利基础上发展合作，这是主要的，更好是联手进行。同样，重要的是懂得俄罗斯需要的不仅是繁荣昌盛和稳定的中国，而且，我再次援引俄罗斯总统的话，“就中国而言，其也需要一个强盛和成功的俄罗斯”。不仅不干预俄罗斯成功地发展社会-经济，同时积极参与此互利发展进程，有利于我们的邻居。

历史教训

今天的俄-中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上，顾及相互的忧虑，在原则问题上相互支持，无建立军政同盟之意，不针对第三国家的基础上，实践显示，这种关系具有稳定的生命力的架构。

两大邻国这种性质的关系，今天似乎是很自然，甚至是天经地义事——在世界政策中具有分量和夺目的现象。不顾及历史教训来构建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

这种显而易见的首要教训之一，在于1960-1970年（80年代约少）苏联和中国都过余热衷于捍卫各自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对社会制度，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看法。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直接投影于国家间关系领域。最终，双方对只有在非意识形态化条件下才能将关系正常化取得共识。当然，这种立场并非意味各自一方就不能有对邻国发生的一切，对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改革、保障人权和公民自由，等等一些方面持有自己的看法。

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实践，使对相互关系实行的势必取决于占统治思想、理论和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过渡到更合理和有效的利益政策。

相互顾及，并尽可能共辄这些利益，是下一个重要教训。

对俄罗斯和中国在关系正常化阶段上的根本利益进行的比较和无成见的分析显示，其主要方面相一致或吻合。这就是和平与发展：为人的利益发展经济和社会，以及为此创建排除外界强加于他人意志的良好的和平条件。

随着俄-中确立这种理念和在国际局势迅猛变化背景下，相应地顾及伙伴的切身利益，他们的耦合，继后在伙伴捍卫其国家-民族的关键利益上予以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越趋明显和几乎能兑现。

毫无疑问，在利益上也存在区别。从战略角度而言，应当心平气和的待之，因视其为历史、地缘和其它条件造成的后果的现象。策略上——双方该寻找相互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及时采取积极，针对性的措施，以防这些问题升级到对相互合作与配合的主要战略方向提出疑问，更甚的是受到威胁。

俄-中边境成功地划界，就是这种建设性态度的实例。尽管存在历史性困难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边境谈判进行了整整40年），非同一性和两国社会舆论对此问题的极度敏感心态，双方示范了真正的国家明智和远见，克服了狭义利己的观点，找到各方能接受的折衷办法。其历史意义，深信后一代会做出评价。

俄-中从过去的关系经验中吸取的另一教训——企图相互遏制的无前景性。

我们可以回忆两国为这种遏制付出何高的代价，此政策在国内和外交上外带来何等巨大的耗资。自1960年年底至1970年年底，中国为和苏联可能发生战争进行的备战，每年用于军需划拨国家预算的半数。苏联，根据一些评估，为了沿中国边境建造军事项目和设施花去2000亿卢布。正当其它国家走上加速发展的道路，中-俄却被军事对峙搞得筋疲力尽。双方早就认识到此政策带来的损失，他们首先开始缓解共同边境上的紧张局面，然后取消毗邻地区的大批武装力量。近年来，俄中成功地举行了规模性的，针对打击恐怖主义，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两国武装力量的联合操练（今年4月在黄海举行了俄-中海军演习）。

近数十年来，我们同中国关系的经验证实了两国各层次——国家领导、集体和专家团队，广泛的社会团体之间深化互信的重要原则。

从这个角度来说，近年来，广泛的和构成俄中政府间对话的机制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两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进行的定期会晤，实践显示，这些会晤每次都显著地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促使了合作上关键问题的解决。政府副总理就经贸、人文、能源、金融合作问题进行的频频接触；这是20个各种分委会、工作小组和其它行业部门部长或副部长级的常设机构；立法机构、政党、社会组织间在进行积极地合作。俄罗斯未有同任何国家有如此广面的合作机制。在业已形成和在成功运作的机制框架内，双方有进行具体互通采取的行动、打算和动因的可能，消除相互的忧虑，解决具体的问题。

为深化相互信任，根除还存在于俄中两国的陈规旧套，有时，甚至是对伙伴国及其人民的偏见，必须全面加固两国间关系的社会基础。这项任务正在积极地被落实。2006-2007年两国落实了一项空前项目——俄-中国家年，此项目为扩大文化、教育、体育等联系及其它人文领域的相互信任起了强大推动作用。2009-2010年在中国举行了俄语年，在俄罗斯举行了汉语年。“友谊世代相传”纲领被载入双边的基础文件中。这是中俄两国人民间友好往来的历史经验的聚合。另一方面，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为其的落实双方必须坚持不懈的努力。

像俄中如此互不相同的大国，成了世界和平、互利共赢、友好典范大国合作的楷模。这无疑是为确保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联合做出的重大贡献。

应当珍视和珍惜这种财富，牢记当代人得到此财富来之不易的途径。在吸取以往教训和对经验进行研究的同时，要对构建俄中未来的关系进行周密的考虑。

两国今天的关系

1996年俄-中宣告建立平等互信的，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双方签署了“俄中睦邻友好与合作条约”，凝固了关系的基础原则，确定了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双方为建立稳定的俄-中合作的法律基础，确保在实践过程中落实达成的协议并最终将双边关系推向历史上的新水平，联合进行了巨大、仔细繁琐的工作。

近来，我们和中国伙伴将双边关系称为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方位”一词是2011年在双边合作覆盖了合作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方向后加以确认附加的。

俄中两国国家元首按惯例在各种形式，包括国际论坛“厅外”形式，每年进行数次会晤。2012年也并非例外——已举行过几次会晤，今年6月份双边关系上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国家元首间的频繁接触——不仅是关系规模和深化程度的指标，其还显示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为做比较，我们可以回忆苏-中42年的关系（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91年苏联解体），两国领导人只举行过7次会晤。

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定于下半年举行（这次轮为在俄罗斯举行）。在此会晤前夕将举行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以及20个部门间分委会和各行及各种合作方向的工作组会议。

俄中许多部门间在进行积极地合作。两国外交部也肩负了不小的工作量，双方定期就双边合作的各方向 and 在国际舞台上进行配合的问题进行意见交换。

人文联系也愈加具有重要意义，享有高度社会意义的人文联系对双边关系的整个气氛有显著地影响力。在电脑时代和博客领域的“膨胀”，也不得不对信息流量予以特殊的注意。

另外，必须指出，两国国家元首就2012年在中国举行俄罗斯旅游年和2013年在俄罗斯举行中国旅游年达成一致。这些规模性国家间的活动项目，是早先双方举行的国家年和语言年的自然延伸，并将促进我们两国人民进一步加深相互理

解，相互发展旅游业。顾及到两国的规模和长知的吸引力，其潜力是无穷的。

务实合作

经贸是合作的主要的方向。今天，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世界最高国家之一（2011年为9.2%）。迅速发展的中国为邻居给俄罗斯带来不少机遇。

2011年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达835亿美元。中国成了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则稳居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前十位。

这里我得指出，在世界贸易联系处于停滞的背景下，贸易高速增长就尤为显著：去年为——42.7%，今年第一季度——33%。在保持这种速度的情况下，我们能很快地落实两国国家元首提出的将双边贸易额增至1000亿美元的指标。

当然，对双方贸易的结构不能为大家满意。我国的出口商品以资源为主，机电产品份额极少。中国出口俄罗斯的产品则完全相反，其商品结构机电和设备居首位。但这种局面也是今天俄罗斯外贸整体的特点。

在投资合作领域也存在问题。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投资积极性剧增，但在俄罗斯这种现象不够显著。例如，2011年中国对俄罗斯非财政的直接投资为三亿美元或占中国境外投资总额的0.5%。

但也存在不少落实成功的大型合作项目的例子。2011年1月1日启动了作为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系统的俄-中石油管道。通过这条管道，俄罗斯石油输往亚洲市场。2011年夏，按俄罗斯技

术和基于俄罗斯设备在中国建造的铀浓缩工厂第四期工程竣工。俄罗斯专家设计的快中子实验反应堆也已启动。今年3月签署了俄罗斯向中国提供为期25年的电力合同。

两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的合作在继续。就俄罗斯向中国提供天然气的项目，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存在扩大经典核能合作的良好前景。鉴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中国有关部门对本国的所有核能项目，包括对有俄罗斯参与建造的田湾核电站第一期工程在进行安全评估。根据中国专家拥有的资料，田湾核电站被公认为中国现有核电站最安全的电站。现在正在为利用俄罗斯反应堆的第二期工程的施工做积极准备。

俄-中务实合作的新起点应当是地区上的联合项目，这些项目既应当在众多的俄-中跨地区联系框架内（俄罗斯有40多个主体和70个市和中国的地区行政单位建有兄弟城和友好关系）加以落实，也在2009年由两国领导人通过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2009-2018年）间的合作框架内落实。此项规划成了长期协调两国有利于发展毗邻地区做努力的初次经验。

两国在交通、通信、飞机制造业、宇宙探索、科技和军事技术等众多项目领域进行合作。在农业领域还存在未挖掘的巨大潜力。中国对农工综合体产品的需求在增长，俄罗斯能部分地满足邻国对此的需求。

值得提一下有关为俄中两国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直接结算创建基础结构的步骤。2010年，在两国外汇交易所实现了卢布-人民币

挂牌的交易。俄中企业家能避开美元直接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从而逃避了汇率风险和简化了贸易手续。

近年来，在自然保护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合作园地：几乎是从零点起家建立了合作机制，签署了有关保护与合理利用跨境水域设施的重要协议。其对两国界河及水库的水利调节，保护边防地区各种生物有极大的重要性。

走向多极世界

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相互配合——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部分，其基于对全球和地区关键问题的统一立场。

俄中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制定凝聚各方的积极日程，加强国际政治的多边和法律基础，为国际进程的所有参与国创建平等条件。俄中在国际舞台上合作的主要方向载于2011年6月两国国家元首在莫斯科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中。

我们高度评价同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组织及论坛框架下的伙伴关系水平，两国持有近似和一致的立场。除联合国外，这里所指的还有像“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及东盟和东亚峰会一些重要平台。

这里想特别指出，由两国首脑提出的以亚太地区安全不可分割为原则，在亚太地区创建共同安全架构的联合倡议。我们提议地区国家重申对国际法基本准则原则的忠实，放弃对峙和靠牺牲邻国的利益来加强自身安全的企图。我们邀请地区伙伴就在亚太地区构建立基于非集团性法律的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进行讨论和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今年——俄中两国具有重大政治事件的一年（秋天，中国将举行第18届党代会并组建所谓的第五代中国领导的核心）——证实了继承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方针，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深信，双边关系将会继续增速，俄中两国将会进一步落实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在国际舞台上深化协调行动。

普京指出，不用担心俄中关系中存在的“不大融洽”的现象，任何国家间的关系中都能存在这种现象，更不用说世界大国之间。关键在于俄中两国相互需要。





谢尔盖·纳雷什金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

俄罗斯与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 历史和前景

今年10月2日，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监测决议。我国代表团一致投“反对票”。因为其中许多条款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就决议将以如此强硬和不体面的形式通过，在会议开幕前夕就已很清楚。我决定推迟走访斯特拉斯堡。在这种挑衅文件背景下，欧洲议员是听不进我说的话。可我要说的不是有关此决议的事，也不是有关存在的分歧，我想说的是有关战略优先性和克服共同面临的威胁途径问题。不就是为了这个主要问题，我们国家和人民进行了联合并对一些像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平台提出需求。

不是别人，正是欧洲委员会提出统一的大欧洲——繁荣和进步的欧洲——只有在联合所有人，而不是分离所有人的基础上才能建起来的思想。如果我们能聆听和深入领会各方的论据的话，我们能胜任此项任务。但为在21世纪的发展拟定团结的欧洲的议程，目前还成问题。

今天的地图上不存在“冰凉的”对抗分界线。但在一些政治家的意识中，这些分界线难以消失。是的，我不是第一个在继续谈这个问题。因为对抗的逻辑始终未消失，就是在斯特拉斯堡组织，也没消失。其主要原因——已成惯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在该组织寻求对话可能性的伙伴，也持言行不一致的态度。

很清楚，这妨碍了我们共同前进。斯特拉斯堡组织在欧洲制度中威信不高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将所有47个成员国说成具有统一法律空间，也多亏欧洲委员会拟定的法律文件。在借助其它地区联合体和联盟可能性之前，全欧的问题，首先应当在欧洲委员会主持下予以解决。

为什么今天谈论此问题如此重要？因为，旧意识形态“行李”不让解决严肃的新问题。以自己独一无二的优越性（200多个公约和其它国际法定协议，包括针对预告现代威胁的文件）为支柱，欧洲委员会不仅能，而且也应该集中精力解决主要任务——建造未有界线的统一欧洲。前几年，俄罗斯轮为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主席时，就是在“走向无分界限的统一欧洲”口号下主持的。

近几年来，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公开和诚挚地讨论了在科索沃买卖人的器官，所谓“中情局黑狱”和因北约在利比亚进行的战役，致以地中海数十人死亡等一些棘手问题。俄罗斯提议在欧洲委员会框架下承担全面责任，对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不容忍性和按民族、宗教、文化和其他标志划分的歧视予以及时回击。这也是一系列宣誓自己是正宗的欧洲和民主国家共存的问题。

此外，今天还应当从事像保护儿童不受虐待，性奴和淫秽色情这样的一些敏感问题。回击违反自由迁移、难民、移民、囚犯权利的现象。

我认为，有必要提请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对保护历史性纪念的关注。欧洲人为二战的胜利献出上千万生命。我们无权对企图遗忘被写入联合国章程的纽伦堡法庭的决定现象无动于衷。俄罗斯作为牺牲人员规模最大的国家，将一如既往在联合国、斯特拉斯堡组织等国际组织坚持这些立场。

深信：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能以往年的教训和展望欧洲的未来，公开的和具体的谈论这些问题。其今天与民主的命运直接向挂钩。

鉴于世界金融危机（除了其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许多欧洲国家已面对了居民对传统运作的民治制度失去信任的现象，甚至政权制度的合法性都被打上问号。

由金融危机迫使的厉行节约引发的反抗情绪和极端势力随时做好上街进行抵抗的准备，使之被各种蛊惑力量利用。他们

提出“简单的解决方式”，这些方式往往借助排外主义和激进主义，挑起新的街头抗议示威。与此同时，社交网普及性的增长又能迅速组织群众性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推举新的领导。按惯例，他们没有未有公共策略家的经验，但这也不妨碍他们诉诸“人民的意志”。

可以说，现在，靠互联网得到积极发展的已不是虚拟的，而是绝对现实的“另一个世界”。其有自己的媒体、进行辩论的平台和未有国界的巨大动员力。所有这一切向传统的民主社会，向习以为常的现代基础挑战。

那么，在对政权的合法性，其做出的决定，法院的公正性提出质疑，而最终目标又是破坏国家稳定时，该怎么办？只字不谈责任和义务，而向社会，首先是针对我们的青年灌输个性自由的绝对性时，又该怎么办？

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这样的组织进行的辩论显示，我们欧洲人就是在危机形势下有能力抵抗蛊惑人心决定的引诱，不各自回“小窝”形影相吊来解决这些问题。

欧洲也确实认识到，稳定的国家不能没有强有力的民主。但民主价值的实施和社会公正的行使本身，就需要国家的稳定。

为此，我认为，必须坚定不移的和共同来恢复相互的信任，培养对法律的尊重和加强其价值观念。在对国家立法进行现代化修改时，要顾及新的现实，深入研究和回避只限于扩大禁止性框架的途径。

是的，这是极度困难的任务。但对所有最复杂的问题，应当进行公开的和诚实的讨论，使得我们大家能共同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能经常听到在谈论所谓的“代表性民主危机”。依我看，这不是“危机”，而是向下一阶段议会主义发展客观性的过渡。应当心平气和地与此进行工作：既在国家内政上，也在寻找更新形式的议会间合作上进行工作。后者的工作尤为迫切，因为新的挑战往往是全球性的。

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成为其它欧洲和地区组织组建跨议会机构模式前，致以欧洲委员会及其议会大会建立的关系和构架，经过了持续的和艰难的演进。

20世纪下半年也以跨议会机构增多为标志。其主要是通过进入新的跨政府组织架构而出现。欧亚（后苏联）空间也不例外。1992年确立了独联体国家跨议会大会，1993年——黑海国家经济合作大会。往后建有欧亚经济合作、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跨议会大会和俄罗斯-白俄罗斯议会大会。

今天，欧亚议员间的合作正在经历，可以说是决定性阶段。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代表进行的联合工作就是实证之一。我们（实际上首次在欧亚现代史上）开始讨论未来议会一体化的可行轮廓。

此任务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建立了关税同盟和三国统一经济空间。提出了以下雄心壮志的目标——在2015年形成欧亚经济联盟。

这里（如同欧洲议会主义历史），再次产生最佳模式选择的问题。就像以前曾不止一次有过的，关键问题在于：组建国家代表

团的程序，走向超国家模式阶段性（速度）的运行和未来议会机构和跨政府一体化组织间关系的性质。

我们没忘记国际议会——欧洲文明关键的政法思想之一。但我重复一下，在构成自己现代轮廓之前，此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深信，在独联体国家空间，这种构想同样具有巨大的前景。何况，连接独联体国家人民的是长期的共同道路，相似的文化价值关和牢固的人情关系。

同时，不能忘记，现在，制法是今后世界发展占优势之一的活动。这是针对今后的趋向。而首先——为俄罗斯和认识到社会-政治现代化改革必要性的其它国家。

这是具有重大责任的历史阶段，应当最大限度地被有效利用。新一届杜马的第一次会议（春季会议）已获政治现代化改革会议之名。我提一下会议的一些重要结果。我们取消了议会党派为自己候选人征集签字的规定。按新规定成立的新政党（已登记的有40个，待注册的还有约200个）正在进行注册登记。为了和他们建立对话，我提出在国家杜马建立非议会党派委员会的建议。我们恢复了俄罗斯区域首脑的直接选举。

下一步——制定改变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议组建的新法律，执行市长选举制。

国家杜马不仅将仔细分析各级水平上进行的新选举运动，并在总体上更积极地对法律的应用进行监测。因为，我们至少得确信制法上不能有过失。

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成了我国第一个开始积极推广“电子议会”模式的平台。这项工作联合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希望最新的现代技术将会帮助议员和议会记者团更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更主要的，这将使我们的选民和在杜马代表他们利益的议员经常保持联系。

我再补充一句，这是一些说明俄罗斯议会中发生重要创新变化的个别例子。2013年我们将庆祝议会20周年。

我想强调一下：为争取民主，就得进行斗争。为争取议会民主——几乎得天天进行斗争。就像说的，民主的消亡不在于法律的懦弱，而在于民主人士本身的懦弱。希望这不是我们的现象。

我们完全懂得：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次性争取到的或先验取得的民主标准。但在人为强加的分离逻辑条件下，今天，问题政治化趋势的增长，能将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引向歧途。

民主、法律至上、法治国家价值观——奠定了俄罗斯宪法基础的公理。我们和世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遵守这些公理。我们认为，不能利用这些重大课题作为竞争和作为转移欧洲对现实威胁视力的武器。我们呼吁所有伙伴共同努力，以便解决确属共同的系统问题。

我们呼吁，是因为在艰难斗争中争取到得的代表性民主，无疑，值得我们为其进行共同努力。此后，在我们的战略合作上能出现崭新阶段的开端。

深信，能发现符合真实意义的战略目标，能为我们更正确的指出优先方向和更快地将“糠粃和谷穗”分开助一臂之力。我们共同和为共同的福利再将选种培育出现代议会主义的新谷穗。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根纳季·加季洛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gmgatilov@mid.ru

对付危机的经验或者国际社会应该保护谁？

现在这大概是政治家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九月份开幕的联合国第67次大会过程中这是讨论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按一批国家的建议甚至在它们“场所”举行了专门的非正式活动“保护的责任：坚定防止群众性作恶的信念”。原因是在国际舞台事态发展影响下世界对危应对哲学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方面的最近事件是利比亚和叙旧冲突，它们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过去调解冲突的经验。意见各不相同，但毕竟重点在于预防努力和落实自己政府保护平民的责任，不要把事情推给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大部分是西方国家在呼吁注重防止措施的同时，又认为如果此行动失效，只能采用武力方案。

自然，风向更变直接涉及到了联合国。它的维和活动明显地从传统的恢复和维护和平行动转向多组合，多功能的，花费巨大的使命。这种行动越来越希望得到职权的“增强”，为了高效完成维和使命而得到航空技术和监察手段。而且把主要任务看作是对安全威胁的及时应对，甚至要求得到使用武力的全权。大部分维和使命和所有参加者行动性质实际上正是在这种任务下形成。

保护平民，包括利用联合国潜力，毫无疑问是调解冲突所有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可是，把它作为唯一的重点或者更糟地利用它来进行武力干涉，达到政权更换却是错误的。

对“热点”事态分析证明平民受害，成为冲突的牺牲品是军事对峙一方故意袭击和着手调解者不加选择地或者过分地动用武力的结果。

例如，在阿富汗，按联合国资料，2011年有3021人被打死：2332人是由于反对派的武装分子，首先是塔利班的恐怖行动，结果410人在亲政府力量和国际安全部队的军事行动过程中死亡，187人被北约飞机炸死。从2007年以来阿富汗共有11864个和平居民牺牲。

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的反恐怖行动过程中死亡的平民数量也没有减少。众所周知，大部分是被无人飞机杀害的。由此可见，本来为了避免平民伤亡的高度准确武器，原来只对使用者方便。他们没有损失，可是给“地方”带来民事设施的破坏和死亡，包括无辜的平民。而且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即最容易受害的平民。自然，这不能不引起谴责浪潮。正因为这样，许多法律学家认为使用“无人飞机”是实行无法庭审判的处决。

国内流民也没有减少。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从今年四月以来由于政府军和起义集团的军事冲突使流民增加了二十二万人。

最的几十年来联合国安理会为保护危机地点的和平居民做了许多工作。联合国为具体行动制订了保护战略和原则，实行维和人员的综合性培训，包括为了履行这些任务。解决了调节射击武器、轻武器、地雷和爆炸物的问题，经常注意流民和难民，还制订了帮助冲突涉及到的居民的高效机制，包括提供人文援助等等。

很明显，武装冲突的所有各方，包括在该区的国际部队，都按照国际人道法律承负义务。但保护平民的主要责任应由这些国家自己承担，国际努力应加强它们在这方面的行动。

可是，如果政府不能或不愿意保护自己平民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应该怎能样做呢？“保护平民责任”理论是对此问题的明确的回答，各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在2005年峰会上议定了它的框架。

峰会最后文件第138、139和140条确定的关键点如下：1) 理论只是在为了应付粗暴违反人权-种族绝灭、军事罪行、民族清洗和反人类罪行时才可采用；2)。国家承负保护自己居民免受残害的主要责任；3)。国际社会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国家履行保护职责，在“保护责任”范围内的强制措施只能按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VII条通过的决议采用，如果和平方法不够，而民族政权机关显然无力保护自己居民，

可是经验证明，各国对此理论范围及其实行的解释很不相同。最尖锐的分歧出现在需要采取武力干涉的“及时和坚决应对”时

刻。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批准使用武力的决议，个别国家及其盟国能否按这种模式行动呢？还有一个并非次要的问题。可以用何种方式和规模采取强制行动呢，即便联合国安理会给予了相应的权利？从最近的例子中，利比亚事件和现在的叙叙利亚危机背景下出现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最明显的分歧。诚然，对保护平民的方法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在提出完全具体的，更换不满意的政权的政治目的的情况下，难于对复杂的局势协调集体的应对措施。

从法律观点看来较能理解的人文干预例子可以在部署了联合国“蓝盔”的地区找到，他们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给予的相应职权，协助保障对平民的保护。安理会在保障维和行动中为解决国际社会委托他们完成的复杂任务而采用应有的手段和必要全权方面起关键作用。

可是那些促使联合国安理会授予其保护平民职权者，试图利用灰色地区进行迂回，按自己的方式解释授予的维和职责。例如，在科特迪瓦，2011年三、四月间直接干涉了该国的选举危机（而且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联合国官员们违反了无偏袒的维和原则，公开使联合国使团偏袒冲突的一方。这实际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结果发生了军事冲突，反对派赢得了胜利。不管这个非洲国家的政治事态如何发展（顺便提提，至今没有稳定）联合国的这种行为是违反维和基本规则的偏袒例子。

值得指出的是，对行动的新一代-更严格、活跃和职业的行动并非都符合为之提供自己资源的国家的实际可能性。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保护方面的潜力和效率往往被人员、军事技术和物质资源的缺乏所局限。维和人员需要在不稳定和“不可控”的政治局势中

和实际完全没有安全的适宜条件下行动。如果过去禁止以火力报复火力，通常只是在已经停火并且在冲突各方同意的条件下下建立缓冲区分开他们，现在“蓝盔”不得不在全面军事行动条件下工作。结果维和人员被迫成为军事冲突的参加者，导致增加本身的伤亡。

正因为这样，在多组合行动背景中，当保护平民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任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关于应该确认哪种应付方法对局势适宜的分歧。实际情况是暂时还没有对此问题确定共同立场，往往立场由于关键人物的好感与反感确定，而主要是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冲突局势的政治议程。强力干涉的拥护者在必要时会忽视这样的事实：在良好的目的掩护下的类似干涉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平民伤亡，严重损害人权，首先是人的活的权利。

这里伊拉克是典型例子。尽管2003年在美国领导下建立更换巴格达政权时没有正式提出保护平民的目的，行动的宣传伴随强调“人们没有C.侯赛因生活得好些和安全些”。这种断言是值得争议的，特别是在几乎每天都传来关于几十乃至几百人死于恐怖事件消息的情况下。能说平民生活得好些和安全些吗？

现在谈谈利比亚，那里的一切也是从呼吁保护平民免受“卡扎菲暴君”残害开始的。利用武力的“保护责任”行家们简直把利比亚情节作为高效应对危机的范例。桥是从那里搭向叙利亚的，尽管很明显，给“利比亚历史”画句号还早。利用外来力量推翻了它们不满意的政府的地方危机没有结束。它刚刚开始，可能把国家变为“失效的国家”。今天在利比亚发生的情况令人警惕，因为事态正是朝这方面发展。在利比亚传奇的第一阶段宣布的保护平民目的很快被忘却了。混乱席卷全国、部族之间矛盾的增

大，个别地区领袖宣布自己独立的企图导致了暴力升级，而受害的首先是平民。这个国家对人权的违反不少于前政权统治时期。对此有国际人权组织的证据和联合国专门机关的报告为证。难道“保护责任”就在这里？按照国际法和纯粹的人文原则，对一些人的权利尊重不应该通过损害其他人的权利来达到。否则难说这在XXI世纪是正义的理论。

不能忽视利比亚危机的地区影响：武器，包括移动的防空火箭综合体从这个国家不断的流失，高级职业军人从那里逃离，扰乱邻国的局势。利比亚的近邻，例如，马里对此已有感觉。显然在利比亚事件影响下出现的政变企图使这个非洲国家领土完整面临威胁。不久之前英国“泰晤士”报得到了关于向叙利亚反对派大量供应在M.卡扎菲军火库里失踪的防空火箭综合体以及榴弹炮、机枪等等武器的消息。

上面的评述并非意味着我们否定“保护责任”。相反地，我们希望把它变为基于国际法现有准则和峰会-2005决议的现代国际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这种理论既不合理，也无效。正因为这样，很难同意联合国秘书长保护责任特使D.拉克关于“我们没有时间等待“保护责任”具备完善理论的特征”的说法。这自然令人想起一句名言：“先涉及，后考虑”。大概，应该相反地，在干涉之前，需要明确这种理论的法律基础，以避免其破坏性后果。

看到D.拉克及其支持者的态度有严重缺点的许多国家都在思考这方面。要知道，巴西提出，随后中国支持了“保护时的责任”建议不是偶然的。按照这个建议，在做出采用武力对付危害平民的威胁的措施之前需要预先评价这些措施对平民的安全和对整个

国际关系的后果。其主旨是：如果在实行相应的武力行动过程中违反国际人道法律和导致平民死亡，建议这种行动者应承担对此的责任。自然，不是我们的所有伙伴都喜欢这种建议。

显然，在保护平民方面取得实际成果只是在改变对问题的政治化态度，放弃“双重标准”政策情况下才有可能。军事干涉是被迫采取的最极端的措施，只是在外交努力或者联合国范围内议定的制裁、影响手段用尽，别无其他调解办法情况下才可能使用。不过最主要的是，任何武力手段都应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这是国际社会行动的成功保障。

简而言之，解决保护平民问题的最高效办法是防止武装冲突或者尽快地停止出现的对峙。

就此需要进行发展预警工具、完善防止冲突机制、预防外交（中间调解，谈判）、发现和消除引向大规模暴力的原因、加强法律至上、“善治”、提高透明度等方面的一贯的工作。

由于世界媒体的集中注意，在武装冲突的尖锐时期（例如，在巴尔干、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较多谈到保护平民的必要性，而在政治调解和建立和平时期较少。可是，往往“安全真空”就出现在民族结构处于甚至不能保障自己平民起码安全的孕育期的过渡时期。国际赞助者害怕对软弱的结构投资，担心贪污或不合理利用资金，或者不愿意实现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恢复计划。复杂和长期的，暂时还不很高效的索马里国家建设道路就证明了这一点。

要想得到明显的成果，重要的是在冲突后首先注意加强民族政权，把政治调解进行到底（民族对话、解除武装、安全方面改

革、法治等等），寻找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还要注重影响冲突地区总的局势的地区背景（大自然和土地资源的争夺、冲突城市化、边界争议、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

对平民违反国际人道法律现象使打击有罪不罚的斗争变得迫切化。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工具应该是国家司法机制。可是在冲突条件下可能产生对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国际司法机制和侦察罪行与查明事实委员会较为适当。

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几内亚（2009年九月的暴力事件调查）和斯里兰卡（协商与违反人道权利与人权准则，特别是这个国家冲突的最后阶段的责任问题，后来斯里兰卡政权自己建立了这种机制）经验表明，这种委员会的效率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它行动的赞同，和接纳它的国家的合作水平。

最近国际社会部分提议积极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全权，以便把这个或那个专案移交国际刑事法庭，因为正是国际刑事法庭能保障对那些粗暴违反保护和平居民的国际人道法律者的不可逃避的惩罚。（例如-不久前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国际法庭对T. 鲁班吉和Ч. 泰洛尔的判决）。

诚然，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采取制裁手段，成立国际法庭和确定自己和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方式。可是应该理解，制裁手段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法，它有其局限性。我们记得，在许多情况下（包括在伊拉克）限制措施并没同起高效作用。不过，如果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必须制裁的决议，就要着重对具体的，个别对象的限制，规定人道主义豁免的制裁制度，确定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期限及其取消的明确准则。否则将使普通人受害，而政治上层仍逍遥自在。个别国家或地区组织把自己决定的制裁强加给安理

会的企图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西方国家正是企图对伊朗和叙利亚达到此目的。

最近几年来，许多致力于改善需要帮助的平民阶层处境的国际人道局和组织在热点活动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里可以看到不少问题。其中主要的是武装冲突各方阻碍人道工作者到达相应的地区，就像不止一次在索马里和民主刚果出现的情况那样。官方政权往往试图缩小人道问题的规模，否定居民的需求或者要求和他们的主管机关商定国际人文行动，实际上是由于对非政府组织不信任而对它们制造官僚主义障碍。

对冲突调解经验的分析使有可能确定应该作为危机调解哲学基础的几个基本点：

1. 预防外交应该成为调解正在成熟的冲突的首要和重点办法。
2. 必须采用保护平民的所有法律手段。重点应该是帮助国家加强其保护居民的潜力。
3. 使用武力，包括以履行“保护责任”必要性为理由的武力行动，必须仅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权限，正如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那样。
4. 军事行动应该全面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责并严格按照国际法进行。
5. 安理会对武力使用的批准应有明确的法律和时间的限制。
6. 安理会应该保障对那些得到使用武力全权者的监察。

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历史、宗教、文化和其他特点，还有每个冲突的性质，最初原因及其调解的途径。

保障对平民的保护是当代危机调解的不可分割部分。遗憾的是，法律准则制订的进程不是都能结合地方局势的改善。这里重

要的是实际评价存在的可能性并就此采取较适合和高效的调解机制。诚然，但愿有可能保障所有人在任何时候免受任何威胁。可这对政府是极其复杂的任务，即便在和平时期。

“阿拉伯之春”事件，联合国维护行动经验要求诚实的分析，得到深刻的、公开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及时和高效地应对出现的冲突，其中包括完成保护平民的任务。





弗拉基米尔·奇若夫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

俄罗斯-欧盟战略伙伴关系： 欧洲危机——非为喘息的理由

与欧盟建立互利、平等和多层面的伙伴关系，以前是，现在仍是可见未来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之一和维持全欧安全稳定架构的保障。

欧盟——不单纯是我们最大的经贸伙伴，俄罗斯载能体的主要出口市场，投资和技术的主要来源。我们被千百万无形的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遗产，历史演变、共同传统、理想和道德准则牢不可破的线索编织在一起。俄罗斯和欧盟是为维持全球和地区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向周边地区反映和平、繁荣和稳定的重要国际力量中心。

是的，很明显，欧洲一体化的构思，目前，说得婉转一点，经历着并非最佳的时段。自二战以来，欧洲报刊的题目，首

次不以稳定的绿洲出现，而以令人陌生的全球财经漩涡的中心出现。欧元区持续已久的主权-债务问题伴随着经济下滑，一体化速度减缓和社会中“欧元乐观主义”的减退，而自前不久，一些欧盟成员国国内极端民族力量普遍增长。更广地来说，二战后形成的欧洲“福利国家”模式也出现于“风险区”。2009年里斯本协议更新的欧盟制度体系也面临了一定的复杂性，其中，国家间对一体化的态度占居主要地位越趋明显。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在境外的观察家又在谈论统一欧洲处于“没落”边缘，似乎是无能力抵抗全球化和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现象，也不足为奇。

与此同时，有关欧洲一体化“消亡的流言”，即使是以广泛讨论的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前景和沿欧盟南方边缘潜在的“多米诺效应”危机为背景，看来，还是有些夸大。在离心力和向心力影响作用下，施行的欧洲方案，其历史性发展就并非直线上升，屡有波折（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65年的“空椅危机”和2005年欧盟宪法在荷兰和法国公投的失败）。就像观察家正确指出的，往往正是一些危机事件推醒冬眠的欧洲一体化，推动欧盟恢复一体化节奏。

就是今天，欧元区的动荡也启发欧洲人对在经济管理的关键元素没有国家之上的集权，他们将无法应对宏观经济日益失衡和侵蚀货币联盟基础的竞争力水平分裂的认识。欧洲2010-2012年采取的改革，其中不仅包括签署具有极大反响的有关稳定、协调和管理（即所谓的“预算条约”）的协议，同时也采取了其它不为广知的措施：巩固稳定和1997年增长经济，建立财政援助机制、财政监督、协调预算和经济政策，预告和修正宏观经济的失衡。换言之，尽管存在不小的困难和内部矛盾，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继续执行欧盟建设方针。

此外，我敢断言，欧洲一体化已无退路。欧洲人对一体化赠送他们统一的内部市场、申根免签制度、统一货币和共同对外贸易政策的福利优越性太清楚了。他们理解，只有作为世界经济统一主体，才能保障自己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生存。自然，他们也不渴望返回不断处于欧洲国家民族战争边缘的“威斯特伐利亚”的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按我的看法，统一的欧洲无论以何种形式，还是会保留，甚至如果为此统一需要加强——不管是在欧盟法律规范为基础的框架内还是在其外——能促使一组“冲刺”的经济发达国家并有为增强欧洲“核心”国家一体化速度的多种快速机制的话。

尽管欧盟问题重重，其仍是今天世界上最进步的一体化联合体，是欧洲大陆政治稳定的支柱，国际关系区域全球化多元中心体系的关键元素。20世纪流血战争后的欧洲国家的经验，实质上是“白手起家”，推出赋有保障大陆上“永久和平”使命的超国家的联合性方案。其仍然是不仅为一系列其它欧洲国家，也为世界其它区域在走一体化道路国家的灯塔。

俄罗斯希望欧盟保留作为强盛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俄罗斯2011年12月14-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28次俄罗斯-欧盟峰会上就此已明确表态。我国并非在言论上，而以实际行动促使欧盟步出螺旋形发展中的经济危机。2011年双方的贸易额增长约三分之一，达3070亿欧元。我国外汇储备的41%为欧元。2011年11月启动的北欧天然气管道第一期工程以及计划中建设的“南溪”的结果，欧洲获得保障其今后十年能源安全的可靠供气系统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国以及在“8国集团”和“20国集团”框架内的成员国，俄罗斯积极参与拟定针对稳定欧元区财经状况的集体解决方案。

今天，众多的对话渠道与合作项目联合了俄罗斯和欧盟，将我们牢牢捆为一体和有可能具体讨论各种问题——从核安全到动植物检疫的广泛问题。20多年来形成的合作和多次证实了自己多层次合作体系的正确性，以举行一年两次的俄罗斯-欧盟峰会冠冕（我想在括号内指出，没有一个和欧盟享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能和俄罗斯同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举行会晤的频繁性相比）并在深化我们之间的合作和以具体内容来充实合作起关键作用。

我们在组建平等与互利战略伙伴关系工作的座向标是2005年5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欧盟峰会上确认的四个共同空间的“路线图”（经济；自由、安全和司法；外界安全；科学和教育，包括文化各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一文中提出的形成自大西洋到太平洋统一经济和人的空间的建议，为进一步落实俄罗斯-欧盟的潜力起了巨大的推动力。我就能落实文章中提出的在俄罗斯-欧盟之间建立“欧洲联盟”的一些具有迫切性的双边协作和进步问题归纳一下。

免签证的对话是俄罗斯-欧盟合作的中心课题，其直接牵涉到数百万我国的同胞和欧盟国家公民的命运。

2011年12月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俄罗斯-欧盟峰会上启动了落实“联合步骤”的列表，完成这些步骤能过渡到为俄罗斯和欧盟公民实行相互短期免签制度。为落实“步骤”还需要进行大量文件性的核对和法律上的工作，其中包括保障边境对有组织的犯罪，贩卖人和毒品的不渗透性的工作。

鉴于存在与为完成“步骤”相关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任务，因此很难确定这些障碍被排出的具体时间。但估计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会有结果。

再说，近来，我们经常听到伙伴对存在欧盟受南方移民压力的增长，致以欧盟成员国国内犯罪率增高，社会不安、恐怖袭击风险和国内混乱现象的抱怨。所有这一切，似乎是阻扰他们通过对俄罗斯取消签证障碍的突破性决定。我认为，这种挂钩是人为的。俄罗斯又不是存在于真空，其也不只是听说有移民问题。此外，说取消签证制度是俄方提出的任性要求，一旦予以满足布鲁塞尔就有望使俄罗斯在其它问题上表现灵活性，这种断言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这远非如此，因为不仅每年有250万俄罗斯人前往申根国家，但也有150万申根国家的公民每年前来莫斯科。因此，解决免签问题对双方有利并反映了俄罗斯和欧盟对作为构建现代化伙伴必要条件的扩大业务、旅游、文化和科学教育联系抱有的共同兴趣。

我们认为，有关取消签证的谈判应在实施“联合步骤”后立即开始。采取其它做法使由俄罗斯和欧盟领导协调的和批准的文件失去其逻辑性意义。

俄罗斯已做好我们双方国家的公民自由迁移的准备。希望欧盟就此课题也同样持有建设性的，符合我们伙伴关系精神的态度。

我们同时在对2006年签署的简化签证手续的协议进行更新工作。致力将现有的签证手续自由化，包括对持公务护照的人，进行扩大有权享有多次往返签证“优惠待遇”一类人和免收签证费的工作。

2011年12月的重要里程碑，是在莫斯科签署的有关地方上边防地区居民往来的俄罗斯-波兰政府间协议。此协议将为往返加里宁格勒州—波兰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方便。

所有这一切是为我国公民前往欧洲旅游，同会见亲属，受教育进行的现实改善入境欧洲的实际步骤。此外，更广面地说，这有助于加强“从人的角度衡量”俄罗斯-欧盟的合作。

2010年在罗斯托夫-顿河举行的俄罗斯-欧盟峰会上启动的“现代化伙伴关系”，近年来成了形成系统联合项目之一和两国关系上的重要催化剂。首先予以肯定评价的是伙伴的创新哲学。这种哲学基于出自确保两国创新发展利益寻找综合俄罗斯-欧盟的潜力的思想。其予以了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一种新的现代化音调，这一倡议在颇大程度上，为两国在俄罗斯入世，协调技术标准和程序进展，保护大自然和卫生界领域问题上采取妥协解决办法助以一臂之力。俄罗斯-欧盟截止2050年能源合作“路线图”的制定工作也有所进展，激化了协助发展低碳和资源效率经济领域以交流经验为目的的接触。现代化合作也囊括了俄罗斯和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

制定“俄罗斯-欧盟新基础协议”的工作在继续，其使命是成为我们今后继续靠拢的工具。

在此，我提示一下，俄罗斯-欧盟关系的法律基础是1994年签署和在1997年生效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在一定时刻，双方领悟到此项继续履行关系的法律基础职能的协议，有一系列条款不再符合已改变的现实。其中有关于核材料贸易协议以及制度架构合作协议规定的谈判开始的时间。生态、农业、宏观经济政策、地区合作等领域需要进行更深入一步的工作。最后，也还得考虑到俄罗斯入世的事实。一句话，到了“更新时候”。

第一轮正式谈判于2008年7月在布鲁塞尔举行，即，6月份在汗特-曼西斯克举行的俄罗斯-欧盟峰会期间通过有关启动新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后。但谈判进程两次因与谈判内容间接相关问题而中断。

尽管如此，在艰难起步的谈判进程达到应有的转速后，在2010年年底，双方代表团（我很荣幸能率领俄罗斯一方的代表团）成功地举行了第12轮谈判。

随后，谈判上又出现间断——似乎是与平行进行的俄罗斯入世谈判在进入终结阶段上出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相关。

无须说，以2011年2月签署的有关俄罗斯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一揽子文件告结束的18年的入世马拉松伴随了一系列复杂的妥协，落实这些妥协不能不使俄罗斯经济承担花费。因此，不可能期待俄罗斯一方立即在经贸制度自由化上会有新的步骤。我们的欧洲伙伴正是将此作为对适应于新基础协议的“世贸组织+”的理解。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对提出的建议做出的回答自然令伙伴失望。结果，在未澄清经贸和投资部分问题前，暂停谈判。

当然，俄罗斯和欧盟都希望新基础协议能推进互利合作。但我们还没有放弃利益平衡的准备。企图使俄罗斯单方面的做出额外的让步做法，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此外，我们也得顾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贸易投资部分问题的顺利解决，无疑是激活谈判的主要条件，我深信，谈判双方对此都有确实的和诚挚的希望。但为此，必须得做出额外的努力。归根结底，双方关系的一些个别方向能以“行间”的协议来调节。我认为，存在的一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这也同样涉及因欧亚一体化进程出现国家银行理事会工作上的新局面。在此问题上不会有原则性的矛盾，因为欧亚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和俄罗斯对国家银行理事会可能承担的义务基于同一原则——世贸组织协议的原则。

在欧盟2000年建立军-政同一性的同时，我们在调解危机局势和稳定冲突地区，特别是存在共同利益地区进行的合作得到加强。俄罗斯参与了欧盟驻波黑警务使团(2003-2006年)，向欧盟在乍

得和中非共和国(2008-2009年)的维和行动中予以了直升机集群的宝贵援助。2011年俄罗斯海军与在亚丁湾采取“亚特兰塔”行动的欧盟海军舰队进行成功地协调,使索马里海盗攻击路经邻近海域的商船次数减少几乎一半。我们和欧盟为寻找通过谈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调解中东、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其它地区危机和冲突联合工作。俄罗斯紧急状态部航空队协同欧盟对口机构在欧洲国家进行灭火。始终如一地发展我们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

我们有意继续促进这项工作,培养我们的伙伴对建立牢固和超前制度形式合作迫切性的思想。此方向已有一定的推进。自2010年来,俄罗斯-欧盟军事问题工作组定期举行会晤。在2010-2011年,俄罗斯和欧盟就北非和中东局势协调了两项联合声明。但在新一代跨境性的挑战和威胁走向前台,因“阿拉伯之春”事件,欧洲南疆地区动荡风险增大,以及国际关系上冲突性整体升级条件下,这显然还是不够。需要有能交换信息,包括一些保密性的,即刻对出现的危机能做出反应,迅速通过就调解危机领域采取协调努力的联合决定,以及对这些决定进行战略监督的交联机制。实例就在眼前——类似的一揽子职能自1997年已赋予,比如说,俄罗斯-北约理事会。

就此提示一下,已采取了建立这种机制的企图。2010年6月在德国举行的俄罗斯-德国高级会晤上,根据德国的推荐,联合提倡了建立部长级俄罗斯-欧盟对外政策和安全委员会。但为付诸实现这一构思,欧盟——我的看法是人为的——将其与推进调解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问题相挂钩,随后干脆就被我们的伙伴“搁置抽屉里”。希望欧盟最终会从战略角度来来看待此问题。

此外,我们仍然希望在为调节危机领域进行的联合或协调的工作上与欧盟制定稳定的法律基础。我们继续和伙伴进行仔细和

复杂的，旨在此问题上寻找公分母的工作。在此语境下，我们决定坚定不移地遵循2008年4月29日在卢森堡俄罗斯-欧盟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其中指出“本着平等伙伴与合作精神”讨论协议草案。

鉴于上述所说的，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因为经常被说缺乏突破性的战略提倡而受影响。当然，除了具有共同利益和联合我们的共同项目外，也存在不少分歧，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俄罗斯和欧盟不仅是伙伴，但也是竞争对手。

就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刺激因素”，我指的是，令我们不安的欧盟拟立法上修改同第三国家，包括和俄罗斯相互协作的这种趋向。换言之，在欧盟的布鲁塞尔致力将27个成员国通过的规则 and 标准解释为比承担的国际义务具有更大优势，包括对欧洲统一标准未生效前同第三国家签署的政府间协议。

欧盟2009年通过的“第三能源方案”就是这种单方面和非建设性实践显示的最突出的事件。除了其它一些，其规定对在欧盟市场的垂直一体化能源公司采取各种形式的财产权的分配，甚至剥夺其资产。其结果，为俄罗斯公司的活动（不仅是俄罗斯）造成严重问题。比如。立陶宛因执行“第三能源政策”，粗暴违反了俄罗斯-立陶宛有关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政府间协议。

“第三能源方案”只能被视为是欧盟单方面放弃对1994年签署的不恶化经济合作条件的伙伴与合作协议承担的义务。为俄罗斯公司制造人为的投资风险，我们的伙伴，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恶化本身能源薄弱的环节。再说，选择的时间也不利于他们自己。欧盟选择的时间，是正当欧元区主权-债务国处于“火灾”期（俄罗斯直接参与“扑灭”这场火灾）和以盛产油气的中东和北非政治扰动为背景。

欧盟致力将欧洲贸易排放配额制应用于第三国家与欧盟成员国航空路线的航空公司，就是按类似的情节办事。绕道国际民航组织通过此项决定，欧盟实际上将自己同世界其它国家——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对立了起来。

我补充一句，我们无意将存在的这些或那些问题戏剧化。我们将继续争取以伙伴方式，本着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对第三国家采取制裁问题上的立场存在严重分歧。欧盟成员国愈来愈经常地（特别是在涉及到人权的问题）反射性地抓起“制裁鞭”，打算以此来校正这个或那个国家执行的政治方针。我们看来，这是无远见的和最终走向歧途的立场。历史证实，以断交和最后通牒的镇压手段筑垒与“麻烦国家”隔离，很少带来如愿以偿的结果。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路线比说教和强制更可取。

我就我们关系上的人权问题说几句。此领域的对话，总体上还是予以肯定的评价。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由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和欧安组织集体机构确认的，对俄罗斯和欧盟成员国承担的义务基础上。

与此同时，我们对布鲁塞尔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伙伴选择性地挑取履行人权准则，其优先性，看来，有自己随意（甚至强家有他国）确定。我们就是不懂，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的“非公民”在政治和社会权利上的失败，对欧盟的布鲁塞尔来说，不如履行少数民族的权力更为迫切，伙伴是以何种标准认为，对俄罗斯国内集会的关注，比抵制欧洲日益扩

大的侵犯性的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复仇主义现象更重要。

我们认为，以说教和不容反驳的态度与我们说话，有时，甚至不弄清是非给我们戴高帽，将适得其反。这无利于相互尊重的对话，再说，这哪像伙伴关系？

我们依旧等待欧盟将最终会履行自己章程文件的条款，并加入欧洲委员会的主要法律工具——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公约。再拖延下去也不会为欧盟增添光彩。

前不久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了欧盟人权的听证会。希望将能继续这个有利的实践。再说，欧盟也予以肯定评价，这说明了我们对对话的成熟性。

最后，为在后苏联空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已进行的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形成，必须加倍的努力。考虑到欧盟在构建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先锋作用，我们借用的如不是欧盟的“样板”，也在颇大程度上以其在此领域的法规制度基础为支柱。

提上俄罗斯-欧盟议程的有联合拟定以泛欧为基础的欧亚一体化和欧盟合作的最佳配合机制。我们两共同体面对的目标共性——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繁荣经济——使统一经济空间和欧盟为自然而然的伙伴，再说，欧亚一体化具有开放和包容广阔性，其完全和全欧经济空间构思框架协调。

毫无疑问，为此必须和欧洲伙伴继续进行细心的工作，其中一系列国家目前还存在视后苏联空间为反对俄罗斯的“零和博弈”场所的陈旧框框。应当终止向独联体国家就与俄罗斯进行的互利合作和（应该说是含糊不清的）获得欧盟“会员证”前景之间做

虚假选择的人为提法。我们“同为邻居”的空间应当本着俄罗斯-欧盟外界安全共同空间“路线图”的精神成为没有分界线的互利和平等合作的空间。

看来，此战略任务的落实不仅能使我们以新的眼光，以作为相互依赖和协同的世界一体化的两极来看待俄罗斯和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建立“自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和谐经济共同体”的目标跨近，该大陆市场的总值为一万亿欧元。有可能这条道路最终正是克服目前欧洲危机的有效处方，成为许多俄罗斯专家广泛讨论的可选择的引领大欧洲历史性团圆的欧洲一体化方向的逻辑性的结尾。

最后，我想再次表示对今后欧洲一体化项目和俄罗斯-欧盟良好成果的合作抱有乐观主义。

欧洲危机和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为——基于四个共同空间构建互利、平等和面向今后俄罗斯-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喘息理由。相反，正是今天，当欧洲人再度陷入对欧洲方案命运的“沉思”阶段，开辟了更广的，从纯为战略截面来浏览我们间关系议程的可能性，克服在束缚我们前进的一切并将精力集中于把合作提升到质量一新的新境界。





基里尔·巴尔斯基

俄罗斯联邦总统驻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民族协调者，特任全权大使

daap@mid.ru

中亚 在上合组织“不湿伞”之下

中亚是不同人民的起源、运动和相互影响的广阔地区。那里曾有过城市、国家的诞生、成长、繁荣和没落、战争与和平、联合与分裂的历史。

那里顺利地进行了农耕、手工艺劳动，广泛出口了自己的产品，和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人们交流了经验，吸取了对方的优点。伟大的丝绸之路囊括了自南方的阿富汗到北方的南乌拉尔地区广大空间，商队由东向西，自西向东串流将罗斯、莫斯科维亚、俄罗斯中国皇朝和中亚地区各族人民连为一体。

今天这个地区积极参加地区和世界政治经济事务。这是不同政治、经济利益的交

Кирилл БАРСКИЙ,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ам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ординатор России в ШОС, посол по особым поручениям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ОД «НЕПРОМОКАЕМЫМ ЗОНТИКОМ» ШОС

叉点，战略重要的交通枢纽。不同文化和宗教在这里相互影响，古代的传统和现代的思想在这里交融。强化了争夺动力资源斗争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使碳氢化合物丰富的这个地区成为激烈竞争的对象。遗憾的是，尖锐的安全威胁没有边界，中亚没能避过全球的财政危机和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增加了本地区的“家中”问题。

中亚国家奉行积极、多方向的外交政策，和邻邦、地区外的国家发展关系，通过参加不同的多方地区联合组织达到自己的民族利益。其中的一个是2001年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1990年末期占上风的向心趋势气氛中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一起打开了“伞”，计划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觉得较为舒适，得到了集体努力保护自己利益和推动地区利益的可能性。

上合组织建立和成功运作的背后存在一系列因素。促使中亚“四国”建立上合组织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不断增大的，只有和俄罗斯与中国联盟才能实际对付的各种威胁和富有诱惑力的经济和人文合作的，即为了自己发展的可能性。

为了证明上述言词不是信口开河，让我们来看看面临的是什么威胁，怎样应对它们，在上合组织范围内的合作可能性有何吸引力？

安全与它的扩大面：面临威胁时应该联合在一起

上合组织地区特别自豪和珍惜的价值之一是稳定。随着“特维捷尔革命”现象的出现，随着信息通讯工艺变为扰乱发展中国家局势的政治工具，在中亚重复北非-近东情节的危险变得完全现

实。因为地区国家存在挑起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混乱的类似问题。

对于上合组织国家，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是它对世界观点的基础，是在组织章程上固定的基本原则（尽管上合组织的个别成员国有时在激烈的争论中忘记它）。可是怎么办呢，如果灾祸从外边来？要知道上合组织不是军事联盟。

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在需要地区组织快速和高效对付各种可能的危机时，上合组织成员国认为必须及时修改2009年上合组织叶卡捷琳堡峰会通过的关于上合组织在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面临威胁情况下的政治-外交措施和机制的条款。今年四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上合组织安全委员会国秘书会晤通过了新版条款，它规定了防止危机局势的广泛措施和对它们的非军事应对方法，并将提交国家首脑会议批准。

由于可理解的原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有较多的可能性。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有密切的伙伴联系。它在今天情况下具有特别意义。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包括中亚各国的民族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组织能否明确制订“分工”机制和在地区出现非常情况时的协调行动。

在千年边缘对信息安全威胁现实的认识导致了世界各地人们思想的转变。上合组织的专家们在集体水平上可以说是最早注意到类似的形形色色的问题。这样在2009年出现了关于保障国际信息安全的政府间协议。其中写明共同对付信息通讯工艺方面军事政治、恐怖和犯罪性质的威胁的行动方向。协议生效后各方开始实际履行-开始建立六国协作综合机制。值得提到的是，这对上合组织每一个参加者都有利，但首先是中亚国家。现在它们可以确信

不会独力对付来自工艺方面较强大的敌人的网络威胁，不管它是国家、恐怖分子还是普通的罪犯。

保障能源安全课题对上合组织也极其迫切：组织中有能源的生产者、消费者和运输者。看来，上合组织的结构本身就是内部信任极高的组织，可以议定对所有各方有利的地区合作原则。俄罗斯还在2006年就已建议建立公开的辩论平台，以进行国家、实业界和科学界有关各方代表的意见交流，讨论能源战略和能源与能源安全方面的任何问题。现在这一思想开始实际体现。准备启动有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家和伙伴对话国家参加的能源俱乐部。建立的是兴趣俱乐部，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例如，这一建议得到了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的积极支持。

对上合组织的另一个新问题是食品安全问题。这个联合体各国的互补性很明显。已提出了头一批具体建议—关于在上合组织范围内为增加地区粮食市场稳定化可能性建立粮食储备以对付紧急状态（俄罗斯）的建议，关于建立“上合组织种子库”（中国）的建议。一切和通常那样，首先是制订理论，中国已起草了自己的方案。

上合组织六国打算提高在紧急应对方面合作的效率。现在各国在起草对2005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互助协作消除紧急状态的跨政府协议的议定书。它的签订的意义在于批准11个标准模式文件（援救请求。供应的设备名单等等），以便在紧急状态挽救人们生命，加速提供必要帮助。计划在今年六月于北京上合组织峰会“场地”上签订议定书。

上述这一切是不仅中亚国家碰到或可能碰到的威胁与风险的具体现象。上合组织的所有参加者在新世纪危险面前一律平等。因

此“安全伞”也是共同的，是遮盖所有成员国的一把伞，而它的坚固性取决于成员国的统一和它们协作的成果。

阿富汗：对谁是遥远的战争，对谁是永远的邻邦

中亚局势和阿富汗情况密切相关。正因为这样，对付恐怖主义和主要来自该国的麻醉品走私威胁仍然是上合组织活动的重点。可惜的是阿富汗政府和多国力量都没能控制该国局势。

在“上合组织六国”范围的反恐怖主义斗争可以说达到了设计功率。今年三月在塔什干举行的地区反恐怖机构委员会（P A T C）第二十次会议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为峰会起草好了2013-2015年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行动纲领。计划加强业务工作，协调边防机关的活动，和反恐怖中心的伙伴们协作。观察员国家将参加地区反恐怖机构委员会的工作。

开展了反麻醉品方面的紧张工作。今天出自阿富汗的麻醉品简直充斥中亚。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据一些专家的说法，这也威胁个别国家的国家基础。麻醉品洪流涌入俄罗斯，越来越深入中国内地。俄罗斯缉毒局和上合组织的伙伴们敲起了警钟。今年四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负责反贩毒工作的机关领导人会议上达成了关于实现上合组织2011-2016年反麻醉品战略的一系列重要协议。决定在上合组织的一个机关建立反麻醉品协调队，搞好对于有关利用非法贩毒所得资助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更密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局合作。俄罗斯代表团在会晤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其中包括绘制阿富汗罂粟种植园和麻醉品加工实验室分布图，发展业务合作协

调行动，培养阿富汗缉毒警察，举行反麻醉品生产和走私斗争问题的会议。

军人解决自己的问题。今年六月在塔吉克斯坦举行定期的“和平使命-2012”反恐怖演习。这些演习计划是在2012年四月24-26日于北京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批准的。一切都在接近实际的条件下举行。

可是，阿富汗情节也有其另一面。逐渐接受保障安全方面全权，开始站稳脚跟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需要支持。而且阿富汗人认为自己的未来不能脱离地区的背景，不能不参加欧亚“大家庭”。阿富汗趋向上合组织，它在2011年六月正式申请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现在正对此进行审理。我想，吸引阿富汗参加上合组织活动毫无疑问符合共同利益。

保障地区安全的任务促使上合组织明确地确定对阿富汗的政策。诚然，考虑到“2014年因素”，这个国家变化的局势可能要求组织各成员修改自己对阿富汗事务的方针，然而拒绝它们已不行了。正因为这样，许多专家说阿富汗是最近几年上合组织要经受的主要考验之一¹。

现在地区存在一系列地区结构，在其议程中有阿富汗问题。去年十一月阿富汗和土耳其提出的“伊斯坦布尔进程”旨在达到协调努力，协助阿富汗恢复安全和经济。看来，作为地区的关键组织，从一开始就实际参加与商议加强“亚洲心脏”地区安全与合作并启动“伊斯坦布尔进程”的伊斯坦布尔宣言的上合组织完全可能成为阿富汗推动这种进程的主要伙伴。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立场远非都一致。与此同时，否认存在共同利益是不对的。看来，存在上

合组织和另一方-美国和北约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在麻醉品问题上。不过，协作的议事日程却值得上合组织考虑和商议。这里的准则只有一个：是否符合上合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

欧亚十字路口：我们没有挑选的道路

中亚是欧亚所有交通干线的不可分割除的环节。通过这里国家领土的铁路、公路、航线、管道联接它们也联接邻邦-俄罗斯、中国、伊朗、阿富汗、土库曼、蒙古等国。它们构成的多分支的网可以说是共同的无价之宝。妥善的利用和不断的扩大，对涉及的国家可以说是“金筋”。这里对中亚伙伴们有双重好处-发展本国的交通系统和得到转运的收入。

正因为这样，上合组织成员国把交通结构的发展看作是经济方面工作的要点。它从公路方面开始。作为试验计划补建直达公路干线的个别路段。起草了为国际公路运输而建立良好条件的协议。只剩下协商个别的转运路线和它们投用的期限。签订上述的协议使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结束必要的道路结构建设，从而可以无障碍地通过上合组织所有空间-从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到中国太平洋岸边的连云港。

在议事日程中有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关于建设欧洲-中国西部的国际交通走廊的三方计划。按俄罗斯的建议议定制订协调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公路交通的计划，使之符合共同利益和地区经贸合作的需求。

下一个任务是提高上合组织空间，首先是中亚的不同交通工具的相互联系。建立交通-物流中心有助于它的完成。上合组织实业委员会在各成员国的支持下推行这个宏伟的计划。它的实

现将导致开展利用和进一步发展铁路与航空运输方面结构方面的协作。

信息和通讯流量也是一种交通网。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各国已数年在实现“上合组织高速信息干线”计划。俄罗斯建议利用我国专家们研制的上合组织国家空间因特网形成和运作模式。中国伙伴建议建立上合组织电子贸易平台。

. 我们的确没有选择道路，是它们找到了我们，我们各国和我们的经济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然而，在欧亚空间达到了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一体化的是另一个联合体-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海关联盟。今天建议在这个一体化核心的基础上建立欧亚经济联盟-“能成为。。。欧洲和活跃发展的亚太地区之间高效的“纽带”的强大的跨国联盟”²。

当我们说进入亚太地区，首先意味着中国-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涡轮发电机”。我认为将来一个不简单但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寻找上合组织纳入正在形成的欧亚一体化系统的方案。

“大陆”共同体：共存的技能和新标识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不同的文明的根，各有自己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历史记忆、自己的发展道路。Л. Н. 古梅列夫³在自己的著作中出色描写和深刻分析了这个广阔土地上曲折起伏的发展，为“欧亚体”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众所周知，这个运动的理论家们的公设主要依据是在欧亚人民历史命运和统一类型的心理特征，而它们的生活方式与民族性格是在和俄罗斯民族联合的影响下形成的。“新欧亚体”领袖们因而认为必须联合欧亚（不包括中国）成为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的独立的一极⁴。

将近一个半世纪在统一的国家生活的俄罗斯和中亚人民的亲近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也可能找到古罗西和大戈壁人民的后代与中国的共同点。在这个地理气候条件复杂的广大空间出现的所有国家结构都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特征，它们的社会没有受到欧洲文明中发展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

在新的时代，平等概念在这种基础上得到了很好的适应。正是在这里，由于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而实行了社会主义试验。从几十年的行政命令制度中爬出来的这些国家经过了对新的生存条件的艰难的适应时期，较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最后，今天的上合组织国家的人民千百年居住在广阔的陆地上，形成了“大陆心态”。按Н. Я. 达列夫斯基的说法，这表现在“安定草原的和谐”，父权制和宗教宽容态度上，形成了与邻近国家和人民无冲突共处的习惯。

上合组织拥有很大的“多样的统一”潜力，这对加强上合组织的社会支持有很大意义。它的发展客观地有助于加强参加国的“社区情感”。某些专家认为这是战略性的课题⁵。的确，在上合组织的章程中，确定了加强各成员国相关信任、友谊和睦邻关系为上合组织的首要目的和任务⁶。

在很大程度上这有助于文化-人文方面的协作。这里已在做很多工作。例如，教育方面采取的步骤，-实现上合组织大学计划（顺便提提，今年为首批毕业生颁发硕士学位证书）、举行教育周和大学校长论坛、制订“软力量”方法对付极端主义的计划。而文化联系、旅游、运动方面的潜力简直是取之不尽。应该发展人们之间的联系。在上合组织范围内搞好文明对话的思想值得重视。

现在还难于预测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会导致出现某种上合组织共同体（值得提到的是：许多地区组织为自己提出这种任务，欧盟、东盟就是例证）。但可以肯定的说，上合组织具有在将来变为新标识的前提。

统一的呼声响亮：在对外政治舞台上协调行动。

当你分析上合组织六国对国际和地区的主要问题的立场时就会明显看到它们的共同点。我们在联合国和外国伙伴辩论时坚持近似的原则，统一对待世界事件。这为外交协作、在上合组织国家立场吻合时阻止某些问题、相互支持创造客观基础。与此同时，对个别问题态度的不同不应该看作是悲剧：归根到底在上合组织中联合的是各有自己的观点和任务的独立国家。它们有相互不完全同意的合法权利。

简直还在昨天，联合国的大部分国家仍属于某个集团，我们都为自己着想。而现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代表相互紧张协商，交换信息，分析局势，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对难于顾及一切的不大使团特别重要。然而，即便是大国，当得到志同道合者坚决支持时，也会感到舒服得多。

最近几年主席国代表以上合组织名义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对议事日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言。主要问题是“恐怖主义”。我确信，我们意见相同的问题只会增多。

最后，在对国际局势总的评价中每年都纳入上合组织峰会的结果文件，关于上合组织外长会议结果的新闻公报。

上合组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提出联合倡议。例如，2011年九月常驻代表们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上合组织范围内诞生的草

案“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方面行为规则”作为联合国大会第66次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特别注意的自然地区事务的协作。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家和阿富汗关于保障地区安全问题的经常协商越来越有成效。正如对报界发表的关于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一轮协商结果的公报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各方“一致指出必须为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加强地区的合作”⁷。毫无疑问，这种“上合组织扩大会议”的协商将继续下去。与会者重申愿意在诸如关于阿富汗的大型国际活动之前和在各国首都举行计划会议之前进行会晤，“对对表”。会址不仅可以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首都，也可以是观察员国家的首都。

在这种条件下对上合组织的兴趣不断增大是偶然的么？而且是地理位置不同的国家-从近东、外高加索到东南亚的国家。

地区之外的选手：可以觉得像在家里，但别忘了是在作客。

苏联解体后在中亚“水平线”上出现了不少新面孔。美国对中亚较注意。特别是最近由于美国计划从阿富汗撤兵。

按照综合观察结果，美国奥巴马政府确定了其在地区政策的五个重点：为协助在阿富汗的联合力量行动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发展中亚能源供应及其路线的多元化；鼓励政治自由化和尊重人权；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和协助经济改革；防止出现失败的国家⁸。不难看出，这些重点首先是反映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目的是为了其“大中亚”理论。它们不是全部和完全符合中亚国家的实际需求。

欧盟也重视这个方向。布鲁塞尔通过了名为“欧盟和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的专门文件(2007-2012 г.г.)⁹。现在准备它的下五年的“翻版”。欧盟的战略中强调，联合的欧洲和地区国家有共同目标：通过和平协作达到稳定与繁荣。与此同时战略作者又补充：欧盟在地区的任务是发展和团结、稳定、合理和公开的社会，保障中亚伙伴忠于国际准则，必要的管理、法律、人权至上和民主。经济方面和美国一样，注重能源。顺便提提，这令人深思，这里什么主要呢-是希望互利合作还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

美国、欧盟（特别是德国）、日本、土耳其为帮助中亚国家克服面临的困难做了很多工作。这种协作的性质及其方向应该由中亚国家自己及其远方的伙伴确定。

当经济和其他帮助被滥用于排挤在中亚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存在，成为当地国家结构的支柱和普通人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的一些国家时，那已是另一回事。当采取的行动旨在破坏已有的双方联系和多方合作机制，特别是个别的“区外国”希望议定在地区部署自己军事结构时更加引起敏感。但愿中亚的新朋友们会珍惜这里存在的稳定，尊重这里复杂的，也许是境外“世界”不是都能理解的现实，它的传统与习俗。同时必须牢记：远方的伙伴来了又走了，老朋友和邻居却留下来。

北京的上合组织峰会：制订未来计划的重要阶段

总体相当成功，在加强地区睦邻友好关系口号下度过的上合组织中国主席任期即将结束。六月份中国首都将举行上合组织峰会。它成为国际生活的重大事件。这不可能不是这样：在北

京聚集权威的国际地区组织成员国的首脑，其中不多不少有两个核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预料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家-印度、伊朗、蒙古、巴基斯坦的最高领导人也将来到，还邀请了阿富汗和土库曼总统，峰会的中国组织者希望他们作为主席国的客人。

对于我们，未来峰会的特别意义还在于上合组织创建者之一，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参加。

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首脑委员会会议准备了大量文件。计划按峰会结果通过宣言。但是，峰会最重要的结果将是批准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基础，下阶段将在它的基础上制订战略本身。

上合组织在积极规划未来。随着组织的巩固，它的“伞”布也会更结实，形象地说，是不湿水的伞。正是这种情况为上合组织开辟新的前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可能首先是为了中亚的成员国的利益。

1. 阿鲁诺娃 М. 上合组织(2001-2011 年): 任务、结果、前景。//中 亚 和 高 加 索. 2011. Том 14. Выпуск 4. С. 26-27.

2. 普京 В.В.为了欧亚的新一体化计划 - 诞生于今天的未来。//消息报. 2011. 3十月.

3. 古梅列夫 Л.Н.古罗西和大戈壁 М.: Мысль. 1989;. 黑色传奇. 大戈壁的朋友们和敌人 М.: Айрис-Пресс, 2012; 臆想王国的寻找. М.: Айрис-Пресс, 2009;. 里海周围的千年 М.: Айрис-Пресс, 2008 и др.

4. 杜金 А. Г.. 地缘政治基础. 俄罗斯地缘政治未来. М.: Арктогея, 1997; Проект «Евразия» “欧亚”计划, М.: ЭКСМО, 2004 и др.

5. 沃罗比耶 В.Я. 上合组织像是“心脏地区”不断强大的君主: 怎样把欧亚最有前途的组织提高到新水平 //俄罗斯在全球政策中. 2012. №1.

6. 上合组织章程 // <http://www.infoshos.ru/ru/?id=33>

7. http://www.mid.ru/brp_4.nsf/newslines/F9C5458FD6BA83CA442579D1002E6AD6

8. Remarks of Robert O.Blake, J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ffairs //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0/145463>

9. European Union and 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a New Partnership // http://www.amudarya.net/fileadmin/_amudarya/bs/eu-ca.pdf





谢尔盖·库里茨

管理问题系统解决方法专家，
教授、技术科学博士

syak@yandex.ru

瓦列里·沃罗比耶夫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家
对外关系学院（大学）副
校长，教授、法学博士

vorobiov@mgimo.ru



新国家管理和宪法权利模式中的公民社会

从首次利用了“公民社会”词汇的阿里士多德时代到我们时代创造了许多反映不同立场的定义，他们的作者将近二十五个世纪使用它们评论“公民社会”概念。对概念的辩论未必有意义，它包涵那么多性质，对现有的定义的任何增删、修改都只

Сергей КУРИЦ, Специалист по системному подходу к решению проблем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фессор, доктор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Валерий ВОРОБЬЕВ, Проректор МГИМО (У) МИД России, профессор, доктор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

会导致无结果的争论。可是，所谓“公民社会”现象今天仍很迫切。新的词句花样、在线词汇装饰导致出现新的术语：“公开政府”、“大政府”、“电子政府”、“绿色经济”。它们的发明者-政治家们、政治学家们和记者们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要保持政权为人民解决其切身问题的权利，或者有意识地再次隐匿恢复强权世界的野心。

科学进步并没有涉及到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和周围环境的问题、危机与冲突。一切仍然在古代的独裁、对普选的代表性质的信赖、中世纪时代的政权分枝思想（理论上不可能影响对独裁者的从属的协调原则）、在美国等国的总统否决权中表现的好处不多的制衡原则以及其他迷信的圈子里。社会科学的世界危机导致国家管理和权利至今仍然效仿经验文物、依据权威的理论和政治学家们的猜测。而人民却为后果付出财产和生命。

至今真正知道的是，“公民社会”概念中有两种讨论课题：“国家管理”和“公民自治”。它们是完整系统（国家）的组成部分。直到XVII世纪（洛克之前）两个讨论课题被看作是统一的整体，后来公民社会被看作是国家的一部分，作为政权的代名词。这种二分法从国家出现之后已存在六千年并且只是确立了国家的特点，因此它和权威们所说的相反，公民社会不可能早于它，而类似的组织有别的名称。让我们来看看与“公民社会”概念有关的国家完整系统的二分法，以科学的严格态度来对待所寻找的概念。

活的大自然发展导致了有思维动物（人）的出现，他既没有利齿，尖角和硬蹄，得到生存只是依靠有意识地联合成为社会。社会中有思维者的增多，因而要求管理，即采取关于未来联合行动

的决定，以达到保护自己和后代，满足衣食和避开自然现象（住房）等等。出现联合体的新形式（氏族、部族），随之出现管理层次。部族社会直觉地接受动物群管理原则并重复多细胞生物体的管理原则，建立了下一个联合体-国家。国家包括由许多公民、临时居民，还有奴隶（在战争中俘获的别国公民）代表的人民-社会，自由的领土、管理系统的“国”的概念，它的管理层次不断增加，出现了管理的最高层-君主。后来出现“权利”概念，它规定国家公民和临时居民的行动准则。

君主和社会距离的遥远，特别是作为军队指挥的角色，使社会成为君主及其周围亲随-上层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后来固定在法律上的国家管理主要方法是一个人-君主的独裁，君主做出战争与和平、使百万公民繁荣或破产的决定。后来人类历史被看作是君王的历史：人民只是君王用于达到自己意愿的工具。

实际上，从有集体意识形态的极权社会到自由-民主的所有国家法律制度演变过程中，在国家正常发展时期到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过渡时期，古代国家的独裁的效仿至今以不同形式保留下来。改变的只是形式和独裁的程度，它不断地导致公民和国家对抗的悲剧转折。

不满人权受损害的人民造反，进行血腥的革命，而在XXI世纪出现了非暴力的抗议和“颜色革命”，推翻了旧君王，选出了新君主。后者又按旧的模式行动，结果又激起人民的愤慨和反抗。

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制止，更没有防止悲剧转折的希望，而竞争国家的野心所激发的大规模毁灭和损害人类方面的科技进步只是固定了这种绝望。

对社会与国家发展的理论观点

国家结构中法规 (statutum) 起最重要的作用。早在中世纪就已把它当作联合人们、确定其秩序和职责的工具。现有国家的法规至今被看作是特别现象 (通常认为它和联合人们的其他方法毫无类似之处)。

不能把国家法规看作是社会特点 (类似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不大的中世纪联合体除外), 因此讨论作为社会部分的公民社会的活动没有意义。

可是国家法规改变了。和没有时间和寻找最佳形象的资源限制的大自然进化不同的是, 任何神器, 即人工制造的物体: 汽车、组织 (包括国家) 或观点都不可能“永远”满足为此创造的初衷。这种更新进程可以简称之为“人为进化”, 它是有统一核心的完整的物体的非普适性引起的。在生物体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

下面以国家法规为例研究这种性质的表现。它们的改变是国家产生的两种不同根源: 神 (圣) 和政治根本源所引起的。神根源出现在古代世界, 第二种 (作为术语) 出现在中世纪并且在我们时代仍居主导地位。

所有著名的古代国家和帝国都有圣法规, 它作为巩固皇权的补充手段。伴随着人一生的不合理的信仰导致联合信徒, 从而建立管理他们的宗教上层。宗教上层管制人民, 处死任何一个敢于怀疑神职人员和最高神明存在直接联系的人。

后来这种情况妨碍了世上君主对国家的单独管理, 因为他们只能通过宗教上层和神交接。因此君主便自称为神的代表。

人民为那些不理解双重政权管理危险的欧洲大陆君王的错误, 在长达将近六百年的宗教战争中付出了百万生命。这种明显的缺

陷至今保留在某些甚至是发达的国家中，经常引起不稳定，为未来排除双重政权企图的牺牲奠定了必然性。

国家政治法规的概念是由于不理解而产生的。根据许多研究，包括韦伯，迪韦尔热，边沁等知名学者的研究，术语“政治”反映“执政人士掌握政权以保障对社会的控制并得到个人福利的追求”。为了给君主按照自己的喜好（甚至是任性）做出决定的权利的体面理由，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了“政治”这个词，当时它意味着“国家”（词汇“政治”-多数人的管理-亚里士多德把国家具体称为共和国）。今天在许多情况下，词汇“政治”按互换性原则与“政治系统”或者“国家”并用。

这种不理解至今具有悲剧性后果，因为政治决定给予一个人（或者狭小的集团）无限的权利并且不受社会机制或道德的约束。

按照古代的“分而治之”原则，君主有意识地破坏人们的合作追求，而这是人类在历史上保护自己和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君主利用大臣（今天称为政治学家、政治战略家、谋士），并以死刑的恐吓，迫使臣民相信别国的公民是敌人。

后来，也是在政权的参加下，同样的神话诞生了“民族”概念。民族是文化的，然后才是民族和社会的特点。术语“民族”首次出现在伟大法国革命过程中，当时出现了建立某种社团来取代已丧失的“法国王朝臣民”的必要性。“民族”概念及其国家领土至今是损害公民的不稳定根本源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按照这种划分的概念（固定在国际法中）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损失。欧洲国家总是相互竞争，组织战争，在自己和别国领土上散播了数百万人的，主要是年轻人的坟墓。

国家内部政治基础上的冲突根源是“集体意识形态”-所有各种划分人们思想的通用术语。权威民族对国内所有公民的优势是普通的民族主义，一个种族优于别的种族是种族主义，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一个政党-极权主义等等，一个国家统治世界-霸权主义，在现代词汇中称之为（对所有人的）统辖。

组织法规是对作为基于“组织”概念的多种人们联合体之一的国家神的和政治特点的替代。任何一种组织都有其特点，例如，国家有发行货币、管理武装力量，采用合法的暴力等的权利。承认组织法规使国家摆脱以前法规的矛盾并得到利用其他各种组织的成就的可能性。

在作为组织的国家中取代独裁政治管理（用人或螺钉）的是经营和营销方法（还在XVI世纪H.马基阿韦利就指出了它们和国家管理的类似关系）、参与式管理、Z-管理系统和XX世纪创造的其他管理。最后，还可以采用大集团公司建立管理系统的原则（代表基本概念“组织”种类之一是股份公司），它的财产权与管理权分开。不要和按照墨索里尼方式建立的国家政权与资本结合的国家集团主义-“公司国家”混淆。公司管理的原则提供实行长期战略计划的可能性，因为成功的执行政权领导人的任期仅局限于得到使股东（私有者）满意程度。

管理公民的方法

另一个违反人工产物的非普适性的例子是在唯一的主要原则基础上建立国家管理和权利系统。这里指的是国家仅使用经济管理方法，这意味着市场关系至上，不允许监督和调节。美国宪法之父的自由市场思想体现在工业、贸易的蓬勃发展，没有殖民主

义并改善了公民的生活条件。可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方法也导致了毁灭性的危机，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最后一次是在XXI世纪初，它导致了几十个国家的破产。

管理上把经济方法凌驾于其他所有方法之上导致了资本集中在一小撮金融寡头手里，他们拥有在许多国家建立政权的力量。他们确定对未来君主及其政权集团的普选结果，为此利用已被科学方法证明不具代表性的民主选举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

回过来谈谈苏格拉底时代以来最糟糕的，利用院外活动者和捧场者（后者扮演政治工艺家角色）进行贪污舞弊的国家结构的寡头方式。在今天的国家管理和权利系统范围内，只有历史的新一轮绝望悲剧转折能对抗金融寡头及其挑选出的国君。

国家历史的特点是独裁、战争、破产和牺牲。不是由于食品的需求（吃输家），而是由于君主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光荣和财富的追求而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教条。在国家法规中没有公民社会的位置。

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问题、危机、国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威胁人类生存的周围环境的冲突。依照A. 爱因斯坦的思想：“解决现有思维水平问题需要别的思维水平”，本文作者依靠现代系统方法学和在生物、管理理论等方面的认知成就创造了新的科学工具。在这个基础上创建了社会保护居民的法治国家的国家管理和宪法权利标准系统模式，并揭示了现代国家制度存在的缺陷的深刻原因。其中排除了漫长的数千年积累的管理与法律缺陷，提供经常提高公民和临时居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从而防止悲剧性历史转折¹。

做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它的严格的科学性，它对弊病的诊断，它在今天将近30个国家宪法试用例子中得到了证实。新的系统基于大自然亿万年试验过的管理原则，最近几千年人文法律和道德确定的大自然原则的部分道德限制，补充了生物自然进化中没有，但最近几百年在百万个人类的组织中使用了的管理原则。

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管理与法律系统的标准模式（按照大自然生物遗传性载体统一原则）适于公民社会存在环境，是社会的部分并代表其利益。只有旨在建立法治社会国家的这种模式中可能有公民社会出现和它的正常运作。

可是，管理与法律系统的标准模式实质是抽象概念。其实际使用需要及时确定“公民社会”概念-从理论讨论向生活现实过渡。

公民社会系统构成因素

按照A. A博格达诺夫创造的组织形态学-通用组织科学（A.冯·贝塔莱菲一般系统理论前身），提出公民社会作为完整的系统。

在没有社会与政权反馈联系的国家建立公民社会的目的是生物大自然和所有人为组织管理的总原则。

国家中不存在完整的反馈联系。这导致它的发展效率下降，而国家支出的增加需要从社会中得到补充的资金，导致其生活质量下降，即违反法律的合理原则。不存在公民社会就没有对效率和合理的适可关系的选择，而这种关系是法治的社会国家发展基础。

在国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对缺少监督君主和上层决定的反馈联系直觉地进行过无数次补偿尝试，但都以公民和国家对峙历史的残酷的转折告终。

公民社会的任务，应该保障达到的目的是依靠增多积极分子及其对政权决定的影响而加强它的作用。这些任务对国家发展的两个主要时期有其特点：1) 从现有的国家管理和法制模式向新的模式的过渡时期；2) 国家发展的正常时期。

公民社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联合社会努力，激励政权按新的国家管理和宪法权利模式建立社会合理国家。它在国家发展正常时期的任务是经常降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按新的管理与法律模式完善社会与政权关系。

在两个时期都由公民社会和政权协作（直向和反向联系）的顺序确定。

公民社会的结构和管理

公民社会是为了建立和运作国家管理的反馈联系而自发的社会群体。它联合为别人的福利和命运而行动的人们。有这种素质的人坦诚对待外来影响，按心理学家的K. Γ 云格的建议，取名为外向人，他们和回避外来影响，局限于内在世界的内向人不同。这种人相互尊重，尊重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知识和文化，在共同利益、信任和责任基础上联合。

尽管“公民社会”术语在XVII-XVIII世纪就已通用，它作为系统特点的定义，包括个人和集体的特点，个人及其联合体的管理原则等等，至今未定。

在世界历史上XIX世纪下半期出现，XX世纪极权制度时期被消灭的俄罗斯知识界可以说是类似公民社会的特点之一。这种称为“知识分子”（intelligentia—理解、知识力量、知识）的联合体代表专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是复杂的创作劳动、发展和传播文化工作的人们。

“知识分子”术语是作家И. Д. 博博雷金（1836-1921年）开始使用的。这个术语从俄语传到其他语言。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确定“知识分子”为“希望独立思考的人们”。西方认为“知识分子”是“智者”，从事脑力劳动者。

公民社会的特点在于它的积极分子不追求成为领袖，尽管希望自己的职业活动得到承认。这就是公民社会积极分子和社会积极者协会，例如，和XXI世纪初非暴力抗议运动和“颜色革命”领袖之间的不同之处。

公民社会及其现代的理解“概括社会的全部非政治的和非政治化的精神和经济关系。主要的道路是为人们建立相互协作的可靠，方便的渠道：国家向保护人权的最有影响和行动及时的组织演变”²。康德认为这是人类迈向伟大目标-完整的法治公民社会，即国际、世界公民社会的历史运动的泉源。

K 波普尔的“公开社会”接近公民社会概念，他证明普拉顿、黑格尔和马克斯理想国家是暴政：是“产前的、基于对魔力的信仰的，部族和集体的社会”，即封闭的社会。而个人独立做出决定的社会是公开的社会。后者的“活的公民结构存在不取决于它们反对还是支持国家；这是人们日常普通的生活环境”。组织在危急情况下不仅产生公民协会，而且产生人们对事件的特别态度³。

自由社会需要知识基础，使有可能实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不必诉诸暴力。为了接近自由，公开社会应该成为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不是有结构的公民联合体。它的部分有可能在人们生活任何方面，执行政权上层任何水平和通过与监督国家的战术和行动性决议的任何阶段运作。与此同时，在通过战略决议时监督由公民（整个社会）直接或间接进行。

正如任何活的机体那样，公民社会希望成长。这表现在社会积极分子的增多和他们影响的增大。这是人类生活中鼓励和发展全面文化、道德、追求明智，解决国家的许多问题的积极因素。

公民社会和国家行政当局的相互关系

按标准模式建立的国家的宪法有两个独立管理的主体：执行政权（国家行政局）和扮演两种角色的社会。第一个是最高立法者-独立掌握制订和确定国家目的，它的宪法和监督国家决定是否符合宪法（直接的民主）。第二个角色是反馈关系的载体-社会有权监督执行政权通过的决定及其结果。从管理观点看来，这两个角色是直向和反向的联系，公民社会对其运作方向起主要作用。

直接联系（政权能给公民社会什么）

自主的人民保障公民社会的合法化，巩固它的法律主体地位，确认它在采取和执行有关人的权利和自由各方面的国家决定时是管理的平权主体，即作为社会的全权代表。这是符合社会保护居民的法治国家是第一个条件，而对过渡阶段国家是伙伴方式。

第二个条件：立法进程的透明度。它保障社会有可能参加制订和通过执行政权与地方管理机关决定的可能性并有可能监督立法和执行机关公职人员履行宪法规定和执行法律的程序。

第三个条件-法律规定公民社会和管理程序的其他参加者的平等可能性。应该注意到公民社会是能够阻碍政治和商业广告形式的虚假信息，社会和媒体传播（往往是制造）的集体思想与信仰宣传，准确些-误传-的不多的实际工具之一。

反馈联系 (公民社会能给政权什么)

公民社会依靠尽量减少社会向法治社会国家过渡时期的损失, 开辟国家加速向宪法目标前进。按照控制论科学家 V. 埃什比为包括国家在内的大系统发明的必要多样化基本定律, 参加管理的公民数量增加, 对负面挑战增加做出相应反应的可能性。公民知道, 为了防止事态发展的不良后果需要做些什么。

必要多样化定律使有可能减少带有病毒性质的贪污现象。公民社会的“千只眼”恢复机体的免疫力, 依靠自身力量保护自己。

公民社会能对国家管理系统的具有高度教育和道德水平的国家领袖们和经理们的再生产(复制)起良好作用。最后, 这是通过唤醒(更新)和加强仅在儿童时期产生的思考天赋来强化我国很多公民与居民智力的唯一力量。这种性质是发展个人认知能力的无限源泉, 它确立人类未来生活并对抗垄断政权的自私追求。

公民社会拥有实际的政权, 因为大量的公民能辨认实际的障碍并帮助国家克服它们。

公民社会和社会的相互关系

公民自己愿意利用为之提供的人民政权自由的优越性, 愿意承认公民社会积极分子们采取的合法努力而不会由于盲从而拒绝给予理解和支持么?

通常认为, 介于提供的可能性和它们的利用之间的是公民意识的定位价值、世界观(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在人类发展现阶段出现了和排挤所有已有源泉的新源泉-因特网。没有内在道德和文化限制, 没有对后果理解的需求的言论自由把社会推向立即的享乐主义(这里和立即), 对此追求在早期童年形成。结合

表达顾主-政治家和寡头们利益的误传的影响，今天公民群众意识对一切的定位价值都变得淡漠，只需要最少的思考。最近几年的群众抗议运动证明了这一点，参加了它们的大都是情绪极端和相当富裕的年轻人。大部分公民实际上对需要思索的国家结构及其未来发展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每五、六年不得和它们接触一、二个小时，与此同时要做出自己的决定命运的选择！

公民社会和社会相互关系的首要问题是唤起全社会理解现在事件和事实与过去的因果联系的需求。没有这种需求使有思考天赋者感情用事，被误传媒体、后院活动家、战略家和捧场者利用于鼓动和欺骗公民，挑起新一环历史悲剧转折。理性思考的需求也有对立面-我们时代的某些部族至今不知道男人对婴孩诞生的作用。

由于许多国家抗议运动的高涨又引起了对公民社会的兴趣。在这种时期向来出现呼吁公民社会解决个别问题的诱惑。然而古代哲学家们已清楚，公民社会的作用广泛得多：它确定任何国家在它发展的任何时期的命运。

实际利用公民社会优越性的障碍之一是缺乏操作的定义。确切定义的可能性只是在建立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目的的标准国家管理和宪法权利模式之后才出现。

阻碍建立公民社会和利用诸如美国理解的“公开政府”（国内保持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等伪造物替代它是集体意识形态胜利的前提，也是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建立极权管理的目的。

按照在许多科学家思想中得到反映的操作定义，公民社会是自发形成的各种非正式社会政权中心，它们影响国家行政当局（执

行政权) 采取和履行决定, 预防问题、危机、冲突的激化。公民社会的积极分子具有高尚的素质: 公民责任感、文明行为和积极的公民立场。

这种阐述使公民社会实际活动的性质和对它为了社会利益而影响政权的评价较容易理解。公民社会只是在成为国家的平等和负责伙伴之后才能帮助它解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尖锐问题, 特别是在迈向建立法治的社会制度的道路上, 从而制止公民和国家对峙历史的悲剧转折。

1. 详看: 库里茨 C, 沃罗比耶夫 B. *国家弊病。国家管理和宪法权利诊断* M.: 2010.

2. 社会学: 百科全书/. A.A.格里察洛夫, B.A.阿布申科, Г.М.叶韦尔金, Г.Н.索科洛娃, O.B.Терещенко捷列申科. 明斯克、大书店 // <http://slovari.yandex.ru/dict/sociology>

3. 百科全书“全球”列举了1985年墨西哥消除地震后果时公民社会形成的自发性质 // www.krugosvet.ru/enc/gumanitarnye_nauki/sociologiya/GRAZHDANSKOE_OBSHCHESTVO.html?page=0,2





叶甫根尼·沃罗宁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主导研究员，特命全权大使

tverv@rambler.ru

谈武装干涉的合法性： 对利比亚的开战理由 (CASUS BELLI)

北大西洋联军入侵利比亚以及西方共同体国家的类似行动（南斯拉夫、伊拉克、科索沃），引发对现代国际法原则和准则提出的疑问，首先是对国家主权的问题，目前还未有做出应有的法律评估。

北约国家反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的授权，其行动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当今条件下强制性军事手段学说应用的第42条款。动用武力的决定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但被“无限制”的应用，则有参与北约机构的一组西方主导国家确定。现代实践规定，将动用武力的有限权能移交安理会¹。就利比亚事件上，有限制地使用武力的授权，

只限于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其目的是在防范卡扎菲政权反对本国人民的行动中，未有联合国以维和性质的辅助（观察、监测）职能形式参与。就像按代顿协议和平调解带有波黑的“平行战略”。实质上，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冲突上运用了波斯湾战争的构思。根据此剧情，世界国际组织委托了一组欧洲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相关”成员国）在未有本组织“维和代表参与”下使用有限制的军事力量。

联合国章程第41条规定，为对蔑视安全和人道领域被公认的准则的国家启用非军事手段的影响。类似的“软法”规定禁运、冻结相应银行账号的措施。只有当这些非军事措施不够或无效情况下，联合国章程第42条准许采取军事-武力手段。联合国成员国根据第43条款的规定，能在未经预先协同的情况下，为落实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授权，进行强制性战役提供自己的武装力量。近几年来，这实际上成了将一般民间保护法的实践用于冲突后的调解，包括维和行为²。

根据联合国章程第8章，现有的维持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地区协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应委任框架内能被授权进行一定的军事行动，包括人道目的的行动。作为适应类似任务的，比如欧大西洋空间，能以根据联合国章程第8章³含义于1992年宣布自己“地区组织协定”地位的欧安组织来加以考虑。适应于利比亚的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应授权，可以赋予阿盟。但阿盟在阿拉伯地区的作用，根据不同的评估是“暂时”的，并就总体而言效果不大⁴。

联合国组织利用政治资源和地区组织军事潜力的问题，还以对地区协定的广义解释而恶化。北大西洋军事联盟——北约不属于

地区协定范畴。由联合国宪章第8章承认的地区组织，承担“法律上遵循”联合国章程条款的义务并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无权采取军事行动，包括迫使接受和平或以人道保护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在每一具体情况下，要有安理会的相应决定。北约的维和行动和欧盟军事检察院——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未有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应授权，不能被批准。

因在冷战条件下形成的“防务政策”的特殊性，根据联合国宪章第8章，北大西洋联盟不享有地区组织的法律地位。为获得此权，即，由联合国授权参与维和行动，北约和欧盟为自己被视为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第8章精神的地区组织，对相应的创建文件进行了修改。但这种以部分的“外形”来适应通常的地区组织地位，既不改变北约，也不改变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实质：两个联合体依然是仅追求本身的军政和财经利益的封闭的，非全欧集团。西方联盟对冷战年代分界线的忠诚，不允许将他们与统一欧洲大陆同一。

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加入一般地区组织范畴予以英-法组合落实联合国就利比亚问题授权上的依据。其合法性只限于作为克服人道危机为目的的黎波里施加压力设立禁飞区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没有规定北约为推翻卡扎菲政权和实施“政治上的过境”（西方措辞）进行战争。

产生了由联合国安理会在法律框架下批准的只限于人道目的的行动和以对现行政权进行军政压力为目的的行动转化为国家间的冲突现象。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未有对北大西洋国家进行反对北非主权国家战争权利的规定。西方三大国对利比亚内部危机的干涉，后又将大西洋军事司令部机构卷入此进程，成

了“北约授权”，而非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布鲁塞尔“不断援引”联合国的授权——不只是单纯地另作解释，而是明目张胆地更替。例行“独裁蜡像”的摧毁，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上来说，不能被视为是对武装侵犯，废止国家主权原则和对国际法准则的现代虚无主义进行的辩解。欧洲专家中心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限制性的，主要应用于保护人权的法律至上。现在又出现一个新术语——替换“谈判解决问题的和平主义”的“人道军国主义”。根据法国现代知识分子代表之一贝尔纳-亨利·雷威的定义，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意味“现代乌托邦最后”降临并追求宣布的“干预权利”⁵胜利。

国际事务中法律至上的原则，甚至是作为“占统治趋向”的人道主义法，也不意味取消像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一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引人注目的是，在反利比亚国家战争前未曾有像通常战争前应伴随有的外交谈判阶段。未曾启用为调解危机局势有更好效果的“软力量”工具。利比亚的武装冲突——非一次性的强制性的军事-武力行动，这是战争。类似的战争已被界定为“人道主义战争”或为人道主义干预⁶。在分析反利比亚战争性质时，出现从国际法上对其定性的问题。如果按胡果·格老秀斯对“正义战争”的理解，其应当符合五项标准：尊重合法主权，目的的合法性、力量对比的均称，承认战争时最后的论据和战争有被停止的可能性。北约做出的是有利于战时法（*jus in bello*）而不是避战法（*jus contra bello*）的选择，杜绝了所有其它对利比亚危机进行非军事性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无论对经典战时法的法律定义（侵犯、合法防务等等）理解如何，战争就是战争。当今以“国际冲突”普遍代之的“战

争”术语，与不顾及规定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法律准则的经典战争理解的法律内容连在一起。无论是战争，还是冲突，根据作为“履行法的实质保障”的相互关系原则，更可取的是国际安全法的说法，有两个不可违反的条件。参与冲突的是双方或更多方。开战行为应当符合正式宣布（无论何种形式，口头形式也行）处于战争状态的规定。否则国家间冲突不能被定为符合战时法（*jus in bello*）。1990-1991年反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后，据英国律师断定，视“战争”或“冲突”术语为“虚拟”的，作为“宣战”或一些国家形式上承认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很少出现于现代国际实践中。利比亚战争中，在“北约联军”对国内冲突进行干涉后，出现了三方参与者：利比亚政权、国内反对派势力和北约海空打击组成部分。西方反利比亚的行动未有必须的对空袭利比亚领土合法化的国际法律上的保障。无理援引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不是法律根据。根据德国律师援引国际法研究所决议(AIDI 56 (1975) 544ff)的看法，国内战争期间由“第三方，外界”采取的侵犯，被视为是不可接受的⁷。

这里出现道德方面的双重性：利比亚国家为捍卫自己的主权，反对外国入侵的道义权利和国际社会遵守联大2005年有关平民免遭恐怖政权迫害条款承担的“保护义务”决议的道义权利。就道德而言，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执行，具有政治和法律的依据。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产生的法律上的磨擦，目前未能解决。利比亚的危机及其结果也未能回答其它存在的问题。对外来的入侵未予以实际的抵抗：利比亚军队又跑哪了？军事上的

投降原因是“消极”回击北约的空中袭击吗？仅是移动高射炮系统，利比亚就有两千多件。如何来解释反对甚至在西方教练和特种部队参与的欠缺训练的武装反对派的无效性？同样有伊拉克军队在“海湾战”期间出现的备战和“弥散”的问题。此状态令人想起发生于另一个时代，罗马占领利比亚的迦太基城的状态。约瑟夫·弗拉维在“犹太战争”一书中，将阿拉伯的失败解释为：“阿拉伯人陷于极度的恐慌，而他们的首长在见到犹太军队就处于休克状态”⁸。

承认说国际“战时法”起限制作用，不如说是将暴力合法化，有其道理。俄罗斯和欧洲的法学派以此为基础。俄罗斯法学派视国家间关系调节器的国际法的主要优点在于人道主义。根据俄罗斯法学家尼·米·科尔库诺夫推出的法律学说，不能“以干涉或不干涉来调节法律，因为，这将意味是对最可怕的暴力无动于衷的见证人向抽象原则提供牺牲品”⁹。对俄罗斯国际法学派就人道法做出的实际的文明性贡献至今被低估。俄罗斯杰出法学家和外交家马尔顿有关陆地战法的条款写入海牙公约前言（马尔顿条款）成了国际人道法的主要原则。“马尔顿条款”阐明了人道性的总原则，其首次被提升为对“战争法”的理解。“马尔顿条款”规定，“一旦出现国际法未有的规定，平民和已退出战斗的伤、病员和被俘人员依然受国际人道法条约和惯例原则的保护”¹⁰“马尔顿条款”被应用，使发生战争冲突期间的公民享有免疫力原则。利比亚战争中显示的和其它武装冲突经验证实的“马尔顿条款”的落实问题，在现代条件下要求制定附加的准则法。许多保护公民的条款，无论战争持何种性质（民族间的冲突、国内战争、性利比亚的外国侵犯等），至今归于一般的国际法。

武装干涉问题同直接人道主义侵犯学说相连的国家主权的原理是不相容的。与此同时，在北约新“里斯本”战略学说中，一字不提作为对集团使用军事力量进行辩解的人道侵犯。保障世界人权，被西方社会国家的对外政策宣布为“基本原则”。传统的军国主义在非欧洲文明区的“武力型民主化”政策中保留了自己的作用。今天，其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可能带有讥讽口气写道：“征服的危险摧毁东方僵死的宗教，这无疑有利于军国主义”¹¹。

西方联盟对利比亚的战役，像美国专家团队认为的，示范了“具有保护和平居民良好义务准备并确认了其作为国际主动性准则”的生命力。美国应用“保护公民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toP）和他们在世界各地权利的学说，从国际法角度的以下三个条件被视为是“合法和有理的”：

- 1) 美国应当对干预的动因规定限制于种族灭绝、一贯性暴力、大规模屠杀公民和其它反人性刑事罪行事实的高标准。
- 2) 在所有其它可能性已用尽或利用的和平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武装干预应当被视为最后的起“对称”作用的手段；
- 3) 多边干预应当为更可取的形式，与单边相比其具有更多的合法基础。

作为国际法原则的主权问题在受到干预时其将不予以顾及，只是提到“主权性仍然是世界秩序的稳定力量，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屏障”¹²。

在欧洲举行的科学分析辩论会上，贯穿了明晰传统理解和意义在实践中发生变化可能性的说法。对主权国家进行的现代干预、武装侵犯是否意味以“人道军国主义”取代通过谈判解决冲

突的“和平主义”？是否新的“侵犯主义”将取代以不干涉内部冲突或国内战争为原则的中立主义？利比亚的战争是否是“干涉权”的胜利？但保护权和干涉绝非同一。目前还未取得妥协性答复的主要问题是：是否能将利比亚战争界定为“正义战争”？估计是不能，如果遵循正义战争的五项标准：合法的主权、合法的目标，利用对称的军事手段，战争作为最后理由和有根据地为取得结果的打算。如果这种打算是为向另一种文明灌输西方民主价值观并在新的，得到解放的社会中取得社会和谐，这不见得有效。前不久的所有经验显示，作为欧洲生活标准的“社会契约”在伊斯兰文明中是不可能达成的。

对作为形成中法律准则的“保护责任”学说的“绝对合法性”也未能取得共识（联大2005年A/RES/61决议第138条和139条款）。考虑到学说是对内政危机（这里具体指利比亚）做出回应的军事-武力决定的“平反”，也就不能视其的应用为无缺陷的道德，承认利比亚的局势为开战原因，即阿拉伯国家和北约参与方处于战争状态，被法国专家定性为“先发制人的战争”，而伊拉克战争则为预防性的。类似的定义，按理来说，伴随了众所周知的对联合国安理会1973决议做的“辩解性的”自由的解说。

对利比亚开战的原因（*casus belli*）是一种混合性质的冲突。其已得到验证。在此冲突中有两种武装冲突：内政上——卡扎菲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和国际性——由外国列强的干预将叙利亚内部危机国际化。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联盟军的反塔利班行动，同样具有类似的性质。对这种混合性质的武装冲突，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相应的分析，即：这些冲突（利比亚的“双

重性”冲突和阿富汗的冲突)是否属于国际冲突法。德国律师指出,阿富汗事例上,美国最高法院援引日内瓦公约通则第3条,作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行动中必有的最低标准。北约进行的利比亚战役——作为对国内民间冲突的干预——到目前还未对其做出必要的从法律上对武装冲突法是否符合准则的定性。西方国家的官方立场和社会舆论中,继续存在对侵入利比亚出自以道德标准而非法律的理由。还在北约对科索沃采取武装行动时,就有过“丧失道德合法性”的提议。德国知名分析员哈贝马斯¹³推举的一种说法说,北约国家的军事行动如不拥有法律上的辩解,其也拥有道义上的辩解。

以危机局势和武装冲突为背景出现的“强制外交”还未有严格的法律框框,其主要建立在的丧失政治上的合法性。强制外交可以从两个方面施行:强制冲突方进行谈判和强制停止战斗行为或对和平居民采取的非法的和非人道行为(利比亚就是一例)。根据国际法行使的强制外交属于外交上的极限能力。其任务是:确保被责成有义务以非武力,但也非制裁态度调解危机。看来,这种外交逐步成为阻挡武装冲突发展的较完善的“软力量”形式。

西方社会对像这种起非武力影响作用的,以谈判进程作为调解利比亚问题主要工具的“强制外交”却没有需求,其宁愿采取国际“准委任”的军事肃清的武力决定。众所周知,在第1973号决议中未对卡扎菲政权有“肃清委任”或“政治过境”的内含。记载于联合国大会A/RES/61决议中的保护任何一国的和平居民不受当局非法强权迫害的责任,并不同记载于1999年1月20日联合国大会“进行国际谈判的原则和规定”的决议中有关利用“谈判作为

和平调解国与国之间争端的灵活和有效手段”责任相矛盾。当代谈判制度有国际法两个主要原则来决定——不使用武力和和平解决（调解）争端¹⁴。决议还包含了援引“达到谈判提出的目标”的附加原则。

“利比亚经验”使得使用国际非军事化强制手段，如制裁问题迫切化。制裁至今未有稳固定型的或不容置疑的内容。未有经验证实国际制裁机制为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强制手段。制裁措施被视为是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全部或选择性的禁止对外经济活动（禁运），军事性质的行动（设立禁飞区），对外政策行动（限制参加国际组织，外交驻留），等等。尽管制裁和干预（侵犯）不是同义词，但根据研究界的看法，是相辅相成。制裁的肯定面，在于其能逃避直接对峙和为进行干预的合理性打问号。与此同时，制裁的受害者又往往是平民，也是显而易见的。

防范干预和使用武力机制的职能直接取决于国际法准则的履行。西方现代国际法“虚无主义”经常使集体预防武装干预做出的努力无效，就像在利比亚发生的不合法行动导致主要法律原则的破坏，首先是国家主权原则。西方伙伴对国际关系中法律至上原则宣言式的示忠，依然是国际安全体系无效的主要原因之一。众多的西方律师指出以下事例。在美国及其盟友侵犯伊拉克后，西方学派的国际法确立了一种立场。根据这种立场，国际法不再被视为西方大国动用武力的合法限制，尽管对他国进行的任何干预日益成为国际司法的课题。在美国法学界也曾多次指出，正式立场势必受对法律原则和非法律论据持的单方面态度的限制¹⁵。不同于法律上的态度，基于政治合理性的外交解决办法，有可能利用“冲昏头脑的”各种方案和巧妙地措辞，并将证据或论据的

力量归于其，而一些单一句子，其词和意义（谈判进程期间）只是起插图作用。法律试图对这种态度进行“开导”的现象极少。“法之学说”正式企图将辩论朝这个方向推进。“除了自己的正派性”其也没什么可丧失的¹⁶。

在结束对以保护人道主义原因围绕“合法性干预”进行的解释，依然存在一些今天未有答复的问题。当今西方“军事化人道主义”在科索沃、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实践是否在共同的，集体安全领域建立了新的现实？是否能将这些先例视为现代国际法“新准则”的基础？使用武力的实践是否像美国著名学者之一说的做到将“外交吓跑”和赋予其将丧失和国际法中法律至上原则传统关系的“一定的形式”¹⁷？最后，俄罗斯和其它大国，首先是金砖国家组的现实潜力，它们留为不折不扣地履行作为现代国际体制“法律性夹子”的国际法准则的拥护者，旨在抵制加强以法律之外的非法调解安全问题的趋向和普遍保护人权。

1. 伯爵 威茨通 B. 国际法. 莫斯科-柏林, 2011. C. 848.
2. 同上 C. 861.
3. 欧安组织赫尔辛基文件 10.07.1992 (ILM31, 1992. 1390ff)
4. 伯爵 威茨通 B. 命令 C. 861.
5. Levy B.-H. La Guerre sana l'aime. P. Grasset, 2011.
6. Le Monde. 24.11.2011.
7. 伯爵 威茨通 B. 命令. C. 837.
8. 弗拉维 И. 犹太人的战争 СПб., 1991. C. 85-86.
9. 俄罗斯国际法科学文献金库基金会 М., 2007. Т. I. C. 34.
10. 同上 C. 10.
11. 托尔斯泰 Л.Н. 最后的日记 1910 г. 12 мая. М., 2010. C. 63.

12. *Stewart P.* Libya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 Foreign Affairs. 2011. August 26.

13. *Habermas J.* Bestialität und Humanität. Ein Krieg an der Grenze zwischen Recht und Moral // Die Zeit. 1999. №18.

14. 鲁卡舒科 И.И. 外交谈判和谈判上通过的文书 М. Nota Bene, 2004. С. 11.

15. *Carty A.* The Deca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Reappraisal of the Limits of Legal Imag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nchester, 1986. P. 115.

16. Ibid.

17. 霍姆斯基 H. 新军事人道主义 М., 2002. С. 218.



中国和反导弹防御系统

尤里·别洛布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
迫切国际问题研究所, 高级
科学工作者, 政治学副博士

yuriy.belobrov@
dipacademy.ru

美国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民族安的威胁比对俄罗斯严重得多, 因为中国火箭核潜力比俄罗斯薄弱, 存活能力较低。当美国及其盟国并不特别隐蔽对其称为挑战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打算时, 中国不能不对美国军事结构迫近其边界的计划警惕。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毫无疑问关心美国开始实行的围绕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组成部分的计划。由于俄罗斯仍是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中国直到最近仍和俄罗斯不同, 把这个问题看作是长期, 或者至少是中期前景的潜在威胁。在欧洲部署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组成部分只是间接地涉及到中国利

益，特别是如果俄罗斯和美国能对此问题找到权宜的解决办法。中国过去和现在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付潜在的反导弹威胁出现的关键方针是秘密发展自己的火箭核武器。并支持任何推迟美国实现反导弹防御想法的措施。中国参加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外交努力，尽管自己并没有在国际舞台上提出自己的建议。

担心在增大

不久前 B. 奥巴马政府关于把美国政治重心从欧洲移向亚太地区并在中国围的亚洲地区和近东建立防止来自伊朗和民主朝鲜火箭打击威胁的盾牌的决定迫使中国军事政治领导加强对此问题的注意。它认为这会破坏中国民族安全，并在最近几年就会损害全球和地区的稳定。今年三月五角大楼宣布的加速在亚太地区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并利用在欧洲已尝试过的决定的打算使中国更加不安。按照美国国防部宣布的计划，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四个组件部署在冲绳，三个在东京附近。此外，在冲绳附近水体将有三艘装备了“宇宙盾”反导系统的军舰巡逻。美国军方领导说这将保护美国和盟国军队免受可能来自北朝鲜的火箭袭击。在海湾各国也将部署七个“爱国者”截击系统，以防止来自伊朗的可能的火箭袭击。

中国完全有道理不相信美国关于在亚洲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为了截阻民主朝鲜和伊朗火箭的说法。中国军方有理由认为这些计划的实现将高效地使相对有限的中国火箭核潜力贬值。

与此同时，中国不能不考虑到美国军事活动家已在思考和中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情节并进行准备。例如，2005年六月在参议院军事力量委员会批准美国空军总司令的听证过程中，莫斯利将军

说：“对于他，计算美国在亚洲一旦和中国冲突时击败它的空军力量必要组合是重点”¹。

不过，在俄罗斯对美国 and 北约部署欧洲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激烈反应背景下，中国官方和中国专家社会对美国建立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亚洲部分的反应还相当冷静。甚至可以说，中国已容忍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不可避免地在中国领土附近出现。对美国在亚洲部署的明显挑衅性步骤，中国领导的反应只局限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简短声明，他说：“我们向来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当慎重对待反导弹防御问题。以维持国际稳定和加强战略信任，用政治外交措施来达到全面安全”²。中国对美国在中国民族利益地区的挑衅行动的克制态度来自中国领导奉行的等待和“谨慎定向”战略，它基于理解中国在最近的将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对抗美国的军事准备，相应地，国家还未能和美国进行公开的地缘政治对抗。

实际上，现在美国国防开支比中国将近多六倍，据美国分析家们的评价，中国能到达美国领土的战略核火箭不过几十个而已。而且中国战略核力量和俄罗斯的不同，它没有克服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装备，自然会变为美国反导火箭较容易击中的靶子。虽然现在中国军费迅速增加，它不可能在最近的几十年赶上美国军事实力。因此，中国领导继续遵循邓小平的遗训：“保持冷静克制，深思熟虑应对，最好是建设性地等待，不要追求占上风”。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仅是呼吁美国表现明智和克制。正如美国分析家们警告的那样，中国并非总是“躲在栅栏后面”。如果西方对中国奉行遏制和准备先发致人战争的政策，中国可能逐渐变为“坚毅”的国家。

就此值得回忆本世纪 21 世纪初拜登担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时说的话。他指出：“现在中国的洲际弹道火箭不超过两打。我们的侦察机关认为，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引起中国核潜力几十倍的增加。与此同时，我们没有注意中国可能的行动，如果真正开始许多专家认为不可避免的军备竞赛，印度和巴基斯坦（这里还要补充提到民主朝鲜，不久前试验了自己的核结构）必将扩大自己的核计划。这样，单方面退出反导弹防御条约和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不仅是危险地忽视摆在面前的实际威胁，我们还可能引起新的军备竞赛，建立核亚洲”³。

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报告证实了2008年参议员 21 世纪初拜登的论据。其中指出中国在五年至十年后核火箭力量将至少增加三倍。报告中说，如果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的20个火箭并不难，80个就会造成对美国安全的实际威胁。已经在2011年八月，美国国防部引用侦察资料宣称中国大概已有75个远程核火箭。此外，中国军队还有120个中程和中短程火箭。此外，中国北方建立了4千8百公里长的隧道保藏火箭和核弹头。还有资料表明中国在制造分弹头的火箭综合体，试验自己的作为反导弹防御系统组成部份的截击火箭，研制反卫星武器，并首次在2007年试验。不过，对美国促使中国加强自己国防力量的作用却保持沉默。正如中国研究家孟洪华说的那样，中国安全战略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弹防御条约和开始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引起的国际战略力量失衡⁴。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歇斯底里地部署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非但导致破坏全球战略稳定，而且不能加强自己的安全。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回应措施大大降低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效率，导

致新的军备竞赛，形成国际关系上的猜忌和恐惧气氛。遗憾的是：今天的美国统治者—众所周知，现在Дж.拜登是美国执政上层的第二号人物，—看来甚至不顾自己的完全正确的判断。

共同的观点

现阶段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评价实际吻合。双方都认为这是对自己火箭核遏制力量的直接威胁，是破坏仍保持着的全球战略稳定的工具。2011年六月15日在上合组织参加国关于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特别声明中固定了它们的这种立场。上合组织成员国强调指出：“一个或一小撮集团国家单方面无限制地扩大反导弹防御系统可能损害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⁵。

承认反导弹防御系统的价值主要在于进攻而不是对美国首次打击的补充的美国分析家们证实了类似的评价和结论。К.利别尔和Д.普列斯指出：“如果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首次打击，这些国家就会剩下不多的核武器，如果还有。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较小和不很高效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已足于防止报复打击，因为被粉碎的国家剩下的弹头已太少了。正因为这样，美国拒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甚至建立有限的反导弹防御系统也采取新的，可能更有威胁性的形式”⁶。

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在XXI世纪初已经积极和俄罗斯一起反对美国退出1972年反导弹防御条约。在美国单方面退出条约后俄罗斯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是在国际舞台上共同反对宇宙军事化，以阻止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得到绝大优势。与此同时，它们考虑到了美国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进程很大部分是加强美国武装力量的宇宙组成部分。

按照中国专家们也同意的俄罗斯军事分析家们的看法，正是在近宇宙空间建立基于等离子粒团等的新物理原则的打击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有较大的威胁⁷。

考虑到这些，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日内瓦裁军会议就防止宇宙军事化有关的所有综合问题密切协作。

俄罗斯和中国清楚，建立欧洲反导弹防御系统和亚洲反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建立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既针对俄罗斯，也针对有限的中国火箭核力量。而且美国对中国的目的是尽量推迟中国达到和美国火箭核力量均势的时期。

中国对日本的担心也增大中国对美国反导弹防御计划的反感。俄罗斯专家们认为，中国不能不担心美国和日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能够大大削弱核遏制潜力甚至使之失去价值的新型反导弹防御系统⁸。中国分析家们认为，日本和美国建立战区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共同工作使它能够得到进攻武装系统、军事技术及其生产工艺。这一切使日本将来可以转向研制和装备自己的进攻火箭系统，鼓励其恢复军国主义，加强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影响。专家们警告说，建立反对中国遏制性核武器的盾牌会促使日本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从而破坏不扩散核武器制度，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

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关于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对话

诚然，中国密切注视俄罗斯和美国与北约关于反导弹防御方面合作的对话进程。中国的特别兴趣不仅是对持续的对话可能导致的折中让步，而且是这最后会对俄罗斯和美国与北约总的战略关系性质的影响，自然，总体也影响中国的安全利益。与此同时，

俄罗斯个别的有影响的政治家关于俄罗斯和美国与北约在军事政治方面可能或者必须建立更密切的甚至是联盟的关系的声明不能使中国领导增加乐观。因为中国没有影响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些问题立场的实际杠杆。它只能希望俄罗斯的许诺真诚，不打算为了和美国在反导弹防御系统与其他战略问题达成协议而牺牲俄罗斯-中国关系。这就是说，中国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公开表示信任俄罗斯立场，指望俄罗斯兑现诺言，对中国领导通报和美国、北约就反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谈判的情况。

当然，俄罗斯也理解，和西方建立联盟关系不仅丧失自己的部分主权，而有会失去东方的可靠战略伙伴。很明显，克里姆林宫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损害自己并且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

西方确实担心俄罗斯和中国建立联盟关系，联合迅速增大的中国经济潜力和仍然强大的俄罗斯火箭核力量。

这样，俄罗斯因素对西方和对中国都越来越重要，而且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增长，它对两方的意义都增大。

中国由于可理解的原因不对俄罗斯-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的协商进程作评价。因为中国对此问题对话的实际态度可以从它的专家们的评论中看到，他们最近对此问题的兴趣大大增高。例如，中国主要军事理论家熊光楷上将和俄罗斯专家 A. B. 鲁金交谈时谈到俄罗斯-北约在里斯本峰会上讨论了的有关俄罗斯参加建立欧洲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观望态度。他说，如果计划成功，就必须研究它的具体条件和对其他国家的后果。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失败，那就需要研究它的原因。不管怎样，中国对俄罗斯没有什么不信任⁹。

看来，2012年初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反导弹防御对话陷入僵局之后，中国对俄罗斯关于它和西方对此问题的协商不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的诺言的信任大大提高了。

可是，美国的立场使中国领导越来越不满。美国不认为需要吸引中国参加关于反导弹防御问题的对话并且不特别隐瞒其所建立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可能用于针对中国核遏制力量。实际上公认的五个核大国之中只有中国没有直接参加关于反导弹防御的协商，因而它只能依靠俄罗斯渠道得到关于谈判进程的信息。中国认为这不能接受，看来在寻找出路。监察中国军事计划和中国对于和美国关于战略问题对话态度演变的美国分析家 JI. 萨尔曼的报告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指出，不管美国计划是否为了对付中国，毫无疑问它会引起中国高度关注。她认为，美国和中国关系上按照“作用和反作用”原则的发展可能对美国的反导弹防御和全球闪电式打击计划，整个宇宙军事化计划造成严重后果，并且对中国武装力量现代化方向的确定将起最直接的作用¹⁰。

按照她的观察，美国这种计划的出现会促使中国方面采取反措施，包括对称措施，已经有报导称中国进行动能弹头和定向能源工艺的研究，它们可以用于反导弹防御系统和反卫星武器系统。不过，JI. 萨尔曼承认，中国上述技术研究还不能看作是建立全面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或者反卫星武器。正如中国一个专家所说的那样，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在科学方面束手无策”¹¹。

中国专家们强调指出：中国的确有资金和工艺快速增大自己的核力量，但在当前认为值得拥有不大的核力量，他们说，这符合

中国安全利益。由于中国领导还不容易解决一旦部署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时中国需要多少核武器的问题，中国最简单的反应是保留增大自己的核力量的方案，如果美国不愿意和中国就此问题认真对话。

与此同时，正如中国专家李滨所说的那样，破坏中国核遏制力量的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要求中国改变参加核裁军谈判进程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在核裁军方面采取步骤并积极开始和其他核大国合作建立讨论具体措施的正式谈判方式的时候到来了。中国分析家认为，建立五个核大国关于核裁军多方谈判方式使中国能够了解对此问题的相互关切。中国能向其他伙伴说明自己对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的担心，从而加强相互信任，更好地理解各方的核哲学。

总之，很明显，中国在反导弹防御问题上的传统的观望态度正在逐渐改变。中国研究家们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中国专家李滨和聂洪贵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中把美国研制反导弹防御系统和宇宙雷达站问题纳入了中国和美国关于战略稳定的扩大谈判的议事日程¹²。

一些结论

今天俄罗斯和中国面临实际的选择-在进攻和战略遏制力量方面卷入新的耗费巨大和危险的军备竞赛还是和美国与西方共同寻找另外的加强相互安全的方案。俄罗斯和中国重视第二个方案，它们的西方伙伴在迂回活动，指望离间俄罗斯-中国关系，拉拢俄罗斯成为自己的小伙伴，并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开始对西方有利的军备竞赛，在经济和政治上严重削弱中国。

对于俄罗斯，西方类似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合作方案是不能接受的。一方面，它违反俄罗斯的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把俄罗斯变为服从美国和北约的伙伴。另一方面，迫使它进行周围防御，在今天的状况下对它是没有前途和不能承受的重负。

我们和中国的平等的战略合作至少在中期未来不会出现，因为在可预测的将来俄罗斯在军事方面将保持对中国的战略优势。而且在原则上，即便不排除在遥远的未来中国可能有扩张主义，应该考虑到，现阶段中国既没有打算，也没有相应的力量或者类似行动具体想法。

而美国部署全球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包括欧洲和亚洲部分，实际威胁俄罗斯和中国的火箭核遏制力量，迫使两个大国联合努力对付美国基于追求军事优势和霸权的军事-政治战略。

因此，在美国和西方于解决反导弹防御问题上继续奉行不考虑俄罗斯和中国利益的方针或者选择利用新军备竞赛来拖垮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的条件下，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大力扩大双方基于平等互利的密切的战略伙伴合作。看来，中国至少在当前是希望和俄罗斯确立这种互利关系。

中国认识到相互支持会使两大国的战略立场大大加强，相反，如果俄罗斯和中国不协调，它们的战略地位将大大削弱。

显然，两国都不该长期拖延协商防止或尽量减少美国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安全不良影响的积极的反措施。当前的这些措施之中，可以有如下步骤。

第一，在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北约双方关于反导弹防御谈判范围内不停止与西方的对话的同时，俄罗斯应该建议中国共同提出关于建立新的协商或者五个核大国，包括中国的关于战略核武

器问题的谈判会议的建议。建立这样的会议使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协调行动，不仅加强双方的战略协作，而且可以对西方伙伴在这些问题的立场施加较大的影响。

第二，我国必须致力于加强和中国在反导弹防御问题上的相互信任，包括详细通报中国关于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 - 北约对此问题的谈判进程。适宜建立由相当高级的外交官组成的两国特别专家组，以评价反导弹防御方面局势的进化，协商和制订两国在这个问题的共同立场。

最后，俄罗斯和中国不仅需要议定共同制订和实行对美国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非对称回应，还要和其他国家加强努力以达到签订禁止在宇宙部署武器的条约。因为对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向日内互裁军会议提出的条约草案的讨论被封闭，两国需要进一步努力，包括最高水平的努力，使会议摆脱已形成的僵局。

1. *Cody E.* Shifts in Pacific Force: U.S. Military to Adapt Thinking New Plans Reflect Reaction to China's Growing Power // Washington Post. 2005. September 17. P. AO1.

2. China Daily. 2012. 27 March.

3. *Biden J.* Missile Defence Delusion // Washington Post. 2001. December 19. P. A39.

4. 别尔格 Я. 美国和中国研究家评论中的中国大战略 // 远东问题. 2006. №1. C. 45.

5. 上合组织十周年的阿斯塔纳宣言 // www.news.kremlin.ru/ref_notes/964

6. *Lieber K.* and *Press D.*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Foreign Affairs. 2006. March-April. P. 52.

7. 弗辛 B. 萨沃斯季亚诺夫 E. 无神话和政治的欧洲反导弹防御系统 // 独立军事展望, 2012. №12.

8. 什棱多 A. 俄罗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协作的某些问题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远东问题. 2006. №2. С. 28.

9. 鲁金 A.B., 伊万诺夫 A.B. 俄罗斯-中国关系: 问题和前景 // 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大学消息报 2011. №2(17). С. 316.

10. 萨尔马 Л. 中国和美国的“核政策综述”. М.: 莫斯科卡尔涅吉中心, 2011.

11. 同上

12. 同上



中国-非洲：互利合作经验

阿列克谢·博古斯拉夫斯基

非洲研究专家

alexey.kenya@yahoo.com

今天，中国成为非洲大陆生活不可分割部分的事实，当然，对谁也不是新闻。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奉行和非洲国家，首先是和拥有丰富碳氢化合物和矿藏的苏丹、安哥拉、尼日利亚、赞比亚发展双方联系的目标明确的政策。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迫切需要得到矿产和出口自己纺织产品出口的替代市场。大陆的政界和实业界也看到了替代西方国家的遥远的“东方巨人”，特别是在俄罗斯被迫大量减少在那里的存在的条件下。现在那种关系方式已有了些改变。它们已具有较平衡的性质，合作方面也更加多元化了。

中国-非洲关系发展的结果给人深刻的印象。现在已难于找到没有受到中国某种方式影响的非洲国家。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越了自己的主要追赶者-美国四分之一（2011年为了160亿美元），更不用说法国、印度、德国等和非洲国家贸易额摇摆在250-400亿美元之间的国家。第二，和现在与非洲贸易刚刚达到危机前水平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2008年把水平提高了一倍，从2000年提高了14倍（!）。第三，1500亿美元贸易额将近为中国外贸额的6-7%，按百分比高于西方最大的国家一、二倍。每年增加的这些数据说明中国虽然远离非洲，它能在短期内，有确定的和比别人高效地利用非洲大陆的贸易可能性，这自然也给非洲带来不少的好处。

中国在非洲地位的加强和世界大选手-美国、英国等国对自己在地区利益的担心成正比。尽管它们的代表直到最近一直回避对此的评论。然而，2011年六月美国国务卿X. 克林顿访问非洲过程中在赞比亚首都回答记者关于她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的问题时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США）不希望看到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按照她的看法，中国不是值得效仿的榜样，而“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非洲人则有可以学习之处”。我要提到的是，这是在美国和北约违反联合国安理会1973项决议的思想提出武力消灭M. 卡扎菲政权并终于做到的时候说的话（这难道不是殖民主义最极端的表现？）。

克林顿关于“新殖民主义”和“民主”的每一句话后面都有美国（总之是传统的西方）对中国的非洲政策的一揽子批判推理。就拿她的两个要点来说吧，遗憾的是。它们得到了媒体广泛的传播并被看作是最后真理。

神话№1：“中国需要非洲只为了得到便宜石油和自己消费品的市场”。如果看看非洲向中国出口的结构，据2010年资料，75%（五百亿美元）是矿物原料。其中四百亿美元是石油（将近60%的进口额），其他一百亿是铁矿、锰矿、铬和铜。从绝对数字看来的确很大。可是和那些制造上述神话的国家的数字相比，图景就完全改变了。例如，按最有代表性的非洲石油出口数据，加拿大从非洲进口的石油点总进口量的78%，美国-74%（总数为650亿美元，超过中国60%）希腊和葡萄牙-66%，最后，中国仅60%。巴西、奥地利和澳大利亚也处于同样水平。由此可见，加拿大和美国比中国更希望从非洲进口石油。

再看看神话的第二部分-关于“日用品”的说法。从中国向非洲出口（2010年为600亿美元）的图表中可以一眼看出这毫无根据。纺织工业产品略超过总出口的3%（和1990年代中期关系黎明时期主要的这种出口不同）。第一位是交通工具（轮船、汽车、摩托车）-25%，第三是电器和通讯设备（10%），纺织品和农产品-各为3%。剩下的20-25%是服务出口，武器-将近1%，后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公开的统计数字中都被忽略。

这样，如果实话实说，自然，这里指的不是什么特别的“新殖民主义”，而且不仅是中国，而且非洲国家都根据本身战略利益而进行的正常的互利贸易。看来值得提到能够消散上述神话的中非合作的其他方面。

中国按发展较差的非洲国家的请求开放了市场，对全部26个非洲国家向中国运入的四千多种产品取消了全部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措施，2010年非洲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33%，达到255亿美元。（将近中国进口额的20%）。

与此同时，值得承认，尽管中国和非洲贸易总体具有平衡性质，2010年中国出口对非洲进口的比例为46%对54%，某些国家对华贸易有严重的入超。例如，东非的“火车头”肯尼亚从中国的进口比向中国的出口多十九倍。这和肯尼亚的主要收入来自服务行业的经济结构有关，而农业产品（茶叶、咖啡、鲜花）在欧洲、北美、印度经常有很高的需求。实际上肯尼亚和中国的所有谈判中都重申了这个问题，但没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决办法。

投资合作有了新的活跃。例如，2010年中国对非洲大陆的直接投资增加了50%，达到21亿美元，占外国总投资额的将近4%。比重不大，这说明中国没有能和美国、日本和西欧跨国公司活动的周转和规模相比的公司。然而中国总的投资额达到了147亿美元（2011年）。过半投资集中在南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安哥拉。

在这个名单中南非和肯尼亚的出现有代表意义，中国人在那里投资（在头一个国家较少，而在第二个很大）发展先进部门—信息工艺、电信。尽管对中国这是新部门，它的行动相当稳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ZTE积极参加南非中部和肯尼亚铺设互联网光纤网络，而2012年在内罗毕开设了中央电视台(CCTV), 总部并对大陆所有国家进行广播（在肯尼亚首都还有新华社中非办事处）。这些国家吸引中国也是因为考虑到中国对这里得到很好发展的银行—金融方面的巨大投资可能性，

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利用了它在1980—1990年建立“经济特区”的独特经验并在非洲土地上试行。2007—2009年按照和地方政权的协议在尼日利亚（两个）、埃及、赞比亚、埃塞俄比亚与毛

里求斯建立了这种“区”。它们在中国投资的基础上，依靠特别的海关条件和简化的商务手续应该不仅成为推行中国经济利益的中心，而且成为非洲工业化和高工艺发展的加速器。此外，它们的地理位置使有可能通向最近几年大力推动了自己的一体化的大陆相应地区的各个集团国家（尼日利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毛里求斯和赞比亚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 埃及埃塞俄比亚 - 东南非共同市场。2011年十一月中国还和东非共同体（EAC）签订了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的框架协议。

2009年可能成为中国国内最大商业平台的义乌（浙江省）开设有非洲大陆23个国家公司办事处的非洲展览中心，这是方便非洲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事件。此外，上海2010世博会组织者为建设全非洲展览馆花费了十亿美元，二千多万人参观了该馆。

非洲国家政权越来越常挑选中国作为得到优惠贷款的泉源。中国国家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是任何伙伴都无能与之竞争的。2010-2011年仅这个银行就给非洲提供了672亿美元的贷款。例如，最后一次拨出的6亿1千2百万美元是供埃塞俄比亚建设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的。下面数字说明这方面协作的水平：中国对外的贷款将近一半给了非洲国家。

投标成了扩大中国在非洲存在的高效办法。列举中国人中标例子没有意义，因为中标数量数以百计。在非洲工作的二千中国公司就说明了问题。不过，看来值得指出：中标并非一定表明方案最佳或最便宜。有时为此采取法律上可疑的机制，利用国家资力，勾结不诚实的政治家和实业家。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这种不

良的行为严重损害许多非洲国家本来已不稳定的发展。可是，说这是某个具体国家代表的本质是不对的：2010-2011年在非洲国家揭露了有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介入的舞弊。

人文合作方面的发展是新现象。仅2011年非洲和中国就举行了不少于十个不同课题的联合会议。三月份在内罗毕（肯尼亚）举了关于科研方面合作问题的科学讨论会，它成了2010年在北京举的类似会议的继续；五月份在温得和克（纳米比亚）举了青年领袖会议；八月份又在内罗毕举行了非政府组织论坛；十月份在中国杭州举行了首次中非“智囊团”（think tank）代表大会，它应成为就发展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问题交换意见的平台；在海南疗养地瓦宁举行了合作和交流地方管理经验会议（十一月份）。

在教育方面，中国承诺为将近五千五百个非洲人提供了国家奖学金。孔子学院在21个非洲国家工作着。

2010年中国在技术合作方面为非洲无偿建设了14个教育机构和11个医疗机构、8个农业综合体、5个会议中心、一个运动场、供水和电信方面各二个设施、动力和公共事业方面各一个设施。一千五百中国专家为培训6千非洲人来到了非洲。

2011年中国为蒙受空前旱灾的非洲角国家提供的援助达到了令人注目的数目-将近8千6百万美元，不过，这暂时还次于最大的资助者。

上述资料总体表明了中国在经贸关系上的重大成就。它基于找到和利用大陆可能性的能力，不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非洲伙伴的利益，并且利用创新作为最有前途的合作方向之一。看来，硬说中国政策中有“新殖民主义”迹象，纯粹是别有用心，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神话№2：“中国支持非洲“极权”政权并利用自己的强大力量作为对政权施压的手段以满足自己经济需要”。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非洲政策的基础原则。这种原则不仅中国高级代表常提到它（顺便提提，最后一次是在今年一月中国代表团访问非盟时），而且总的来说言行一致。用不着去寻找久远的例子。不久前赞比亚总统选举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发展取决于和中国的关系的国家（赞比亚主要的出口产品—铜的三分之一运往亚洲的这个国家），素以对中国人的不赞言辞称著的候选人能够获胜。

暂时避开这个话题，可以说，在这个国家，大量中国工人、工程师，其他专家（据不同的评价为4万到8万）主要工作在“铜带”上，他们和赞比亚人的关系的确欠佳。从赞比亚时不时传来关于中国顾主们和当地工人们冲突的报导（例如，2010年的劳动冲突时有十三个矿工死亡）。不同的文化习惯、当地居民觉得中国人占去了他们的工作位置，中国一些公司不遵循劳动法情况都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并非群众性现象，大部份关系还不错，中国本来还应注意两个重点任务：为非洲人创造工作位置，为之开设“社会电梯”，使那些埋怨中国人在所有阶梯都只用“自己的”公司的当地公司有可能作为分包商参加自己的计划。

某些西方分析家过早地声称M. 萨塔将在2011年九月赞比亚总统选举中取胜，并把它看作是“中国的失败”。可是，M. 萨塔就职宣誓后会见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代表中国领袖胡锦涛祝贺了他的中国驻该国大使。赞比亚总统对中国代表谈到了改善中国企业里的工作环境的希望，并且得到了许诺：中国人将努力接受此前的确有过的错误的“教训”。

西方一再批评中国对苏丹奥马尔-巴希尔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的“极权”政权的态度。可是从国际法观点看来，这种批评毫无根据。值得提到的是，不管是联合国还是非盟，都没有采取限制和这些国家合作的任何制裁或其他决议。至于国际法庭(M Y C)对苏丹总统的逮捕令，中国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因而没有义务遵循它。何况非洲各国和非盟都在不同水平上要求推迟这个只会使苏丹局势更加混乱的逮捕令生效。

2011年七月建立得到苏丹3/4石油产地的南苏丹之后，中国协助调解朱巴和喀土穆之间划分石油出口收入和石油转运价格的争议。2011年十二月 为此目的任命了中国特使。购买南苏丹和苏丹共和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石油70%的中国，自然对两国领导有相应的影响，这可以用于达到和平调解。

北非“阿拉伯之春”事件证明中国是不干涉内政和非洲冲突的“由非洲解决”原则的坚决拥护者。尽管和L. 格巴格巴为首的科特迪瓦前领导有广泛联系，中国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决定承认了另一个候选人A. 亚塔雷在总统选举中取胜。中国在突尼斯和埃及新力量取得政权后立即与它们建立联系，而且为之提供必要帮助。

在利比亚危机最初阶段中国同样是按非洲（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成员国-南非、尼日利亚、加蓬投了赞成票）和阿拉伯国家的意见，没有阻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1973项决议。可是当北约开始远远超越可容许行动时，中国和非盟一样，不止一次提醒对此事实的注意，要求停止来自任何方面的暴力，举行M. 卡扎菲和起义者之间的包容性对话。中国只是在2011年九月中旬全国过渡委员会力量取得胜利后承认它为利比亚的合法政权。

由于中国政权的高度积极性，政治水平的合作也取得进展。中国外长杨洁篪、党和政府代表一年数次访问非洲国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止一次）和总理温家宝也到过那里。而且，如果过去中国代表团主要访问的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伙伴，现在实际上是按“部门”原则访问。例如，由于中国大规模建设核电站，铀燃料保障成了严重问题。为防止今后可能的短缺，2012年一月杨洁篪访问了纳米比亚、科特迪瓦和尼日尔，协商向中国扩大供应铀矿的问题。双方越来越常在联合国就相互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协商。

非洲的东方趋向(Look East)也成了常用词汇，它意味着非洲许多国家希望自己的关系多元化，减少前殖民国家和美国对自己内外事务的影响。从这一观点看来，中国是理想的伙伴，它很少对与之打交道国家的内政感兴趣。和中国的关系成为必要是可以对西方国家表示异见的保障。非洲领袖们以令人羡慕的频率参加中国组织的活动，访问北京，在那里一定受到热情接待。不过，看来还不能过高估计中国总体对政治上层和当地居民情绪的影响，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西方文化传统，相应地，它们的载体的影响还相当大。

从2000年开始每三年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的“中国-非洲”论坛是方便的对话平台。非洲方面参加的通常是不低于总理或总统级别的代表，中国参加的是最高领导人。中国利用每一次论坛来宣布自己打算在非洲大陆实行的新的大规模计划。例如，不久前宣布：中国上次在沙姆沙伊赫论坛关于拨款十亿美元帮助非洲小型企业的承诺已履行2/3以上。下次，即第五次“中国-非洲”论坛将在今年底于北京举行。

很少关于中国和非洲在军事工业综合体方面合作的信息，尽管中国的确过去和现在都向非洲一些国家供应武器（苏丹、津巴韦、赞比亚、肯尼亚、加纳等国）。2011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了塞舌尔群岛、加纳和乌干达。他在坎帕拉许诺为东盟在索马里维和使团的乌干达部队(AMISOM)提供技术帮助。2011年十二月中旬媒体“跟踪访问”报导了关于中国的塞舌尔政府议定在那里建设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消息。可是中国很快地否定了这种报导，声称中国没有此种计划，只可能在塞舌尔为参加在印度洋这个部分的反海盗斗争的中国军舰建设“供给基地”。与此同时，中国的希望很明显-保障紧张的中非贸易在这个地区的海路安全。

分析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使人不可能同意南非专家Я. 捷洛尔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和非洲没有统一的政策”，只有“部分矛盾的行动和可能与中国官方政策吻合或不吻合的影响的混合物”。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成就只可能依靠发展政治联系和确立由大型援助计划与投资项目支持的国家领导水平协议来达到。很明显，在中国和非洲“低调”建立关系的1990年代，中国国家 and 科研机关在不同水平上认真细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这种工作至今在继续。创建越来越多和非洲大陆协作新方式，旨在吸引非洲广泛社会阶层和人士参加合作。中国希望它和非洲关系超前发展，符合时代要求。即便中国发展在最近几年稍为减慢，许多专家认为它和非洲关系前景仍不会次于今天。

我想，我国对中非关系经验也不无兴趣。最近一年表明俄罗斯和非洲对国际基本问题的立场十分接近。我国积极支持非盟关于无暴力调解使非洲角局势激化的利比亚危机的努力。俄罗斯的

原则观点是承认非洲人能在无外来干涉条件下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些非洲国家支持我们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

这样，谈到中国经验，可以说，我们有良好基础，可以和非洲发展多方关系，在关系各方面-从贸易到人文的各个方面取得突破。

2000年代俄罗斯在非洲大陆的地位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可是今天的合作程度毕竟还不符合潜力。尽管最近十年俄罗斯将近有十个大投资公司进入了非洲市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铝业公司”，“阿尔罗萨公司”，“雷诺瓦”，“卢克石油公司”，“诺里尔斯克镍业”等等），贸易额从2002年到2008年增加了二倍多（从25亿到75亿美元），危机时期表明我们的联系还很不牢固：2008-2010年的贸易额减少了三分之一，只是不久前才扭转了不良局势。然而俄罗斯在非洲的贸易额还很小-不超过1，5%。

考虑到其他国家的肯定行动，值得就此计划组织不同平台，对双方合作迫切问题交换经验，积极吸引俄罗斯和非洲实业界参加它们的工作，增进俄罗斯结构对非洲国家贸易和投资可能性的了解（例如，关于招标的信息）。可以说，2011年十二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俄罗斯-非洲”实业论坛已在这方面安置了第一块奠基石。

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帮助非洲发展。但愿侈谈已久的建立相应的“局”的计划终将在今年实现。众所周知，中国和其他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早已得到了百倍的回报。

展望未来，在国家水平上周期性性地公布关于最近几年我国和这些地区关系发展基本方向的更新的文件对我国在非洲的政策将

有很大帮助。其他国家的实践表明，精心编写的这种文件能吸引广泛政界和社会界对非洲问题的注意，为总的合作定调，成为衡量已做到和有待做到的工作的尺度，这对伙伴们还是我们的打算的严肃性的信号。

俄罗斯把非洲国家看作是自然伙伴，而有一些是盟友，因此我们对它们问题的注意，在国际事务中支持或帮助它们的愿望将伙随着互利经贸、技术、科学-人文、教育和文化联系的发展，有利于和我国合作的舆论的形成。





亚历山大·福缅科

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
国家杜马IV届议员

[alexanderfomenko@
inbox.ru](mailto:alexanderfomenko@inbox.ru)

我们的前景： 欧亚对外政策结构

很明显，俄罗斯外交政策不是按各种良好的愿望，而是按客观因素-地理和历史因素决定。甚至拿破仑都曾承认国家的政治领导能改变一切-除了地理。然而国家领导对历史也没有权力：上世纪我们外交政策从零开始的两次尝试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严格地说，按照地理现实，俄罗斯是东欧和北亚之和。因此，经济和政治关系，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日本、越南、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亚洲内部的关系，同样地，我们和德国或意大利的关系是欧洲内部关系。

因此，俄罗斯对外政策不可能有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它太大也太丰富了，不能

有无条件的外交的重点。对于俄罗斯，它和海关联盟成员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苏联后的其他国家的联系，还有和欧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同样重要，因为我们和欧盟、美国与大陆中国接壤。对于我们，和所有这些不同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边境关系。

我们经常和全世界打交道，考虑这个世界不断复杂化的政治文明极其重要。特别是我们西方伙伴政治文明的复杂性。自由-民主制度素有的相当复杂的，非直线的外交立场制订方法要求我们相应的反应。不能把西方某些阶层代表公开发表或幕后的一些言论当作几乎是政治局的指示，并相应地在对西方关系上像对亚洲的共产主义中国或越南那样行动。

记得“华尔街日报”在安理会对著名的关于利比亚决议投票的前十天发表了纽约理查德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H. 哈斯的文章¹，其中明确阐述为何美国没有必要卷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情况下明显不能达到目的，也没有涉及到美国的切身重要利益。这就是说，在美国政权走廊里显然对入侵利比亚问题没有统一意见，就像在我们政权走廊里那样。因此，俄罗斯不值得担心以后和美国外交对峙，例如，如果俄罗斯代表在2011年三月18日对灾难性的利比亚决议投了反对票。（而且，纽约和华盛顿的相当重要的人物会很满意在美国内部政治游戏中增加了反对自己政敌的王牌）。

今后我们应该放弃对西方国家某些高级官方人士和我国反对派，包括最不调和的和“非系统的”反对派代表的会晤公开表示不满的做法。取代它的应该是和西方的另选的对话-在我国官方士国际访问计划中纳入和著名的西方在野人士会晤的程序。例如，

我们在美国可以和罗恩·保罗及其拥护者，在法国可以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会晤。

为此有一切理由：得到数百万选民支持的该党的领袖马林·雷朋直接反对自己国家加入北约并主张和俄罗斯建立外交联盟。可是至今法国唯一“亲俄罗斯”政党甚至从未被邀请参加我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正式招待会。尽管这些人（而且是欧洲议会成员）要比美国高级人士在莫斯科不耻与之交际的纳瓦尔内伊重要得多。

将来俄罗斯政权代表和欧洲与美国的反对派人士的计划的和经常的直接接触将清楚表明俄罗斯对西方外交的多方向性和按照自由-民主政治规则行动的意愿。

顺便提提，如果俄罗斯执行政权代表有时不便向自己的西方同行表明和他们的较激烈的批评者的工作关系，那么，联邦委员会两院的议员可以经常进行类似的“另选的对话”。

不难理解，最近几年西方在世界竞争斗争中将越来越扩大利用“更改”这些或那些国家政权结构格式的革命方法，以达到在那里实行各种“外面管理”的方式。因而和它们的这种另选对话十必要。

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已经错过了开始先发致人的宣传运动的时机，即开展“橙色”的和其他“颜色”革命的2000年代中期。

（这种方法早已制定：1986年二月违反宪法剥夺菲律宾总统Φ马科斯政权是首次武力取消选举结果的经验）。

取代我们在2006年注定失败的制止欧洲议会大会通过著名的“关于国际社会谴责极权共产主义制度罪行必要性”的1481项决议的尝试应当是在当时就开始自己的谴责周期性地使鲜血洒染我们

大陆，包括俄罗斯大地的法国、英国、欧洲所有其他革命的罪行的运动。

我们是大国，我们有政治独立、自主的远大前途。正因为这样，俄罗斯可以允许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坦率，不被我们西方伙伴的政治礼节（苏联时代这叫做“思想的一致性”）规则所约束。由于2007年普京慕尼黑的“异见”演讲（幕后效应几乎被比作此前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索尔任尼钦在哈佛大学著名演讲的效应-苏联异见者在演讲后被写入了黑名单），他们至今难以恢复自制。

最近几年俄罗斯可以允许自己从反应外交，即制订对别人的挑战做出某种回应的外交转向采用积极主动的政策，这将迫使伙伴们用某种方式回答我们的挑战。

例如，俄罗斯有一切理由提出解散欧安组的问题，或者自己退出组织。因为在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综合问题中，这个组织现在只讨论人的政治权利问题，即有关人文和文化合作的第三篮子问题。

与此同时，今天俄罗斯-北约委员会已足于讨论欧洲安全问题（即第一篮子的问题），而欧洲内部经济和科技合作问题（第二篮子）的讨论可以在俄罗斯-欧盟委员会和我们与各成员国双边接触过程中进行。

总之，甚至尊重欧洲人权问题也应该在欧委会内部，而不是在欧委会的议会大会讨论-对此无需美国和加拿大直接参加。（两个外洋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还有独联体的亚洲国家作为正式成员正是欧安组不同于欧洲委员会之处）。

俄罗斯和西欧几个世纪和几十年的相互不理解是无可争议的，尽管这又是可悲的历史事实。俄罗斯和欧盟的任何“关于伙伴关

系与合作”的协议，它们的任何“为了现代化的伙伴合作”计划至今都没能克服这种相互的不理解。

可是“战略伙伴关系”状况对于我们，应该比对峙或冷淡自然得多。因为按居民的文化偏向，俄罗斯完全是欧洲国家：甚至出自非欧洲国家的居民，尽管尊重自己文化之根，他们之中谁也不希望保持西藏或者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条件。

而且我国居民的宗教性非但没有消减，还在恢复，涉及到它的所有阶层。在传统的生活与精神价值方面，我们比某些欧盟的成员国-倡始国更有作为欧洲国家的资格。今天它们的世俗化和自由化超过了任何界限。

我们理想的欧洲或者我们关于它的书本知识改变到了不可辨认的程度。意大利多年的财政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书中断言：“欧洲经济的黄金时代”刚来得及开始就结束了²。欧洲大陆的去工业化是医疗事实。出生率危机也同样，这是此种自由-革命启蒙文明的自杀性后果。它在我们面前丧失自己的部分生命力，从而丧失自己的世界意义。实际上此后开始了世界历史，不同于一百年前还被认为是欧洲史的“世界历史”。

法国天主教作家这样确定了欧洲文化-历史世界的独特性-罗马世界：

“作为罗马人意味着把旧的当新的，更新旧的意味着把它种在新土壤里，而移植本身是变旧的为某种原则或者新发展的泉源”³。更新，变旧的为新发展的泉源，再更新和恢复某种传统的经验-并非不顾一切实行的简单的“现代化”。

可是，如果西欧人和英国人的职责和目的是传教和传播文化，俄罗斯事业的意义是保持和保护自己、自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道德本身。

我们的第三罗马向来只是追求保护没有受损的东政教的作用，但从来没有希望得到管理（或共管）今天世界的地位。根本谈不上任何精神（宗教-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的扩张。

历史俄罗斯的只是以自然方式扩展到俄罗斯民族领土之外。不管XIX世纪俄罗斯航海家们在太平洋发现过多少岛屿，彼得堡沙皇从未有过在那里殖民的念头。从来没有占领资源丰富的外国领土的计划-仅XIX世纪末与朝鲜森林特权有关的，并以和日本的战争告终的冒险除外。

在结束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西化-现代化计划之后，苏联的所有领袖都顽强地致力于达到和世界“霸主”的军事技术均势以保障国家的自主存在。

甚至斯大林元帅也完全满足于在“三巨头”的位置，没有追求任何补充的海外扩张。正是由于他对当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实的理解，苏联参加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它正式宣布了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奠定了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的活动基础。

正因为这样，今天俄罗斯政权在对任何今天的和未来的，民主的或不很民主的“霸主”的态度上也那么关切自己主权和自足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当今世界政治的自足不仅取决于经济和军事的可能性，还取决于利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软力量”的能力。

俄罗斯至今没有试图在这个场地认真发挥自己能力：甚至没有关心俄语文化政治空间结构化。尽管在国际交际的其他所有欧洲

语言基础上都已建立了类似的多分支的国际组织。而且俄语和经典的俄罗斯文化毫无疑问正是我国的“软力量”资源。

欧洲在国际关系上利用民族文化软力量的相应的经验相当广泛。例如，德国在几十年来按“德国世界”理论确立自己的外交政策。所有德国人，不管他居住在哪里，国家把他们看作是国外的同胞，按自己的出身随时可以得到德国国籍。这既不妨碍联邦德国从土耳其或南斯拉夫进口劳力，也不妨害国内实行“文化包容”。

俄罗斯官方只是在最近几年承认存在明显的文化政治现实—俄罗斯世界。

尽管所有人早已清楚苏联解体不可能也没有导致按照文化汇聚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人们。国外的几百万不仅是俄罗斯人和东正教教民，而且所有讲俄语，看重俄罗斯或苏联文化历史遗产某部分的人们都把历史俄罗斯（或者苏联）和自己相联在一起。

与此同时，正是20年前开始的我们俄罗斯世界的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集结给了所有老欧洲传统的珍重者希望。因为我们大陆的未来取决于今天能够多快地，多顺利地完成这个集结。

因为我们的前欧洲的文化精英没有来得及弄清我们—俄罗斯、欧洲和美国曾是同一个世界的部分，以中国、印度、日本等“龙”与“虎”为代表的东南亚已走在历史舞台前头。在它们的背景下，我们：莫斯科、柏林和巴黎之间的政治文化（和其他类似的）分歧明显淡薄了，突然之间我们显然都是西方。至少这是按出生在东方—遥远的、中东和近东的人们的观点。

那些认为我们的集结过于拖延者值得回想一下，沙皇亚历山大 II 时代这种集结略超过了 20 年-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第二次集结也是用了 20 多年-从内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由此可见，我们还在计划期限内。

1. *Haass Richard N.* The U.S. Should Keep Out of Libya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 8 March.

2. *Tremonti Giulio.* Paura e speranza. Milano, 2008.

3. 格拉格 P. 欧洲的罗马未来 // 象征. 十二月 1986. №16. С. 79—86 (*Braque, Rémi.* L'avenir romain de l'Europe // *Communio.* IX. 2. № 52. Mars-avril 1984.)





阿尔曼·奥加涅祥

“国际生活”杂志主编

oganesian@interaffairs.ru

缺失的“大国主义”

“今天，最确切的强盛征兆——不在发起战争，而在防止战争的能力”。这是传自曾生活在身负沉重血腥冲突和战争的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于1954年去世的美国作家安·麦考密克的呼声。

遗憾的是，强盛不仅很快以确保互灭的恫吓潜力来衡量，还以一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的地区战争次数来衡量。这种箴言从一个军事学说被搬往另一军事学说。此标准自冷战结束后保留至今。

说实话，还不知道麦考密克女士的标准是否曾在人类史上，如近200年的历史来说见效过？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在欧洲即刻树立的和平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外交界流传的一种说法：未有圣彼得堡的意愿，欧洲任何一门炮无权“发言”。

克里米亚战争终止了宁静和幸福，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的法国和英国忽略了普鲁士的增强。结果，还是那些曾在俄罗斯的特洛伊墙下作战的军事将领遭到“德国佬”的致命性打击。戴高乐往后就法国-普鲁士战争将说，“法国只留下一双用来哭的眼睛”。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增强的俄罗斯，为欧洲返回了和平和安宁——所有欧洲国家首都，尽管无热忱地，但还是被公认的事实。

今天，西方列强在参与地区冲突上示范了极度的活跃性，挑起的冲突此起彼伏..... 这是什么——新的世界划分吗？前不久，在私下的交谈中，一名知名的阿拉伯石油大王指出：“他们想以庇护者的身份返回失落的殖民地”。就那么简单？是否我们已惯于将一切问题复杂化和受政治上的华丽辞藻和高尚姿态的蒙骗？

许多人对“带有人性面孔社会主义”的记忆还犹新，现在又向世界进行“带有人性面孔战争”的传教，忽而

将其称为是“人道主义干预”，忽而又称是“保护的责任”。其中，俄罗斯和中国在冲突方之间扮演消防员和平息者的角色；北约国家则为冲突双方的一方，以公开或隐蔽的支持扮演军事和政治领航员的角色。后者将希望寄托于借公民抗议和武装起义博取政权合法性的反对派一方。对西方来说，今天最为关键的是：热衷者对自己庇护者的感激程度。

在可见的未来不见得有选择扮演何种角色的可能。但俄罗斯和中国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往后怎样？

在维和享有的绝对优先权和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能排除世界上能出现必须动用武力的状况。联合国宪章并不排除武力手段，但同时为动用武力提出的极高门槛标准，使其不再能全面反映现代性冲突积累的“雷雨”般潜力。再说，不以暴力抵抗邪恶，在历史上从未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公设。归根结底，为捍卫巴尔干民族进行的俄-土战争，实质上不就是“人道干预”吗？

与此同时，当某某单一地予以自己对主权国家行使开战权，又单方面宣称其为“人道的”和“责任性的”，这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要摆脱这种局面只有一条路：拟定和通过作为国际法准则对“人道干预”（或任

何其它形式)的定义,排除对其任意地应用和做解释。换言之,必须为所有人确定醒目的,带红色下划线的明确的(其至今还模棱两可)术语框架。

尽管如此,就是达成妥协,它还是不能取代缺失的,负有炮声缄默责任的“大国主义”。





90岁不算年高，“生活”前程远大……

鲍里斯·皮亚德舍夫

特命全权大使，俄罗斯功勋外交工作者，
“国际生活”杂志主编
(1987-2009年) 历史学博士

一切始于1917年的浪漫时刻，当时都认为国际生活的秘密消逝，外交和政治完全公开。而革命的海员尼古拉·马尔金授命为公布前政权签订的秘密条约而出版刊物，并出版了后来称之为“马尔金笔记本”的几个选集。

新知识分子们觉得吸引革命海员参加出版事业对不但继续公布过去的，而且公布现在的外事人民委员会文件是合适的。这样，在1919年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事人民委员消息”，其中公布了人民委员会的照会、其他文件、个别作者的文章。

Борис ПЯДЫШЕВ,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и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осол, заслуженный работ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лужбы России,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журна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7—2009 гг.), докт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90 ЛЕТ — НЕ ВОЗРАСТ. У «ЖИЗНИ» БОЛЬШОЕ БУДУЩЕЕ...

同时从2020年二月开始出版“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事人民委员会通报”，这是外国报刊登载的较重要文章摘要的选集。“消息”每二、三个月出版一次，篇幅为38页，在当时显然是相当大的刊物。“通报”每周出版，共1218页，实际上是关于外国刊物信息的唯一泉源。

1922年三月取代了“消息”和“通报”的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杂志“国际生活”。它的出版周期不定，但主要是每二月一次。发行量从头一年的500册增加到以后年代的二千册。

“国际生活”- 1923年人民委员格奥尔吉 奇切林在它的第一期写道，- “这是是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它应该在自己方面为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总的任务服务”，按他的说法，“在现代政治和经济关系过程中寻找主要的深刻的趋势”。

看来，杂志在1922年出版反映了我们国家当时发展的转折性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年轻共和国卷起了国内的军事共产主义和对外政策的世界革命的旗帜。斗争的呼吁改变为事务合作建议，包括和外国的事务合作。

为了阐述新经济政策时代的新外交政策也需要“国际生活”杂志。名称本身就有新意义，因为对“世界革命时代”较适合的应该是有“团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概念的名称。取代它的是某种非阶级的思想：生活，而且是国际生活，这意味着“不是我们的”，“不是苏维埃的”。

外事人民委员会的聪明的政治家们可能想以类似杂志的出版和它的名称向外国发送出隐蔽的信号：看吧，我们在变，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明天还会变！

“国际生活”这个词以后仍起外交政策密码的作用。只知道它的对象-西方政治学家们是否学会了解读苏联时期的这种密码

按照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市场条件，“国际生活”没有像“外事委员消息”那样分寄给苏联各领导人，而是在当时库兹涅茨克桥的外事委员会大楼按规定的价格销售。

杂志宣布它是在*H. 约尔丹斯基*、*M. 利特维诺夫*、*И. 马伊斯基*、*M. 帕夫洛维奇*、*K. 拉杰克*和*Г. 奇切林*的密切参加下出版的。按字母排列的姓名和笔名使我们不可能确定他们在编辑部的位置。可是知道*Г. 奇切林*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委员，*K. 拉杰克*-共产国际的思想家，*M. 利特维诺夫*-副委员，*H. 约尔丹斯基*、*M. 利特维诺夫*、*И. 马伊斯基*-外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仅有*M. 利特维诺夫*在革命前已是列宁的民主社会党党员，其他都是在1918年加入，不过，此前已和*Г. 普列汉诺夫*接近。

杂志“国际生活”在第一阶段的生活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消亡而枯萎。它的最后一期是在1930年出版的，当时国内充满了“被包围堡垒”的气氛。57岁的奇切林被解除了外事委员职务，取代他的是和他年龄相近，但较温顺的*利特维诺夫·马伊斯基*作为全权代表去了芬兰。

“国际生活”成了高度风险区。不久之后，外事委员会中的很大部分，即前杂志的作者都进了“人民敌人”黑名单。他们的姓名只是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浮现，当时出现了新版的“国际生

活”。再二十年后对他们的纪念用金字母固定在斯莫棱斯克广场高楼大厅金刚石石板上。

在1953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在此后几个月消灭全民痛恨的贝利亚之后，莫斯科领导上层开始积极就怎样和通过什么途径趋向西方的问题展开了斗争。*H.赫鲁晓夫*、*B.莫洛托夫*、*Г.马林科夫*、*H.布尔加宁*、*Л.卡冈诺维奇*等领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都理解到国家需要和外界联系，并且按自己的方式和利用各人可能的手段。

可能性之一，一个完全不大的可能性是出版新质量的外交月刊。这一思想属于当时任苏联外长的*B.莫洛托夫*。他建议取名为“国际生活”。出版英文版之后它相应地成了«International Life»。当时任外长兼主编的*A.葛罗米柯*表示反对：“美国人已有杂志«Life»。让我们叫它«International Affairs»吧”。就这样定了下来。

决定来得艰难，问题不在于文学或财政方面。国库为任何方案敞开大门。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互不相让，虽然都同意“要”，但至于“要多少”，窗口打开多少，没有结论。

1953年九月7日苏联外交部出版科主任*伊利切夫*给外长*B.莫洛托夫*的呈文中说：“苏联没有全面报导外交政策问题的专门杂志”。他提到了1922-1930年外事人民委员会的杂志“国际生活”并且强调“必须出版专门的外交机关的“不应具有官方性质的“非正式刊物”，建议保持原来的名称。

*B.莫洛托夫*重复了出版科的理由，在十月24把自己的呈文递往三个地址：“苏共中央团主席团、*Г.М.马林科夫同志*、*Н.С.赫鲁晓夫同志*”。看来对问题的口头的协商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对杂志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任务：“比官方文件更自由地解释重大国际事件的意义，特别是苏联争取世界和平斗争的意义”。

苏共中央通过了出版的决议，据当时的“新语”，赫鲁晓夫“集中注意了自己的活动”，对此通过了几个决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在1953年十月29日的会议上审议了出版专门的外交非官方杂志“国际生活”的问题（会谈记录编号40，第五条，议事日程）并委托苏联外交部提出“对此问题的最后决议草案”。

*B.莫洛托夫*没有参加会议，代表外交部的是副外长 *B.佐林*，会议由 *布尔加宁* 主持，*M.萨布罗夫*、*A.米高杨*、*M.苏斯洛夫*、*M.彼尔武欣*发了言。

最后决定是在十一月13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的，当时主持会议的是 *B.马林科夫*，*B.莫洛托夫*、*Л.卡冈诺维奇*、*K.沃罗希洛夫*、*Н.赫鲁晓夫*参加了讨论。

当时的苏联外交部成员兼档案管理局局长、科学院通讯院士和二次斯大林历史著作奖金获得者 *B.赫沃斯托夫*被任命为主编。

在关于出版杂志的决议中确定了其双重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地位。这像是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私生子。

一方面（是“父系”还是“母系”的，很难说）从一开始就已十分清楚。还在挑选出版科和外长的文件时就有关于杂志和外交部挂钩的规定，而在十一月13日中央决议中这一思想增加了指令性质：“2. 苏联外交部负责对杂志出版的全面监督”。

和第二“家长”的关系复杂些。寻找了适宜的方案。在出版科的文件中建议“作为全苏工会委员会国际部刊物发行”。部长作了修正：“它可以作为“劳动报”的刊物发行”。苏共中央主席团表现出了创造能力，它写道：“杂志可以作为全苏普及科学政治知识协会的刊物发行。可是这还不是最后的裁定。1954年三月27日苏共中央秘书处确切了它：“国际生活”的发行由全苏普及科学政治知识协会的“知识”出版社负责”。

从中央主席团原则决定过渡到苏共中央秘书处的开辟了杂志出版道路的详细的决议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但这是非常细致的决议。其中不仅确定了编委成员，其中纳入了政治和信息的巨头，而且规定了所有出版问题，甚至拨给了240吨№1印刷纸。编辑部应该由七个科组成，共83个工作者。拨给了9个司机！确定每页稿费为五千卢布（科主任工资为当时物价情况下的三千五百卢布）。现在看来这一切像是神话。只是在外汇方面通过了零决定。

决议的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是莫斯科苏维埃必须拨出500平米的服务场所，拨出的超过了两平米。

第二点是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和国家保密总局必须“无预先检查地向杂志编辑部送交它从外国订购的出版物”。实际上这意味着把检查的职责移交给编辑部。在那务虚严格的时代这种例外导致杂志无需文学总局的批准出版，与此同时百倍增加了编辑部的自我检查职责。部分由于这种原因建立了高级的检查小组，它应负责对任何材料的正确性，准确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

我们有十多份苏共中央“关于出版专门外交非正式杂志“国际生活”问题的文件副本。其中两份是关键性的-1953年十月29日主席团会议记录№40和十一月13日记录№41。两份都是“绝密”，而不是“秘密”。再高一级的应该是«Burn before reading» — “读完之前烧毁”。

十一月13日的会议上决定：

“1. 为了科学家政治报导苏联对外政策问题和当前的国际问题而保障从1954年开始出版名为“国际生活”的月刊。杂志作为全苏普及科学政治知识协会刊物发行”。

2. 苏联外交部负责对杂志出版的总监督”。

1954年年初没能开始出版。“国际生活”的第一期是在八-九月份出版的。它的内容完全符合莫洛托夫的哲学。按今天日林诺夫的说法，文章都是反对美国及其北约伙伴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历史证据的无价的宝库掌握在相当爱护的主人们手里。这里保存着大量有趣的档案文件，包括在1954年八月的第一期“国际生活”编辑部文章的几个方案。

七月30日 *B. 赫沃斯托夫*向 *B. 莫洛托夫*的位置“争取缓和国际紧急局势”的文稿。部长删改了每一页，其中有些划得简直像是战场。一个词句用蓝铅笔划掉，改上别的词，又重新划掉，换上第三个词。后来蓝铅笔主人对自己也不满意，用浓浓的笔划在纸上划满了许多直线、横线、还有圆圈。

也许什么时候会有某个一丝不苟的研究生能够清理铅笔的痕迹并弄清在俄罗斯于和平共处政策方面迈出最初步骤时期部长对“缓和紧急局势”的理解。现在只能提到一个事实：“国际生活”在这种探索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为写作动员了苏联政论界和科学界的最优秀力量。战后最著名的观察家 *Ю. 茹科夫*粉碎了美国的“实力政策”。*Л. 梅尔尼科夫*写了“德国军国主义是对世界的威胁”。其他作者也写了类似的文章。

杂志第二期（1954年十月十二月出版了两期）的编辑部文章是“约瑟夫·维萨里诺维奇·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他逝世将近两年后，大概上层领导不可能没有形成新的观点，但是，看来，即便是当时对个人崇拜的重新评价观点已成熟者，也还没有勇气进行些小的公开修正。

然而，毕竟在“国际生活”的第一期已有了一些新的精神。它比当时的所有报刊都较多，较清晰谈到了和平共处。谈到了合作愿望、裁军的重要性。伟大的俄罗斯历史学家 *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塔尔列*的文章像是光标。以一个历史题材用完美的语言写成的它读起来像是别的时代的文章。*E. 塔尔列*当时几乎没有发表过

文章，容许他进入“国际生活”看来是为了美化刊物，显示新的精神。

从1957年起“国际生活”方向平衡了些。赫鲁晓夫处理莫洛托夫的反党集团及其伙伴之后确立了其政权。外交政策有了较为稳定的基础—趋向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可是，不容许在和美国共同负责世界命运的大国的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退让。此前尼吉塔·谢尔盖耶维奇还被上了一堂外交课，由于自己不负责的善良而严重灼伤了手。他把远东的旅顺港给了中国，把波卡拉港给了芬兰，和奥地利签订了和平条约，没有换取任何东西。在国内政策方面也极不负责，大大咧咧地把自古以来是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交给了乌克兰，至今，在多年之后，这仍然成为两个斯拉夫国家之间冷淡的根源。

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定理，—“轻易赐予是愚蠢，如果不是犯罪”，克里姆林宫领袖们当时和现在都难于掌握。

和平共处、全面裁军，面向东方—从斯大林主义壕沟里爬出的我们的变动的外交政策大路线导致了外交游戏桌边人物的更变。И. 谢季洛夫取代了外长 В. 莫洛托夫的位置。外交公开性、用活的人物代替面具的最初尝试直接和他相联在一起。他甚至穿着浅米色的西装上班，引起了衣冠楚楚、一丝不苟的其他官吏们的强烈反感。

杂志“国际生活”在那种条件下也需要改变。1956年八月25日苏共中央按外交部的建议决定任命 И. 伊利乔夫为新主编。他是赫鲁晓夫意识形态的新星，在自己身上体现了造反

者的，在政治洪流中有开创性的导航员的特点。斯大林时期他在“消息报”和“真理报”当过主编，后来成为苏联外交部出版科主任。

*Л. 伊利乔夫*到来后杂志“国际生活”编辑部增加了有新思想色彩的人物。进入编辑部的有：苏联外交部出版主任 *M. 哈尔拉莫夫*，后来成为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亲近赫鲁晓夫的人，历史学家、科学院士 *茹科夫*；前“红星报”编辑 *H. 塔连斯基*；帝国主义的激烈揭露者、苏共中央国际科副主任 *B. 科里奥诺夫*；杂志在一段时期公布了“国际生活”编辑部成员。*Л. 伊利乔夫*给了杂志“国际生活”新的宣传色彩，成为当时领导和平共处理论的传导者。第一，和平共处不在意识形态中传播，第二，它是阶级斗争的方式。这难于自圆其说。

这时正好是赫鲁晓夫宣布“向多余作斗争”时期。它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建设，但一切都没能幸免。编辑部缩小了，工作人员减少到了50人，裁减了二个科。作者稿费每页减少了一千卢布。

*Л. 伊利乔夫*从编辑部调到了苏共中央担任宣传鼓动科主任，它后来变为意识形态科。1960年他得到了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再过一年成了中央意识形态秘书。

1990年副外长 *Л. 伊利乔夫*又回到了“国际生活”，成为材料“谈谈在外国代表我们的人”的作者，奠定了杂志上关于怎样改善苏联大使馆工作，使苏联外交官工作更加高效的辩论的开端。

不是任何人都能活到将近85岁。这是明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曾爱好哲学，收藏过图画，其中大部份赠给了家乡克拉斯诺达

尔。他对莫斯科“斯巴达克”有炽热的爱，也许他希望从中找到躲避过去忧郁的地方。

我们杂志历史的下一个转折是在1958年。И. 谢皮洛夫成了Н. 赫鲁晓夫反对集团的成员后被定为“他们的追随者”，并被彻底赶出了外交部。而且不管是对В. 莫洛托夫还是对阴险的人物А. 维申斯基，都没有像对И. 谢皮洛夫那样绝对否定。在我们的时代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到过我们编辑部两、三次。这位聪明的达人讲过一瞬间十二次把他从中央开除-从党、工会、科学院等开除的情况，甚至不准在百科全书和外交词典中有他的姓名。

1958年六月苏共中央任命外交部长为“国际生活”主编。新部长远无前任的公开坦率。А. 葛罗米科很传统，总是穿着暗色西装，紧接着整个外交部官员们也到库兹涅茨克桥的从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时代以来就已出名的缝纫店更新自己服装。

А. 葛罗米科开始了他在这个高职位的长期的，二十七年的任职，对杂志主要是遥控管理。从1958年六月期开始编辑部成员和主编姓名又不再在杂志上登载。

“国际生活”的地位及其在编辑政策、作者和文章性质意义上都变得较为确定并可以说是较无风浪。杂志在所有方面都“包装”很好。编辑部拥有最权威的政论家、文学家、科学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许多人难于或者不可能辨认，或者用笔名隐匿。根本不可能有人才缺乏的想法：文化精英们都排队争取这样的条件和钱。

杂志是直截了当的，就像莫斯科-彼得堡的铁路轨道。关于国际和其他问题的文章详细，充满论据，而且绝对正确。稍为偏左或偏右，作者和编辑将一起被宣布犯了政治错误。这里一切应该和外交部文件、政府声明的一样，更不用说党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的文件。

1960到1970年知识分子中有文雅的消遣-猜测文章的潜意。一些聪明的记者令人厌烦地把砖块塞进字列行间，努力把自己叛逆的思想藏入不易理解，只有内行者明白的暗示、寓言、比较之中。另一些，读者则猜想这一切，“挖出”特别困难因而有价值的“真理”。然而，这里也能有能者。例如，惯于故弄虚玄和极其聪明的记者鲍里斯·斯特列尔尼科夫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情况在“消息报”里较经常，仅一个斯塔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就足够了。

这在“国际生活”却从来没有。这里甚至不可能用很隐蔽的方式表达与外交部或政府对事件评论脱节的言论。别争于责怪。这里有自己的好处和价值。归根结底，“国际生活”不是消遣之物，而是有意识地严谨、准确地阐明官方政策的刊物。如果杂志这样登载了，它就是这样。拥有准确的泉源对自己的和别国的政治家、专家、科学家等都是有益的事情。

在可能的狭窄和范围内，如下著名的作者在政论方面为杂志创作了出色的作品：*C.别格洛夫*、*O.瓦西里耶夫*、*C.维什尼耶夫斯基*、*A.沃尔斯基*、*B.佐林*、*C.济科夫*、*Г.格拉西莫夫*、*O.伊格纳季耶夫*、*B.科尔图诺夫*、*B.库德里亚采夫*、*B.马耶夫斯基*、

B.马特维耶夫、B.米哈伊洛夫、B.涅克拉索夫、E.普里马科夫、B.雷马洛夫、Ф.谢伊福尔-穆留科夫、M.斯图鲁阿、Г.特罗菲缅科。

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成功地在社会科学、外交方面，在社会组织工作的著名的政论家，其中包括A.阿尔祖马年、O.博格莫洛夫、K.布鲁登茨、O.贝科夫、Г.杰博林、A.,叶尔莫连科、H.英诺泽姆采夫、B.伊斯拉埃林、A.尼科诺夫、B.波波夫、И.波捷欣、Ю.拉赫马尼诺夫、Г.罗扎诺夫、T.季莫菲耶夫、C.季赫文斯基、Г.童金、B.特鲁哈诺夫斯基、H.雅科夫列夫、A.雅科夫列夫。

他们之中每一个都可以说是金笔。每一个都在我国新闻发展方面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出现了值得特别提到的以笔名签署的文章。两个笔名—“A.索韦托夫”（商量）“П.戈罗霍夫”类似Ю.特尼亚诺夫的出色发明“中尉基热”。

这是“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的集体笔名。第一个出于生活规则：办事前商量。杂志正是这样和内部集体，上级领导商议，然后写文章，相应地署名“A.索韦托夫”。

第二个笔名对编辑部更有限。它只是转达地址：戈罗霍夫斯基小巷—“П.戈罗霍夫”。不愿意或者不想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在杂志上，或者希望依靠这种果断风格使自己的文章显得更有份量的一个或二、三个职业记者、编辑使用这个笔名。使用了这种笔名的有：Ш.萨纳科耶夫、H.卡普琴科、Л.维佳索娃、

H.霍穆托夫、T.伊耶夫列娃、B.彼特便先科、O.纳克罗京、T.科列斯尼科夫。

历史不记得这些笔名的创造者，可是，我们不能不给予新闻界向来存在的幽默感以应有的评价。

据说 A. 葛罗米科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除了外长之外还兼任了18个不同的职位。他马上辞去了17个职位，但请求保留其“国际生活”主编的职位。

1985年Э.谢瓦尔德纳泽来到斯莫棱斯克广场后，安德烈·葛罗米科在本杂志还留任了两年。

Э.谢瓦尔德纳泽说，安德烈·葛罗米科很难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主编。

M.戈尔巴乔夫赞同这种想法。决定请求葛罗米科集中精力做主席工作，减少一些负荷，建议新人担任腾出的主编职位并且使之成为外交部委员会成员。

A.H.雅科夫列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谈了这个问题，后者原则上同意了。他珍重杂志，毕竟一生的大部份时间都和它相联在一起。他不想离去。过了一段时间 Э.谢瓦尔德纳泽报道：“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再次和葛罗米柯谈了话，他又表示同意，但又没有书面声明”。

经过第三次交谈后老人终于被“压服”了。再没有等待书面辞职，按他口头的请求解除了他的主编职务。

在XX世纪的外交家中 A. 葛罗米科独一无二。他没有使“国际生活”成为超级明星，但也没有损害。他使之成为基础性的、

权威的刊物，许多人已习惯于它，看到它公布的材料的好处，离不了它。

1987年九月初我从休假返回了莫斯科。那是星期天。部长高级助理给我家里打了电话，说Э.谢瓦尔德纳泽叫我去。我确信是为了去参加起草讲稿或者文件，我常从事这些工作。

可是部长说了别的事情。Э.谢瓦尔德纳泽说：A.葛罗米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却仍是“国际生活”杂志主编。他很难兼任两职。“主要的是要激励杂志的新生命，使它更符合现代政治任务”。

Э.谢瓦尔德纳泽说，他和M.戈尔巴乔夫谈过这问题，他已同意。他们议定请求A.葛罗米科集中办理主席团主席的事务，减少一些负荷，建议B.皮亚德舍夫担任腾出的主编职位并使他成为外交部委员会成员。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说他知道皮亚德舍夫，认为人选适合。

几个月后，A.葛罗米科细致地结束了在杂志的事务。和他进行了又一次谈话。与此同时，我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然后到华盛顿筹备M.戈尔巴乔夫定于1987年十一月进行的正式访问。很快地先头飞机载来了苏联政界、文化界、经济界的权威代表们。我看到头一个进入大厅的是E.普里马科夫。“鲍里斯，你好。起飞前看到了关于葛罗米科和你的决议。祝贺你“国际生活”。

苏共中央秘书处会议记录的日期是1987年十一月16日。

这样，我成了杂志的第四个主编。

1990年代初开始的大震荡日子里有了许多改变。不过，说“许多”，是说得太少了些。已是另外的国家，对生活-我们祖国的边界内生活，边界外的国际生活也已有另外的观点。

全苏“知识”协会在1992年连同苏联一起解体了，出现了某些试图宣布自己是法定继承者的结构。不过，那是徒劳。但仍然有两个出版者：外交部和“国际生活”杂志。

我们为自己确立了编辑方针。我们写一切，因为国内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和外交有直接关系或者相反。一定传播总统、政府和外交部对世界问题和奉行双边关系的方针。但不在这里画句号。我们登载对国际问题有不同观点的文章。提出和官方政策不同的行动。批评么，-是的，当然，没有贬责。如果绕圈儿捉自己的影子，外交不会成功。

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文章。参加编辑部辩论的有不同观点的人，只需要他们对政治内行并且负责。

命运使“国际生活”参加了解放出版、广播、电视，所有现在联合在“媒体”这个词的一切的努力。

1989年四-五月在赫尔辛基决议的范围内于伦敦举行了旨在讨论新闻方面主要问题的大型论坛。35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团来到了英国首都。

“国际生活”杂志主编被任命为苏联代表团团长。这是强大的代表团。副团长是出色的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科主任，刚开始在“国际生活”工作的A.列别杰夫。另一个副团长自然是“旁边的”同志。代表团中的塔斯社、新闻社、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

辩论的结果构成了一揽子建议-几乎有70个文件。回到莫斯科向部长作了汇报，后者对工作表谢。几天后成立了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向它汇报了伦敦论坛的结果。

1989年年底通过了部长会议的决议“关于新闻方面补充措施”。值得回忆取得了什么成果。

允许：

- 扩大在苏联出售的外国期刊种类和自由销售网；
 - 组织用自己的外汇订购外国出版物；
 - 保障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文化信息中心免费阅读外国期刊；
 - 起草关于安装接收外国卫星广播节目的天线的秩序的建议；
- 还有-注意！-允许使用复印技术的条款（呜啦！-复印胜利了）。

出现了新闻方面空前的突破。可是，没有幻想。新闻界仍然是无能和不负责政权的人质。谈到这些只是为了向今天的读者说明我国新闻方面曾经处于什么样的条件下。进一步，退二步。但毕竟推动了。

运动本应是旷日持久的，如果不是1991年八月事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来的三人在别洛韦日森林通过结束苏联决议的事件。在切割了的，宣布为伟大强国的法定继承者的国家新闻局势急剧改变了。可是几年后才知道，那么多的自由和它们的那种性质，开始使人呛鼻噎喉。

以前的不自由的报刊去了，新来的却依赖控制着报刊、电台电视以及其他新闻事业的寡头、大亨。“国际生活”和俄罗斯外交

部密切连接。不仅恰当地把杂志作为媒体登记了章程，外交部对杂志承负了各方面的一定的义务。

相互联系深入了。部的领导和工作者对“国际生活”有稳定的兴趣。任何一期的杂志上都有从部长到参赞的外交部和大使馆的作者的的文章。这种情况使杂志成为独特的刊物，关于俄罗斯外交行动和打算的真正实质的第一信息泉源。

最近的二十年“国际生活”是在六个，形式上是七个外长的领导下度过的：*爱德华·谢瓦尔纳泽*、*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鲍里斯·潘金*，然后又是*爱德华·谢瓦尔纳泽*、*安德烈·科济廖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伊戈尔·伊万诺夫*。

从2004年三月9日起俄罗斯外交部由*谢尔盖·拉夫罗夫*领导。

这些是在不同的国内政治条件下，适应外国对俄罗斯态度情况下工作过的有天才和自己特点的著名人物。除了别的外，他们有共同之点-都十分关心杂志，都十分理解这个刊物能在共同的努力中起有益的作用。我们相信，所有外交工作者都有这种态度。

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外长都参加了确定编辑政策的杂志委员会。我们感谢科学院士和部长*E. 普里马科夫*，他当年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时不仅以自己的智力，而且以自己的磁力把我们引向高处或者高尚之处，使不至于停滞在冷漠的低洼地。

*C.拉夫罗夫*一向和我们在一起，现在他作为外长，为我们提供最大的协助。

我们很高兴关切杂志的文化部长*阿夫杰耶夫*参加委员会。

*И.伊万诺夫*在担任部长时为杂志做了很多工作。

总之，按委员会的结构，它显然是对外政策方面的高水平职业家的权威集锦

“国际生活”依靠来自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帮助和协助，成为我国头一个会见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杂志。

和其他的，已经不是美国总统的会晤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1989年十一月主编飞往喀布尔和阿富汗领导人纳吉布拉会晤。那是受到了外长的委托。

在“沙漠风暴”将到的条件下“国际生活”的可能性也得到了利用。当时俄罗斯实行了积极的外交。

产生了再次和阿拉伯世界有影响的约旦国王谈谈防止美国对伊拉克打击可能性的想法。国王和巴格达领导人有自己的关系。如果我们的情绪能通过这条渠道使巴格达了解，这并非多余。访问安曼的使命落在“国际生活”主编肩上。

在新的1993年前夕，俄罗斯副外长C.拉夫罗夫和“国际生活”杂志在外交部于斯皮里多诺夫卡举行了西西伯利亚行政首脑、石油工业家们与外交人员以及媒体的招待会-会晤。原因是“国际生活”的专刊-“西伯利亚石油在俄罗斯和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出版。

这开辟了一系列的类似活动，其中应该指出有总统B什特罗夫参加的雅库梯活动，在卡累得亚、罗斯托夫州和其他地区的活动。

世界社会的许多努力由于新的挑战 and 威胁而贬值。2001年九月十一日的“9·11”事件就是黑暗的象征，当时恐怖分子们以骇人

听闻的残暴和协调打击了纽约世贸中心的摩天楼和破坏了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坚固楼房。

这个悲剧几天后“国际生活”在首都华盛顿的“国王”大酒店举行了会晤，汇集了美国议员们、政府活动家们、学术界代表们。俄罗斯外长*И. 伊万诺夫*、*A. 赫格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约. 什列辛杰尔*和其他著名人士。颁发了“国际生活”的获奖者奖状。主编对与会者说：“我们像你们现在那样地说：“邪恶应受到惩罚”。

从1989年开始出现“国际生活”杂志的获奖者，他们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界的特别注意。其中有广泛闻名的人士，例如，*雅克·德洛尔*，*傅军*，*卡罗琳-肯尼迪*，*Tadzio 森*，*约翰·科鲁兹*，*吉多·德马尔科*，我国的获奖者中有*M. 沙特罗夫*、*A. 多勃雷宁*、*E. 科约金*、*A. 科济廖夫*、*П. 兹列洛夫*、*Н. 纳罗奇尼茨卡娅*、*A. 别斯梅尔特内赫*、*И. 雅宁*、*П. 彼特罗夫斯基*、*И. 哈列文斯基*、*C. 拉夫罗夫*以及其他国务活动家与政论家。

然而没有获奖的作者中也有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面目的出色人物。其中有*布特罗斯·加利*、*布鲁诺·克拉伊斯基*、*布鲁诺·克拉伊斯基*、*Г.-Д. 根舍尔*、*马丁·阿赫季萨里*、*阿尔吉尔达斯·布拉扎斯卡斯*。

我必须回想一下自己几个多年在“国际生活”编辑部工作的同行。

首先是女性。*T. 伊耶夫列娃*，很好的观察家，战争年代曾在外交部人民委员会工作，例如，1943年在刚刚赶走了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作为翻译伴随了驻外交部出版科的一批记者。

H. 霍姆托夫，奇异的老一辈，发现他和加米尔顿勋爵有亲缘关系。尼古拉·尤里耶维奇应邀去了英国，在那里受到了家族后代的热情接待。在“国际生活”发表了精彩的文章“勋爵加米尔顿去过您处吗？”

观察家麦克恩是曾在“牛津五人”集团中为苏联工作的传奇式的苏联侦察员。

E. 萨莫捷伊金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和最爱，在经过命运颠簸和在澳大利亚担任过大使之后也在我们这里工作过。

一句话，不少同行曾在编辑部里长期工作，而且绝大部分都很满意。

对今天的编辑部也有同样的评价。.

与此同时，我担任“国际生活”主编的22年过去了。杂志有了变化，编辑部由经验丰富的记者和富有魄力的A. 奥加涅祥领导，新的目的光看得更锐利。

“国际生活”的“黄金宝典”成了莫斯科政界美好的新事物。在这个系列中第一个进行了演讲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克罗地亚总统斯捷潘·梅西奇、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工发组织总干事坎德K. 延克拉、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部长M. 梅德西、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家联盟理事会主席IO. 沙夫拉尼克都参加了计划。俄罗斯外长C. B. 拉夫罗夫在杂志五十周年庆祝“黄金宝

典”周年时发表了“关于现代外交对象和方法”的演讲。接着世界上的其他领袖们也发表了同样内容充实的演讲。

今天编辑部就像某种媒体控股，遵循时代的召唤，用最新的信息工艺武装自己。杂志不仅用俄语，而且用英语、汉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以精装本出版。“国际生活”参加反对歪曲历史的斗争纲领，每年出版总称“无删节的历史”的选集。关于现代国际政治的较迫切问题的专刊也毫无疑问地引起兴趣。

对世界事件立即做出反应的在线杂志网站适应广泛网友的需求。关于迫切的国际政治的录像视频节目完全能与电视政论节目竞争。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新方程？

阿尔缅·奥加涅祥，“国际生活”杂志主编：

科学技术的突破、世界碳氢化合物开采的主要地区之一——近东和北非激烈的政治事件会导致世界能源、世界能源供应和世界能源资源贸易方面的危险和戏剧性的变化。因此这里聚集了主要的专家以讨论新地缘政治条件下世界能源发展趋势。

赞同和反对

我想听到关于人类离新的能源革命边缘有多远、围绕我们的“碳氢化合物文明”的政治和工艺发展极限在哪里的意见。为了理解发生的进程，重要的是阐明全球选手的对比：看看是否出现了新的联盟，或者仍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游戏。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弄清在短期和中期未来世界能源资源市场价格形成的因素。

我们在报刊上经常看到已经固定的外号“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这句话背后的是什么，在能源方面“超级大国”概念对俄罗斯意义何在？俄罗斯能否在可展望的未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为了得到相应资源，我国在国际舞台和国内面临哪些任务？

亚历山大·戈尔班，俄罗斯外交部经济合作署主任：

如果以前能源信息令人想起“田野新闻”，现在它更像“战斗消息”。这首先涉及到“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欧盟范围内已对它进行将近一年的侦查并收取文件。尽管这是文明途径的事件，但“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还是感到了来自欧盟的相当强大的压力。

我们领导人和专家社会都对此事件作了评价。这种检查的目的何在呢？这首先是旨在改变“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价格政策的压力机制。这种局势迟早会“消除”，尽管将来它仍会继续对我们在欧盟的能源操作者活动起相当严重的影响。不能排除在世界其他地区会有类似进程。

“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始认识到价格政策应该更灵活。因为存在选择：或者依靠贸易得到更多物质收入，或者保持市场。今天我们看到新的，相当强大的选手出现，例如卡塔尔和澳大利

亚，它们已经开始闯入能源出口者之列。将来美国也可能依靠自己的资源全部覆盖自己的市场并进入外国市场。这导致完全不同水平的竞争。遗憾的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还不习惯于在这种竞争环境中工作，但毕竟已开始适应。

今年能源方面哪些事件上值得注意呢？依我的看法，是俄罗斯外交部最近十五年来力争的俄罗斯总统下属能源政策委员会的建立。遗憾的是，虽然建议是外交部提出的，没有邀请外交部参加。尽管如此，我想，这个委员会的决定将不是业务性的，而是涉及到我们工作的那些方向。而方向很明确-加强竞争，更灵活的价格政策，我认为这是争夺市场的斗争。

在与会者之中我看到了积极参加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制订的同行们并想向他们提出善意的批评，因为关于我国战略的篇幅为500-600页的计划中，只有三页提到外国市场对我们能源综合体影响的问题。不过，前年的计划中写过，制订我国和我国公司在外国市场政策的单独战略并非多余。遗憾的是，一切就此结束了。说实话，我认为，在这里，世界市场的行情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我丝毫不想贬低我们战略中那些正确地写明我们能源发展方案与情节，指出哪些地区应该首先发展，应该怎样行动的部分。可是，同行们，我们往往忘记：钻探和投资的寻找将取决于外国行情。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在危机持续的条件下，可能出现它的新的需求下跌浪潮。随着诸如页岩气等情况的出现，竞争将激化。这里争夺市场变得更加迫切，而不是争夺今天的利润的斗争。遗憾的是，我国许多公司正是热中于后者。因此，我希望总统下属的专门委员会能采取相应的决定，以修改我国和我国各公司在这方面的政策方针。

简而言之，我想“跑过”那些主要问题。人类是否处于新的能源革命边缘？革命已在进行。今天欧洲家务的能源需求实际上已接近于零。例如，新的工艺使有可能实际上不利用碳氢化合物加热器。所谓“聪明房屋”能依靠地热自给自足。因此，节能趋势可能继续下去。

可是应该指出，最近的未来碳氢化合物仍无可取代。用各种植物燃料代替它的试图在今天失去了迫切意义，由于美国、澳大利亚、我国和欧洲歉收，食品安全计划比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因此，全球选手们认为需要供应人民食品，不让非洲人死于饥荒，此后再考虑生产生物乙醇等到植物燃料。

俄罗斯是不是能源超级大国呢？我不想称俄罗斯为能源超级大国。这是响亮而美好的称号，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坐在碳氢化合物针尖上而且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的这种片面经济很不坚实，应该努力使这种经济再不至于碰到2008年首次碰到的那种危机。现在我们的情况远非美好。要想成为超级大国，至少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至于北极，当然，这是新的竞争场所，我们当然努力争取北极大陆架。可是我认为：什托克曼诺沃产地的历史表明，暂时仍应该较注重动力高效性和对还未纳入北极大陆架的已有产地的高效利用。我认为，这里有工艺，并且在快速发展，但毕竟还是明天的事情。但愿在北极不会有任何战争—既不会有能源战，更不会有“热战”。

尤里·沙尼克，能源战略研究所董事会主席：

我概述几个想法。出现了基于美国能源政策更变的全球变动和页岩气问题。就此俄罗斯一些官员和科学家的立场使我惊奇，似

乎美国在一天内完成了“页岩气革命”。这是有意识的、准确和清楚的进程。过去十年许多科学家已警告了这种变化。

第二，这是欧洲和天然气政策。欧洲像蒸汽列车，不管正确还是错误，一直沿选定的道路前进.....可是，今天不可能在某一个领土上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情况也并不好，因为顽固地不愿看到他们的能源政策的改变，仍然奉行一种出口方针。

现在谈谈世界经济总的形势。石油和天然气足于最近的十年需要。也许某个时刻我们说碳氢化合物开采高峰已过去。但现在说10-20后碳氢化合物储藏量会消失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近东和北非局势。尽管地区局势严重，石油价格不会升高到每桶200、300或400美元。甚至在近东、北非国家，还有伊拉克局势这样紧张，价格方面没有出现特别异常现象。

这是外因。可是，谈到地缘政治新方程，我想特别谈到俄罗斯内部因素。因为谈到地缘政治，首先要问：我们自己应该怎样行动。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中说，俄罗斯机器制造业的进口在2001-2002年按美元核算增加了十三倍。也许作者有些错误，但这些数字后面有能源因素。为什么？因为很明显，我们不能克服对怎样利用财政资源，怎样利用经济机制来和俄罗斯内部原料部门协作的依赖。这里有值得批评我们政策的地方。多年来我国在这方面没有稳定的改变。在个别部门中有，但总的数字却立即引起我们深思。

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际生活”杂志共同举行诸如“石油天然气联盟”等组织和外国使节的会晤（“国际生活”杂志的“黄金

宝典”计划-编者)。这是很有益和适宜的做法。它有助于确定方向。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会晤中听到了消息是：“天然气工业公司”打算在美国建立俄罗斯天然气接收的终点站。制定了这种供应的计划。甚至开始取代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天然气供应。不过，由于“页岩气革命”结果，供应已不需要。甚至斯托克曼的天然气的“悬浮”并非仅由于工艺问题，更主要是未清楚向何方供应。我们应该有长远考虑和计划，理解今天世界能源中什么是主要的趋势和道路，我们会碰到何种地缘政治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有些人诡谲地提出问题：美国是否会再次阴谋降低碳氢化合物的价格？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可能。至于美国能得到什么好处，那是另一回事。有些工业家、金融家和政治家显然希望低价，而另一些却相反。美国通常不投资，因而任何页岩气、任何工艺都承受不了低价。因此，在现有的情况下，每桶110-120美元的油价对美国和对世界各地都是完全高效和可以接受的价格。我们认为可以谈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在近期的稳定，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俄罗斯和境外地缘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如何呢？很大程度上答案在于俄罗斯有无对外投资计划和俄罗斯投资的积极性。暂时俄罗斯能源计划的投资吸引力极低。国家依靠自己的影响使“天然气工业公司”、“诺瓦铁克”、“俄罗斯石油公司”有可能实行大型计划。可是没有总的积极趋势。国内税率和价格提高造成社会问题。因此，“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国内效率至少应该成倍提高。俄罗斯国内价格和税率的降低只能依靠对小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者的大量投资计划来达到。

暂时是外国市场在价格上“支撑”我们。我们对此早已说过。在座的也写过。甚至没有油价的下跌二、三年后也将会困难。考虑到地缘政治背景不佳，我们必须解决国内的能源问题。

尤里·马尔谢夫，国家B. И. 韦尔纳德斯基地质博物馆馆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两年前媒体出现的关于页岩气的信息引起了注意。不是这方面专家的我和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H. И. 拉韦罗夫，其他院士进行了交谈并得了关于新工艺快速发展的回答。当时我打电话问了俄罗斯天然气协会主席B. A. 雅泽夫关于研究页岩气开采工艺的情况。这对他却是新闻，我们因而组织了对此问题的“圆桌会议”。当时动力部说：“您们现不要举行，我们还没有准备……”

显然，拥有巨大的分析机构的潜力的俄罗斯在原则上错过了页岩气开采工艺的研究。应该说，在“圆桌会议”上也意见不一。一批天然气公司代表断言这工艺没有前途，是泡沫而已。

几天前我从库兹巴斯归来，那里庆祝了矿工节。人们对我说：煤矿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情况是双重性的。在取得巨大胜利-创造每月采矿将近百万吨的纪录的同时存在某种悲观情绪。一些企业已不得不让人们去休假。而二十年寻找开采页岩气工艺的美国人终于找到了它。结果价格下跌到了决定把功率为33兆瓦的煤发电站改用页岩气。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候选M. 罗姆尼曾对煤矿工人说：总统B. 奥巴马将使你们失业。然而B. 奥巴马也没有睡觉。多年来美国首次向欧洲供应自己的煤，以前美国煤从未向那里出口。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在欧洲卖煤。

尽管我们采取了所有能源战略，燃煤发电有减无增。而美国却决定建设两个能接纳18万顿轮船的煤终点站，其中一个向欧

洲海运煤，另一个向亚洲。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在煤方面与美国竞争。

为了便于理解，我想作解释。我们的出口煤主要产于库兹巴斯。从库兹巴斯要用铁路运输4千公里。今天一顿的运费为45美元。再加上港口：每顿煤装运到港口需要16-17美元。结果不计算货物的运费就将近为63美元。我们港口昼夜的装运量为6千顿（澳大利亚的为6万顿）。今天我们的煤开采价值为87-90美元。这已高于我们一些企业的成本，只有露天煤矿或者还可以生存。以前我们煤矿工业职工为一百万人，现在-将近8万人。我们没有竞争能力。

60%库兹巴斯开采的煤用于出口。美国人计划的发展加上利用大轮船向亚洲供应的澳大利亚，扼杀俄罗斯的煤矿部门。

俄罗斯开采的焦炭煤主要卖给中国。可是那里也关闭了被认为低效的高炉。这是对俄罗斯煤矿业的又一个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今天谈的是挽救经济。国家应该承负税率的调节。还必须在远东建设能接纳18万顿轮船的港口。前途在于中国的能源大部分基于煤炭。德国（67%）和美国（48%）的大部门动力也需要煤。煤的大市场仍然存在。

维塔利·布舒耶夫，能源战略研究所总经理：

我不想把诸如能源和地缘政治的全球问题的讨论变为部门的问题。我绝对不同意页岩气是世界政治的新词汇。存在几十种我们没有及时考虑而且今天也没有考虑，但可能在明天大大改变能源和地缘政治的方案。

今天确定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战略决定的是政治。有三个主要的原则方向。第一，今天世界市场上定调的不是生产者，而是

消费者。消费者决定是否从事解决地区或全球安全的问题。美国作为消费部分的鲜明的代表，为自己作出了完全明智和合理的决定：在得到能源地区的局势不稳定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地区能源的自给。能开采页岩气，就利用页岩气。如果能有其他资源（像欧洲那样试图依靠可恢复能源），它也会加以利用。世界上能源超过需求，它们各不相同，散布地区也不同，但今天和将来都主要利用最接近消费者的资源。

第二个地缘政治基础在于今天社会问题成为首要问题。欧洲国家侈谈的新工业主义，即工业发达国家返回工业发展的新一环在于不惜代价地在大都市创造工作位置。

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结构的财政变化。我不涉及这个问题，但正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世界能源市场局势。因此，提高价格和维持相当高的水平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供求问题-这是政治，不管我们怎么说。

现在我们结束了名为“新能源文明”的工作，想谈谈一些想法。文明是什么？这是掌握能源。从取火开始向机械动力、从燃料动力到信息动力使用的过渡。这是总的发展道路。“碳氢化合物文明”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它不是始于今天，也不会终于今日，但它是在150-200年间的占优势的一种动力资源。这个时期将结束，因为“碳氢化合物文明”在XXI世纪中期将给新的文明让位。那将是动力信息文明或者所谓通向电世界的道路。即一切都在发展最终消费品-电力。交通转向利用电能，但石油将不用于发电。

略谈我们是否超级能源大国的问题。超级不取决于是否拥有或供应某种资源，而取决于是否有超前的，能促使别的国家跟

随我们的思想和思维。如果没有这思想和思维，就谈不上什么超级。我喜欢Г. X. 波波夫的名言：俄罗斯的前途是成为世界大脑中心，俄罗斯别无前途。我认为应该理解它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政治的，甚至可能是神圣的角色。俄罗斯不是东西方之间的桥，而是地球和太空之间的桥，谈到超级，应该理解为这种角色。

我还想谈谈世界能源市场的全球角色问题。问题不在于出现新的泉源和掌握新泉源的选手。问题在于谁都可能掌握这些泉源。世界市场结构全球改变导致划分世界为出口国和进口国（诸如欧佩克等集团和组织）转为地区一体化。基础为能源基本结构的欧亚经济合作就是鲜明的例子。我们认为，正是能源基本结构为世界地缘政治结构新改革的试金石。

阿列克谢·马斯捷帕诺夫，*俄罗斯科学院石油天然气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拥有者和生产者是能源超级大国。但这是低水平，资源水平的概念。如果说能源消费，俄罗斯远非第一位，而且如果说这种消费的质量（据不同的评价，由于能源效率低，国内消费的35-45%的能源都白费），那就更差。俄罗斯能源开采基础是什么？主要是30-40年前或50年前制造的旧工艺或者是进口工艺。正因为这样应该关闭“超级”这个话题。

至于页岩气我想提出两点。第一，我们对这个问题“睡过了头”。我认为，问题在于专家们不仅错过了它，还可能是故意的隐瞒。到2004年国际动力局的所有预测中都说美国是XXI世纪液态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卡塔尔以此为根据创建了自己的功率，我们也开始这样做。只是卡塔尔的条件好，来得及完成，我们没

能。为什么卡塔尔天然气在欧洲市场倾销？因为突然发现美国不需要液态天然气，而卡塔尔巴建成了工厂，它们应该以任何价格卖出去。它大大降低了价格（按每一千立方米-89,79美元的价格在欧洲销售），亏本出售以保持功率。

现在国际动力局在所有的预测中都强调页岩气：美国全面“关闭”，它能够出口页岩气，能全部保障中国的需求。出现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又一个精密策划的行动，把中国赶入死胡同，而为自己开辟“页岩气的‘光辉顶峰’”？在美国境外严肃地谈页岩气资源是不行的。

我想还想提到关于页岩气的第二点。日本人和美国签订了从得克萨斯州进口页岩气的三个合同。美国页岩气每一千立方米值75-76美元。它在需要的，零交通运输的地方开采-这是主要的因素。但出口需要建设液化工厂，而这是所有价值的50%。这样的页岩气怎能用120美元的价格出卖呢？页岩气得到这样的传布正是因为石油和能源载体高价-否则它就得不到投资。

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是在把污脏的生产移往发展中国家的旗帜下进行的。即黄金亿万国家将提供思想，依靠它们得到发展，保持高水平生活。可是，突然在廉价能源基础上出现了新工业化的新可能性，发展化学和其他加工工业的可能性。

最近几十年的全部能源政策是在世界缺乏能源和它随着发展而更加严重的旗帜下实行的。这推动了节能和使有可能高效实行平衡，找到我们称之为非传统的新能源的新工艺的发展。

现在很多关于新的能源、动力计划的新可能性的言论。对此值得认真考虑。我们记得名言：“石器时代结束并非因为己无石头”。碳氢化合物时代结束不是因为己无碳氢化合物。今天的条

件下，谁掌握工艺，谁就控制世界。如果发展工艺，使有可能高效地和远距离地运输传统的能源，他们就还有几十年的好生活，但是，如果利用地方能源的新工艺得到超前速度的发展，就可以忘记世界能源贸易的现代结构。

伊戈尔·托姆别尔格，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能源和交通研究中心主任：

对于俄罗斯能源政策，重新考虑在传统市场形状变化条件下的碳氢化合物出口流向重点有特别的意义。XXI世纪与自然资源，首先是能源的枯竭与争夺碳氢化合物资源的矿藏斗争激化有关的问题迫切化了。威胁许多国家的，特别是全部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的北非和近东事件造成了特别的紧张局势。混乱和仍然政局不稳定的国家保障对欧洲天然气的30%的进口，60%对欧洲的净进口。引起核电站事故的日本地震也大大修改了世界能源图。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能源政策，更谨慎对待核动力，扩大可恢复能源的利用。增加天然气在动力平衡中的份量。今天正是亚洲两大国-印度和中国为碳氢化合物的主要需求者。

按国际动力局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量增加将近一倍，达到1400亿立方米。为了满足需求，它需要进口400亿立方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公布的“动力发展报告”，到2030年缺少的数量已达到700-1100亿美元。到2030年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量为2400亿立方米，其中一半需要进口。

“天然气工业公司”尚未准备好和中国实现如此大型的合作。可是欧洲市场行情（减少需求）的恶化迫使它加速趋向和中国进行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尽管风险很大。在天然气的东方方向，俄

罗斯的出口不仅依据快速发展的东方巨人的需求，而且考虑新选手的相当积极的建议。暂时市场平衡，天然气无多余也无缺乏。可是消费国在努力返回2008年的局势，使消费者市场有可能决定自己的购买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联合天然气各生产国努力保障天然气供应国利益对我国很有前途。为此建立了天然气出口国论坛（ФЭСЭГ），它随即被称为“天然气欧佩克”。实际上，天然气总藏量接近世界藏量60%的五、六个国家，即俄罗斯、伊朗、土库曼、哈萨克斯坦、卡塔尔、阿尔及利亚，可能还有阿塞拜疆对价格、经销、运输政策的协调有可能使天然气市场变得更加稳定和平衡。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

俄罗斯是不是超级能源大国？对此问题的答案十分明显，任何辩论大概都是学术性的。俄罗斯是能源大国不仅按开采和出口的碳氢化合物的数量，而且因为拥有一体化的能源结构，今天其基本因素是石油、天然气、核动力和水电，还有把能源载体运到消费者的发达运输网，包括数千公里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高压输电线。问题在于另一方面-这些财富是否合理地，珍惜地为我国和我国公民的发展和繁荣的利益而利用，怎样发展和完善我们的复杂、多棱面的动力综合体。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松懈。说得轻一些，对俄罗斯作为某种世界规模的战略原料库的态度向来都不单一。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些大选手纠正这种，按著名的西方政治家和分析家的说法，“历史不合理”的诱惑向来是敏感的因素，而在一定的条件完全可能成为他们对俄罗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广泛传布的关于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对于欧洲，将来对于其他地区都无可替代的观点，导致了我国一些公司一定的松懈，只希望在熟悉轨道范围内工作和发展，并且主要以管道作为最适宜的运输途径。结果，为液态天然气出口创造必要可能性的重要方向，还有在我国开采页岩气的问题被搁在边缘。

页岩气问题很特别。可以说对此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当我们在建设管道和在复杂气候条件下建立开采碳氢化合物系统的时候，美国（首先是）在发展旨在达到页岩气赢利开采的现代工艺方面做出了突破，从而保障了自己的动力安全，为自己作为独立的选手进入天然气市场创造了条件。现在轮到欧洲人。他也可以依靠页岩气解决碳氢化合物进口泉源多元化并大大限制一个生产者（俄罗斯）在供应方面的作用。另一种观点是：页岩气问题是臆想出来的，并不新鲜。今天，俄罗斯的竞争者围绕它进行的炒作是旨在达到唯一目的的肥皂泡，即企图降低天然气价格，把价格形成进程引向短期合同的平台，像现在的那样，不是长期的合同。

问题值得认真细致的研究。如果页岩气主要是吹嘘，而不是现实—那是一回事。如果这确实是天然气方面的革命，我们就需要寻找对付这种局势的途径。否则我们将有丧失销售市场，在工艺上落后的风险。结果将是大大减少预算的收入，对我们国家许多方面的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减少对居民社会方面的开支。

最后，超高收入只是在用于发展国家才有意义。否则是白白消耗国家自然资源，使俄罗斯未来一代贫穷，创造贪污和不适宜的社会分化条件，从而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出口，首先是碳氢化合物出口所得应该被经济接收和“消化”，用于发展其

实际部门，达到科技进步，包括开发新的能源作为能源未来的基础。简而言之，“能源外汇”，在它正常地进入预算时，应该是为我国现代化融资的主要来源之一。

谢尔盖·瓦西里耶夫，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家外交关系学院（大学）国际能源政策与外交研究所副所长：

俄罗斯超级能源大国地位取决于资源和工艺。还有一个重要之点。那是善于管理，培养教育人才。现在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家外交关系学院（大学）国际能源政策与外交研究所培养五个方面的人才：能源外交、世界经济、能源和能源资源方面经济学家、能源方面管理人才和这方面的PR（网页级别）。

今天我们在这些方面和世界主要大学有一系列完整的联合大计划。那是博科尼大学（意大利），我们在经济与经济预测和燃料动力综合体部门发展方面合作。我们和挪威各大学在国际管理方面、国际石油天然气事务各方面合作。这些计划旨在开发巴伦支海、北海和科拉海的资源。我们有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参加的MBA联合计划。我们和德国莱比锡大学也有世界经济和燃料动力综合体事务管理方面的大型计划以及一系列其他计划。从九月一日起我们开始和圣安德鲁斯大学（英国主要大学之一）实行“动力的稳定发展和战略管理”计划。

有一定的标志表明我们超过其他大学，包括欧洲各大学，我们的教育在某些方面高于世界水平。中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美国的许多大学生前来我国就学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动力教育适应需求。是教育发展趋势的动力。我们实行的计划，我们高校之间以及和其他大学协会之间的合作说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今年二月23日在欧盟动力教育和实用动力研究首领之一-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举行了重要的名为欧洲动力平台的成立会议。参加这个平台的有29个国家的169个欧洲大学。初步阶段的融资为85亿欧元。这个平台在欧委会和欧委会动力总局范围内被确认为欧洲发展新工艺的主要机关。它们编写教科书和研究计划，旨在保障新工艺研发及其采用、节能、替代泉源整个综合体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Russian Journal of World Politics,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is Issue

BRICS: A New-Generation Forum

Libya Without Qaddafi

Europe: Identity Crisis or Schizofrenia?

Russia's New Arctic Strategy

Afghanistan at the Threshold of Change

Russia-Ukraine-Belarus: A Roundtable

The Russia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view

Digest 2011



LA VIE INTERNATIONA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diplomatie, sécurité nationale



www.INTERAFFAIRS.ru

Digest 2011



الاحداث السياسية الدولية

قضايا السياسة الخارجية، والدبلوماسية، والأمن القومي



www.INTERAFFAIRS.ru

Special Issue
2010

INTERNATIONAL AFFAIRS

RUSSIA - ASEAN



www.INTERAFFAIRS.ru

Digest 2011



VIDA INTERNACIONAL

Temas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iplomacia y seguridad nacional



www.INTERAFFAIRS.ru

文藝 2011

国际生活

俄罗斯对外政策、外交和国家安全



www.INTERAFFAIRS.ru

90 лет



Июнь
2012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



Совещание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Ф-2012

Москва. Издаётся с марта 1922 г.

Digest 2011



INTERNATIONALES LEBEN

Problem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iplomatie und der nationalen Sicherheit



www.INTERAFFAIRS.ru

本期：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长
俄罗斯外交与 21 世纪的挑战

安德烈·杰尼索夫,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不断变化世界中的俄罗斯: 优先方向的继承性和新的机遇

格里戈里·卡拉辛, 国务秘书、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不存在能替代独联体一体化的合理方案

伊戈尔·伊万诺夫,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俄美“关系重启”: 策略步骤还是战略选择?

谢尔盖·拉佐夫, 俄罗斯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俄罗斯和中国相互需要

谢尔盖·纳雷什金,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
俄罗斯与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 历史和前景

基里尔·巴爾斯基, 俄罗斯联邦总统驻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 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民族协调者, 特任全权大使
中亚 · 在上合组织“不湿伞”之下